

本刊全文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海淀史志

HAIDIAN

SHIZHI

2026 2

(总第111期)

北京市海淀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主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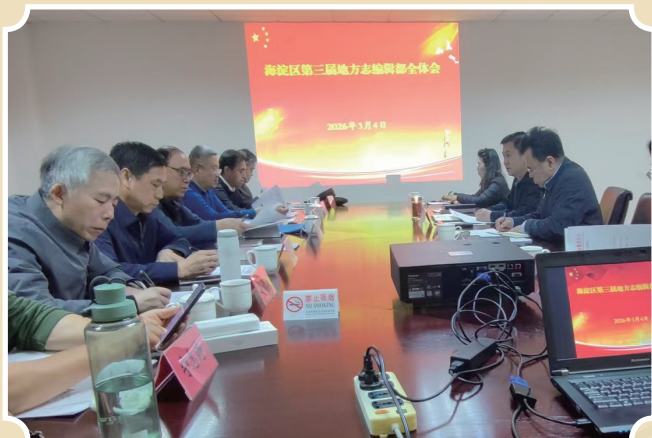
纵观知行百家 采撷史苑奇葩



2026年2月9日，区史志办机关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参观海淀区2025年度重点工作“一比晒一晒”巡展
(徐支燕 供图)



3月2日，区史志办机关党支部组织开展“你好，AI”主题党日活动
(刘江英 供图)



3月4日，海淀区第三届地方志编辑部全体会议召开
(曹沛函 供图)



3月11日，区史志办主任马龙虎带队赴滴滴公司调研
(徐支燕 供图)



4月7日，海淀区史志办传达学习全市党史地方志办主任会议精神
(陈智慧 摄)

探寻资政之道 弘扬海淀文化



4月14日，区史志办机关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赴东升镇北京AI原点社区开展科创主题调研暨主题党日活动
(王静宜 供图)



4月16日，区史志办召开《北京地域文化通览·海淀卷》编撰工作启动会
(周勇 供图)



4月16日，海淀区史志办赴海龙大厦开展“海淀之星”红色历史文化讲解队培训
(马坤 供图)



4月22日，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副主任、一级巡视员姚茂文带队来海淀区开展专题调研
(王静宜 摄)



4月27日，区史志办召开中关村口述史项目专题片审片会
(王静宜 摄)

三山五园研究

- 论清帝园居理政与中国之“大一统”（上）
——以清代三山五园为中心 何瑜 02

人物春秋

- 军机处里燕京人 关家麒 15
怀念与张宝章先生的交往 吴剑群 24
白十源与奥美大会及其他（下） 胥天寿 26

本刊特稿

- 携手深耕研究传文脉 赋能海淀发展谱华章
——《海淀发展与改革研究》创办20周年的行与思 黄琪 33

海淀述往

- 平沪旧报中关于一二·九运动的相关线索 肖伊绯 37
海淀抗战史话（二） 徐佳伟 53
寻迹明代的广济桥 董三福 65
熊希龄与梅兰芳情谊之交和爱国济世之心
——赏析熊希龄《瑞鹤仙·寿梅畹华三十生日》 常乃麟 67
门头村轶事 张嘉鼎 铁木伦 72

海淀上庄地区曾有过的古桥	张起林	78
命案回眸	钱军熙	83

语言文字问答

“获益匪浅”中的“匪”是什么意思	本刊编辑部	77
------------------	-------	----

史志动态

2026年海淀区年鉴工作会顺利召开	本刊编辑部	87
海淀区三轮修志工作系列会议接续召开		
经济部类培训会精准破题	本刊编辑部	88

顾 问：周来升 李 强 胥天寿
主 编：程培衡
常务副主编：马龙虎
副 主 编：赵习杰
执行主编：宁葆新 田 颖
编 辑：马 坤 王静宜 刘江英 陈智慧 张莞笛
周 勇 钟 冷 徐支燕 董 震 戴金胜
执行编辑：曹沛函
刊名题字：张书范
封面摄影：刘江英
版式设计：林 琳

论清帝园居理政与中国之“大一统”（上）

——以清代三山五园为中心

何瑜

一、前言

在中国古代帝制社会的后期，即清代政治史中有一突出的现象，即清帝与历史上的“汉家”皇帝，在治国方面有一非常大的不同，尤其是康熙、乾隆二帝，总是离开紫禁城，在西苑、三山五园、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或于巡幸过程中于营帐里、行宫中治国理政，我们可统称其为“园居理政”。这种新型的理政模式，突破了中国传统王朝的惯例，几乎贯穿于整个有清一代。

自顺治九年（1652）十二月，顺治帝于南苑接见五世达赖喇嘛，旋册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首定达赖喇嘛称号。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光绪皇帝于西苑紫光阁赐宴十三世达赖喇嘛，并册封其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止，清朝九位皇帝园居理政的时间长达256年。如果从康熙帝首次驻蹕畅春园（康熙二十六年二月1687年3月）始，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咸丰十年九月1860年10月）止，清朝六位

皇帝在三山五园理政的时间亦长达173年。

其中：康熙四十九年（1710）共383天（有闰七月），康熙帝北狩156天，西巡五台山32天，谒孝陵3天，居畅春园124天，在紫禁城时间仅有68天，不足全年的18%，而园居理政时间则高达82%。雍正十一年（1733）共355天，雍正帝居圆明园282天，在紫禁城时间仅有73天，占全年的20%，在圆明园时间占80%。乾隆三十六年（1771）共354天，乾隆帝东巡63天，北狩87天，居三山五园100天，在紫禁城104天，不足全年的30%，园居理政时间则高达70%。嘉庆十一年（1806）共355天，嘉庆帝谒陵5天，北狩57天，居三山五园188天，在紫禁城105天，不足全年的30%，园居理政时间则高达70%。道光二十五年（1845）共354日，道光帝居圆明园284日，在紫禁城67日，不足全年的19%，园居理政时间则高达81%。^①

由此可见，清代“园居理政”的治国特点是

^① 上述数据据何瑜主编《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相关内容整理而成。

多么突出。

二、为什么清代会形成“园居理政”制度

为什么清朝会形成园居理政的治国模式呢？有人说是满洲人入关后怕热，所以建“避暑山庄”，又称圆明园为“夏宫”，视为避暑游观之地。这些说法其实是很肤浅的，我曾写过《清代三山五园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一文，意为清代的园居理政，是在辽金等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捺钵”制度下发展而来，并汲取了儒家苑囿文化的精华。也就是说清代的园居理政，实是草原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一种有机融合，是明清之际乃至十八世纪中国历史的必然产物。

用康熙帝的话来讲：“朕避暑出塞，因土肥水甘，泉清峰秀，故驻蹕于此（指避暑山庄）”。^①用乾隆皇帝的话来说，就是“都城西郊（指三山五园），地境爽垲，水泉清洁，于颐养为宜”。^②雍正帝在《圆明园记》中也明确指出：“宜宁神受福，少屏烦喧，而风土清佳，惟园居为胜。”^③

但如果深入分析，更重要的则有以下三点：

（一）清入主中原后所面临的形势，其复杂严峻之程度，远非以往的改朝换代所能比。其时，早期西方殖民势力已环伺中国，明熹宗三年（1623），葡萄牙以租借方式占据澳门；明熹宗四年（1624），荷兰入侵台湾；清顺治六年（1649），越过乌拉尔山的俄国哥萨克武装侵入东北，攻陷雅克萨城。同时，十七世纪以来，英法等国纷纷设立东印度公司，并不断派出武装船只在我东南沿海叩关索市，西方传教士亦纷至沓

来，逐渐深入中国沿海内地。

（二）作为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既要面对人口众多和文化与生产力水平远高于己的中原汉族民众，又要面临中原各地高涨的反满情绪。清初，“反清复明”“誓与清朝不共戴天”的呼声此起彼伏。许多“志操高洁”的士大夫，至死都不愿意为清廷所用。因此，如何稳定政局，解决清朝统治者立国正统、治国有方的问题，便是重中之重。加之连年战乱，黄河下游几乎无岁不决口，中原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如何发展经济，安抚民生，亦是当务之急。

（三）北方强悍的蒙古诸部，在清入关以前，和硕特部顾实汗和绰罗斯部已进入西藏和青海；十七纪中叶以后，准噶尔部噶尔丹完成厄鲁特蒙古部的统一，建立起准噶尔政权，并控制了天山南北及部分中亚地区。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后，噶尔丹在俄国支持下，血洗漠北喀尔喀蒙古，率大军逼近京师，并狂妄地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我与中华一道同轨。”^④企图南北分治。

在这种内忧外患、形势如此险恶的条件下，清朝统治者如果还像明中期以后的皇帝那样，久居大内而懒于朝政，那太和殿上的龙椅是无论如何也坐不稳的。

（四）清朝统治者认真总结了前朝覆亡的历史教训。康熙皇帝说：“朕闻其君（指明朝皇帝）常处深宫，不与臣下相见，而惟与宦竖相处，既不读书，亦不勤政，所以上下之情壅蔽不通，民

① 故宫博物院编《万寿诗·清圣祖御制诗文集》，第5册，第198页，海南出版社，2000年6月。

② 《清高宗实录》卷60，乾隆三年正月乙丑。

③ 于敏中等编纂：《钦定日下旧闻考》卷80，第132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④ [清]温达等撰康熙《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7。

间疾苦竟罔闻知”。^①他在《无逸》一章中还写道：“人君（指明朝皇帝）长于深宫之中，抚有四海之大，谐臣媚子惟知谄顺以求亲，公卿大夫又隔堂廉而难近”。

乾隆帝也曾分析说：历史上往往开国后不过一两代，便会发生内乱。究其缘故，主要是当政者怠于政事。“朕纘承基绪，鉴前代生深宫之中，长阿保之手，诚知稼穡艰难，日与中外臣工，为斯民筹食用至计，胼胝机杼之作苦，日廛于怀。”^②

（五）清廷吸取了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全盘汉化”和金朝未能保持旧有习俗，以及元朝对汉文化吸收不足，对黄教喇嘛反而“曲庇谄敬”的政策失误等，最终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

在此基础上，清朝统治者包括皇太极，从入关前后开始，在认同和继承儒家文化的同时，一方面坚守满洲八旗制度和清语骑射，另一方面则不断发展和创建新的治国理政制度，如创建理藩院，多元化的管理广大边疆地区；创建内务府，专门管理皇家事务，形成二元化的国家管理体系；创建军机处和密折制度，将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发展至顶峰；继承明代总督巡抚制，将其作为地方固定的行政长官，并在重要的边疆、沿海地区设置总督大学士，以重其权等等。

而这种制度创新的前提，则是清朝统治者在治国理念上的思想创新。首先，是“正统观”的重新确立。欧阳修在《正统论》中言：“王者大

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③雍正帝借《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强调清朝君临天下，符合正统之道。即“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④

其次，是批驳儒家传统的“夷夏大防观”。中国古代的传统天下观，其核心内容就是将蛮荒之地的四夷置之化外。力求“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从而保证“天下”秩序的稳定和华夏文化的优势地位。同时，强调夷夏大防的关键是要以夏变夷，而不能让诸夏沦为夷狄，所以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⑤

作为“蛮夷”之人的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以前就积极笼络漠南蒙古，使之成为进攻明朝的得力助手。入关后，在定鼎中原，统一大中国的过程中，康熙皇帝进一步提出：“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⑥康熙帝的这种主张，不仅推翻了内中华而外夷狄的中外大防思想，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其后，雍正、乾隆二帝，又将这种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进一步丰富与完善。这种“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观念，及其一系列恩威并施的举措，最终彻底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千百年来的冲突和对峙，

① 《清圣祖实录》卷254，康熙五十二年四月甲寅。

② [清] 鄂尔泰撰《钦定授时通考·御制授时通考序》。

③ [宋] 欧阳修撰《欧阳文粹》卷1，《原正统论》。

④ 《清世宗实录》卷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⑤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⑥ 《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

实现了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较之长城更为坚固”的战略愿景。

其三，是校正“无为而治观”。“无为而治”出自《论语》卫灵公篇，是儒家和道家的治国理念。内中有：“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①康熙帝不赞成这种说法，他认为：“古人虽云无为而治，人主不过总其大纲，然一日二日万机，岂皆大纲乎？《书》中之言，多不可凭。”^②故他明谕诸皇子及满汉大臣曰：“一事不谨，即貽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貽千百世之患。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故朕每事必加详慎。”^③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亦几乎每日都是“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④“天下几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⑤乾隆帝则说自己，是“寰中第一尊崇者，却是忧劳第一人。”^⑥他仿照乃祖乃父再刻“敬天勤民”宝，并多次写诗强调：“家法传勤政，孜孜敢暂忘。”^⑦将“敬天勤民”，视为“四字家法。”

其四，是坚持“从俗从宜观”。从俗从宜也即“因俗而治”，其来源于儒家思想。孔颖达在其所著《礼记正义》中提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意为整治周边民族地区的政

教而不改变他们的习俗。但历代的中原王朝统治者却很少能做到这一点，更多的则是对少数民族风俗的鄙夷和否定。如孔子就曾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⑧意思是说：要是没有管仲，我们就得沦为蛮夷那样，穿着左衽的衣服，披散着头发。

清朝在入关前，即已认同蒙古民族和蒙古文化。入关后，康熙皇帝在征服准噶尔部落后，亦赞赏蒙古部落，言其“三皇不治，五帝不服，今已中外无别矣。论风俗人情，刚直好勇，自百年以来，敬奉释教，并无二法。敬守国典，罔敢陨越。不识不知，太和有象，朕每嘉焉。”^⑨雍正皇帝则教育满族臣下，对蒙古各部不仅不能以夷狄斥之，而且应待之如宾客。当有人向他密奏回族自为一教，异言异服，且强悍刁顽，请严加惩治时，雍正帝则答道：“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遗留家风土俗，亦犹中国之人，籍贯不同，嗜好方言，亦遂各异，是以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要亦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初非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比，则回民之有教，无庸置议也。”^⑩乾隆十四年（1749）十二月，当马灵柯在奏折中把蒙古人和汉人分别名色，用“夷

① 《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② [清]雍正九年敕编：《圣祖仁皇帝圣训》卷10，康熙五十六年十月庚戌。

③ 《清圣祖实录》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

④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33。

⑤ 《清世宗实录》卷18，雍正二年四月庚戌。

⑥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初集卷21，第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⑦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初集卷30，第1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⑧ 《论语·宪问篇》。

⑨ [清]清和坤奉敕纂修《钦定热河志》《溥仁寺碑文》。

⑩ 《清世宗实录》卷80，雍正七年四月辛巳。

汉”二字称之时，乾隆帝即给予严厉斥责：“蒙古、汉人同属臣民，如有书写之处，应称蒙古内地，不得以蒙汉字面混行填写。”^①

在上述种种继承与创新的治国方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清代的“园居理政”和“巡幸天下”。也就是清帝打破“王不离位”“正位宅中”^②的传统观念，^③主动走出紫禁城，采取园居理政、巡狩天下和紫禁城宫居理政并举的方式治国。其中的所谓园居理政，主要是指以圆明园（康熙时为畅春园，下同）为核心的三山五园，包括西苑、承德避暑山庄和散布南北的诸路行宫等。

三、清代园居理政的四个阶段

有清一代的园居理政，从形成发展到体制完善，直到近代的种种变化，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园居理政之滥觞，即顺治朝清帝于南苑和玉泉山理政之始

如顺治九年（1652）十二月，顺治帝于南苑接见五世达赖喇嘛，“上赐坐、赐宴，达赖喇嘛进马匹、方物，并纳之。”^④接着，清廷将南苑中的明代旧提督官署改建为行宫，并在顺治帝与五世达赖喇嘛会见的地方兴建德寿寺，以为纪念。

顺治十一年十一月“癸卯，上幸南苑”（1654）

后，在园驻蹕逾半年之久，其中，因沙皇军队侵扰黑龙江，十二月廿一日，顺治帝：“命固山额真明安达理统率官属兵丁，往征罗刹。”并“封朝鲜国王李溟子柵为世子，锡之诰命。”^⑤翌年（1655）六月廿八日，鉴于明朝宦官乱政，顺治帝命工部立内十三衙门铁牌，谕曰：“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⑥

顺治十三年（1656）二月，顺治帝在南苑阅武之后，复以“宋明亡国，悉由朋党”为戒，严谕百官：要“寝其朋谋，而尽力于国家。”^⑦

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帝“驻蹕玉泉山”。^⑧

顺治十七年六月，内大臣索尼遵谕上言十一事，内有：“私决泉水宜杜也。京北玉泉山之水，止备上用，其禁甚严。今诸王贝勒、以及各官，辄皆私引灌田，遂致泉流尽竭，殊干法纪。今后宜严谕禁止，庶泉流不竭矣。”得旨：“著严察议奏。”^⑨

康熙前期，在三次于南苑举行大阅的同时，

① 《清高宗实录》卷354，乾隆十四年十二月戊寅。

② 朱震《汉上易传》卷9《说卦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康熙帝时巡各地的做法，令一些汉族官员很是看不惯。他们说：“万乘之尊，不居法官，常常游幸关外，道路喧传，甚为不便。”

④ 《清世祖实录》卷70，顺治九年十二月癸丑。

⑤ 《清世祖实录》卷87，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丁丑。

⑥ 《清世祖实录》卷92，顺治十二年六月辛巳。

⑦ 《清世祖实录》卷98，顺治十三年二月丙子。

⑧ 《清世祖实录》卷130，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己巳。

⑨ 《清世祖实录》卷130，顺治十七年六月壬子。

亦短时间在玉泉山园居理政。如史载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帝驻蹕玉泉山。初五日谕曰：“经筵所以讲学修德，大典也。讲章须有劝诫箴规之意，乃称启沃。”初六日御玉泉山东门，面谕杭州副都统邵凤翔曰：“官兵驻防省会，原以镇守地方，使民生有益……尔须留心此事，严束官兵，以副朕简用。如仍前恣行，决不轻恕。”初八日，帝回宫。初九日，帝复幸玉泉山驻蹕。谕内阁、翰林院曰：“太祖太宗世祖圣训，垂法万世，关系重大，理应纂修。”^①

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康熙帝连续五次往返玉泉山，在园理政、驻蹕九天。^②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康熙帝两次往返玉泉山，在园理政、驻蹕七天。^③

康熙二十四年，康熙帝于正月即幸玉泉山驻蹕，前后在园理政十一天。^④

（二）园居理政之初期

康熙二十六年（1687）二月二十二日，“上（自玉泉山）移驻畅春园。”^⑤先是，同年六月初七日，帝御畅春园内门听政，明谕内阁“自是日，各部院本章俱送内阁，内阁转送畅春园听理。”到康熙三十年三月，则改为“部院各衙门应面奏事宜仍行面奏，其余章奏每日送内阁，转

送畅春园听理。”这种大臣面奏与内阁集中章奏转送畅春园听理的主要理政方式，一直延续到康熙末年。^⑥当时，只有个别王公大臣享有赐园或私家园林（按，如大学士明珠、索额图等），南书房和上书房的翰林们在小东门内有几间值庐，于“弘雅园”有值房公所，其余九卿六部在畅春园内均无衙署，赴园奏事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没有赐园和办公场所的，他们或租赁民屋、或寄宿僧寺，晨往夕还并无定所。就连大学士李光地等人，也是挤在清梵寺中办公和用餐。^⑦同时，守护畅春园的巡捕营官兵，亦没有固定营房，“专藉该班公所住宿”^⑧，“由京城往畅春园换班行走。”^⑨其余银库、档房、药房等辅助部门亦均无固定的办公场所。

（三）雍、乾时期清帝国居理政制度之完善
雍正继位以后，在准备扩建赐园为御园的同时，先是在圆明园周边建营房八座，房万余间，安排八旗护军和内务府三旗分别驻扎；并在大宫门内外设六部九卿朝房，即大宫门前左右朝房各5间，朝房后各有曲尺型拐角房27间。东部为宗人府、内阁、礼部、吏部、兵部、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銮仪卫、及护军东四旗各衙门值房；西部为户部、刑部、工部、

① 《清康熙实录》卷104，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己卯、辛巳。

② 何瑜主编《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康熙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

③ 何瑜主编《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康熙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

④ 何瑜主编《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康熙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

⑤ 《清圣祖实录》卷129，康熙二十六年二月庚午。

⑥ 何瑜主编《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康熙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

⑦ [韩]林基中编著《燕行录全集》第33册，97、98页，韩国东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⑧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713兵籍一，八旗拔补兵缺。

⑨ 《清世宗实录》卷45，雍正四年六月甲戌。

钦天监、内务府、光禄寺、通政司、大理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御书处、上驷院、武备院、及护军西四旗各衙门值房。此外，还有银库、档案房、造办处、药房、翻书房等。正大光明殿之东则为勤政殿，是清帝每日批阅奏章、召对群臣的地方。

雍正四年（1726），清廷复将圆明园东南的原索额图园赐予张廷玉等九人居住，作为南书房和上书房词臣公所，俗称“翰林院”。雍正七年（1729）春，创建军机处，先是在宫门外东朝房，后移至小东门内南墙下。军机大臣由皇帝钦点，下选军机章京若干。军机大臣每天都要入值，随时听候召见，军机章京则每二人一班于圆明园轮值，4日一换班，称为“园班”。入值园班者，须有一人早到园内值房，谓之“早门”；一人下班最晚，以宫门上锁为限，谓之“守晚”。为此，乾隆时复设七峰别墅和老虎洞两处满汉军机处外值庐，以方便皇帝园居理政。

（四）园居理政之衰落期

嘉道以后，随着清王朝由盛转衰，清帝巡幸各地的活动锐减，园居理政的制度亦日渐衰落。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劫掠和火烧三山五园，咸丰帝北狩热河；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列强铁蹄再次践踏三山五园，帝后经圆明园逃往西安。这期间历经日本侵台、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两度垂帘听政、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清廷内忧外患，即使光绪朝清廷重修清漪园，改称颐和园时，其间曾有短暂的园居理政，但与康雍乾时期的园居理政，已不可同日而语。

四、圆明园轮值奏事制度的实施

雍正三年（1725）八月廿七日，雍正帝首次驻蹕圆明园，即强调：“朕在圆明园，与在宫中无异，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尔等应奏者，不可迟误。若无应奏事件，在衙门办事，不必到此。”^①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日，又谕大学士等：“以后八旗定为八日，各分一日轮奏；部院衙门各分一日轮奏；六部之外，都察院与理藩院为一日，内务府为一日；其余衙门可酌量事务之多寡，附于部院班次，每日一旗一部，同来陈奏，则朕每日皆有办理之事。而不来奏事之大臣，又得在京办理，诚为妥便。至朕听政办事，各官齐集之日，原不在轮班奏事之数，次日仍按班次前来。若该部院衙门轮班之日无事可奏，其堂官亦著前来，恐有召问委办之事，亦未可定。其紧要事件，仍不拘班次，即行启奏。”^②

按照雍正帝的规定，八旗按顺序每旗一日，然后再分别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一日，都察院与理藩院一日，内务府一日，即八日一循环。如果碰到御门听政日，则各旗、院堂官都要前往，当天应轮班奏事的部院则顺延至次日。如果某部院在轮班之日，确实没有可奏之事，其堂官也要前来，以恭候皇帝召问委办。相反，如果某部院有紧急事件，却不在轮班之日，则也可不拘班次，立即启奏。同时明确要求，凡是不至京西御园奏事的八旗、各部院官员，均要前往城内各自衙门办事。如此一来，有了明确的轮班奏事制度，便可保证各部官员能有序的前往圆明园上朝理事。

乾隆三年（1738）正月十一日，乾隆帝初幸圆

① 《清世宗实录》卷35，雍正三年八月壬辰，中华书局，1985。

② 《清世宗实录》卷40，雍正四年正月癸丑。

明园，翌日也强调：“向来部院及八旗大臣皆轮班奏事，自仍照旧例行。至诸臣中有陈奏事件，即行具奏，不必拘定轮班日期，大学士等可通行传谕知之。”^①

至此，清帝园居理政的轮值奏事制度形成。

五、三山五园——清代的园林紫禁城

自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即十分关注京西这块风水宝地。不仅顺治皇帝于玉泉山建澄心园行宫，其他王公贵族也纷纷于此或兴建园庭，或占地种稻。但真正形成园居理政的体制，则是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二月，康熙帝驻蹕畅春园以后。当时一年中，康熙帝除了去避暑山庄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在畅春园内，往往从正月初二就入园，直到腊月才回宫。据史料记载，他在园子里最多的一年呆了202天，一生中有24次生日都是在畅春园度过的，最终病逝于该园清溪书屋。故清人吴振械称，康熙帝“计一岁之中，幸热河者半，驻畅春者又三之二”。^②雍正皇帝每年平均在圆明园里有210天，最长一年他在圆明园里呆了246天。（见拙作《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雍正朝）乾隆帝的活动范围最大，但每年在园子里的时间仍平均在130天左右。故晚清时，道光皇帝总结说：圆明园“实为我国家出治临民之地”。^③

乾隆皇帝曾作《西直门外》一诗，内有：“为修夏杓法宫旋，徐步轻舆阅大田。”^④另有《命

驾恭问皇太后安遂驻御园之作》，内曰：“退即苑宫成小驻，明窗书史静堪论。”^⑤他称京师紫禁城为法宫，而圆明园为苑宫，也就是以圆明园为核心的三山五园，是一座没有园墙的园林紫禁城。那这座园林紫禁城与京师紫禁城，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在《清代圆明园与紫禁城关系考辨》一文中做过探讨。即京师紫禁城主要是清廷举行“大祀”“大朝”“大典”和“大宴”的地方，以彰显清帝代天行政的权力及其合法性。平时常朝理政，则主要是在以圆明园为核心的三山五园。

说起这座没有围墙的园林紫禁城，它不仅是清代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清代的军事重镇、文化宝藏以及大运河的源头和京西御稻的发祥之地。

说其为政治中心，主要是常朝理政清帝多在以圆明园为核心的三山五园，且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亦是在三山五园中诞生的。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月三十日，康熙帝在畅春园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喜为“班禅额尔德尼”，并照册封达赖喇嘛例，给以印信。从此确立了达赖与班禅转世，均须清廷册封，这也就意味着清廷完成了控制西藏的第一步。^⑥自康熙三十年（1691）正月始，清廷相继在西花园含淳堂、畅春园万树红霞等地，举行朝正外藩宴，以巩固满蒙联盟，后历代相传成为“家法”。康熙五十五

① 《清高宗实录》卷60，乾隆三年正月乙丑。

② 吴振械：《养吉斋丛录》卷18，第233页，中华书局，2005年12月。

③ 故宫博物院编《清宣宗御制诗》初集卷7，第110页，海南出版社，2000年6月。

④ 《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38，第78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⑤ 《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60，第24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⑥ 《清圣祖实录》卷252，康熙五十二年正月戊申。《卫藏通志》卷5。

年（1716）十一月，康熙帝在园发布“南洋禁航令”，宣布清廷的海防之策。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二月，康熙帝于园中清溪书屋四次接见罗马教廷特使嘉禄，并因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内政而明谕：“以后西洋人不必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①

又如雍正帝在圆明园谕云南巡抚鄂尔泰，坚决支持他推进改土归流，并最终实现西南六省地区的设官建制。雍正七年春，雍正帝在圆明园创建军机处，并直接指挥平定西北准噶尔的战事。乾隆皇帝在三山五园，不仅继续完成统一西北的大业，完善驻藏大臣制度，接待蒙藏宗教领袖六世班禅，而且力排众议，明谕迎接和安置自俄归来的土尔扈特部。乾隆帝所炫耀的“十全武功”，其中的战役指挥大部分都是在三山五园。到晚清时，道光帝允准中英《南京条约》和咸丰帝批准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等，也都是在圆明园完成的。所以说以圆明园为核心的三山五园，是有清一代与紫禁城内外相维的政治中心。

说到文化宝藏，清代的三山五园要比紫禁城更为丰富多彩，如一座“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其美轮美奂的各式园林建筑，山水花木和其中数不清的古籍书画、玉石珍宝，就远比高墙闭锁的紫禁城更为清新宜人。其余以山景为主的香山静宜园、以天下第一泉著称的玉泉山静明园、以真山真水建成的万寿山清漪园，其园林建筑又各有千秋。同时，清廷为弘扬“稽古右文，崇儒兴学”，曾召集大批饱学之士，在此编纂和注释古代典籍。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六月，皇三子允

祉于畅春园蒙养斋立馆，在皇家园林里编纂《律历渊源》100卷，包括《律吕正义》《历象考成》《数理精蕴》，以及一万卷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朝编纂的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其中一部即收藏于圆明园文源阁。

另外，三山五园地区还走出过震撼文坛的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被国学大师王国维赞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清初词人纳兰性德和清代第一女词人顾太清。此外乾隆皇帝和诸多王公大臣的诗文画作也为三山五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说其为军事重镇，雍正初年即于圆明园周边建立营房八处、房一万余间，设立拱卫圆明园的八旗、内务府三旗护军营。乾隆即位后，先是扩建八旗营房、增加圆明园护军名额。接着，敕建香山健锐营，于蓝靛厂建外火器营，拨八旗满洲、蒙古鸟枪护军聚居，并不断增加官兵，添建房舍。乾隆四十六年（1707），复将步军统领所辖三营改为五营，其中营由副将管带专辖圆明园一带，仍驻扎海淀。嘉庆十九年（1814），又于圆明园西北门外添建内务府三旗营房。上述军营均选八旗精壮子弟列营聚处，实行封闭管理，也就是“按旗分住，勿许私出”，专事操演。同时，清廷规定了严格的操练与考核制度，每一营盘均建有演武厅和练兵场。乾隆中叶，清廷还在圆明、畅春、清漪三园之间建成规模更大的演兵之地，即西马厂和阅武楼。如此部署，上万八旗精锐既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环型布局，护卫着整个三山五园，亦是清代的军事大本营和特种兵培

^① 陈垣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1932年版，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辑，[台]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第96页。

训基地。其中，仅从香山健锐营走出来的武职正二品官员（相当于今天省军级官员）就有六十五人之多。^①

至于经济方面，首先是三山五园水系与北京城之关系。在金人开凿长河，沟通高粱河与西山水系，和元代郭守敬引白浮泉水入瓮山泊，连接长河以达京城的基础上，康熙至乾隆朝，清廷对三山五园地区的玉泉山和万泉河水系，进行全方位的开发，最终形成以昆明湖为中心，集灌溉、蓄水、排涝等设施完备，且景色壮观的清代大型水利枢纽。对三山五园和京城的防洪、灌溉、漕运及园林用水等方面均发挥巨大的作用。

同时，自康熙朝始，清廷即派人引沙河水入清河，并拓宽清河河道，“自水磨闸起至通州石坝，刨河建闸。”接着，于清河镇南修建漕运码头和仓廩，使通州漕粮可以经北运河、温榆河、清河，至京师最北端的“本裕仓”。雍正时又于安河桥畔，建“丰益仓”，俗称“安河仓”。这样，玉泉山等水经长河入京师，“通潞转漕”，成为运河之首；而通州漕粮经北运河、清河复运至三山五园，也可称为运河尾闾。其时，大批漕粮等物资源源不断地经水陆运至三山五园，一方面养育了宫廷内外数以万计的官兵园役，一方面促进了三山五园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名噪一时的海淀三街三镇（即海淀、青龙桥、清河三镇；蓝靛厂、成府、西苑三街）以及大大小小的商铺、酒肆，形成京西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商业重镇。

另外，在康熙帝驻蹕畅春园之前，便十分关

注三山五园地区的稻作农业，常到玉泉山下问农“观禾”。在他于西苑（今中南海）培育出新稻种后，便于畅春园内外大规模种植，并创设玉泉山稻田厂，钦派内务府大臣管辖。旋将此种精品水稻推广于长城内外，成为享誉至今的“京西御稻”。到乾嘉时期，不包括民间的自有耕地，三山五园地区属于皇家的各类农田（包括麦地、菜圃、果园、蒲地等）就有一百二三十顷。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均为稻田，完全是一片江南水乡的景色。

可见，清代的三山五园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五座园子，而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园林紫禁城，也是一个系统完备的国中之国。

六、广义的清代园居理政说

康熙帝在《穹览寺碑文》中写道：朕驻蹕避暑山庄，“日理万几，未尝少辍，与宫中无异”。^②乾隆六年（1741）九月十五日，乾隆帝于南石槽行宫谕曰：“朕于十六日至汤山驻蹕数日，二十日至圆明园。自十六日以后，每日照常进本。各部院衙门及八旗亦照常轮班奏事。汤山去京不远，有应行引见官员，即着带来引见”。^③

其实，自康熙朝始，清代随扈之中的理政制度即已形成。如《枢垣记略》载：“凡临幸处所皆有军机值庐，达拉密（按，指领班军机章京）及值日之满汉章京各二人先往接折，并祇候军机大臣入见……略如随扈之仪。”^④所以，乾隆皇帝在晚年时曾总结说：“凡遇游幸，传膳处所即办事、览章奏、宣对大臣，引见官吏如常，弗令

① 常林、白鹤群著《北京西山健锐营》第155、156页，学苑出版社，2006年。

② 故宫博物院编《万寿诗·清圣祖御制诗文》第5册，第198页，海南出版社，2000年6月。

③ 《清高宗实录》卷150，乾隆六年九月丁丑。

④ [清]梁章钜、朱智《枢垣记略》卷14。

稽延守候，此向例也。”^①

如此看来，清代广义的园居理政，还应包括三山五园以外，清帝于其他御园、行宫^②，甚至舟车、马背上处理政务的一切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康熙帝在位61年（1662—1722）。曾108次巡视京畿地区，其中包括33次去南苑，12次去汤泉，2次去玉泉山，33次出巡京郊，1次去保定，27次谒孝陵。此外，还有3次东巡盛京，40次北狩塞外，4次西巡五台山，1次出巡西安，6次南巡到江浙地区。

乾隆帝在位60年（1736—1795），当太上皇3年（1796—1799）。曾80次巡视京畿，其中包括44次拜谒东、西陵，17次到南苑行围，13次登盘山，6次出巡天津。此外，还有1次到河南，5次去山东祭孔祀岱，6次西巡五台山，4次东巡盛京，52次北狩，6次南巡江浙。^③

其中，最具治国意义的有四项，即南巡、西巡、东巡和北狩。这其中南巡和北狩又是最最重要的。

南巡江浙 康熙与乾隆分别六下江南，有人认为，清帝南巡就是“艳赏江南”，即游山玩水、欣赏江南风光和美女。其实不然，清帝南巡，其宣示正统、安抚江南的政治目的非常明确。主要做法为：

（一）蠲赋恩赏，如乾隆六次南巡总共蠲免江浙、安徽两省白银上千万两；

（二）加惠士绅，据统计：乾隆六次南巡中

增加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生员名额有5664名。《四库全书》竣工后，因江浙为人文渊薮，在第六次南巡时，乾隆令将其一部存放于镇江文宗阁，一部存放于扬州文汇阁，一部存放在杭州文澜阁。另外四部则存放于清王朝的政治中心，即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盛京皇宫的文溯阁，以及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足见他对江浙地区的重视程度；

（三）通过祭祀明太祖陵和先师孔庙等，安抚和笼络江南的士族精英；

（四）通过行围阅兵以显示清廷的武装力量；

（五）巡视河工、观民察吏，促进江南经济的繁荣发展。乾隆皇帝在《南巡记》里讲到：“六巡江浙，计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临幸江浙，原因厘念河工海塘，亲临阅视”。^④这些话并非空谈，如从第三次南巡起，乾隆“念海塘为越中第一保障”，曾四次前往浙江海宁考察塘工。其时在修筑海宁段塘堤时有修柴塘与石塘之争。乾隆认为孰是孰非“切忌道旁论，不如目击凭”。^⑤他亲自试验，最后做出决定。

清朝的皇帝为什么要远离紫禁城，千里迢迢的数次下江南呢？主要是江浙两省对清王朝来说太重要了。其不仅是鱼米之乡，经济位居全国之首。两省上交的赋银和赋粮在清朝分别达到全国总数的20%和30%左右，盐课银占全国盐课总数的68%左右，关税占全国税额总数的一半。而且江南人才济济，知名学者甚多。从顺治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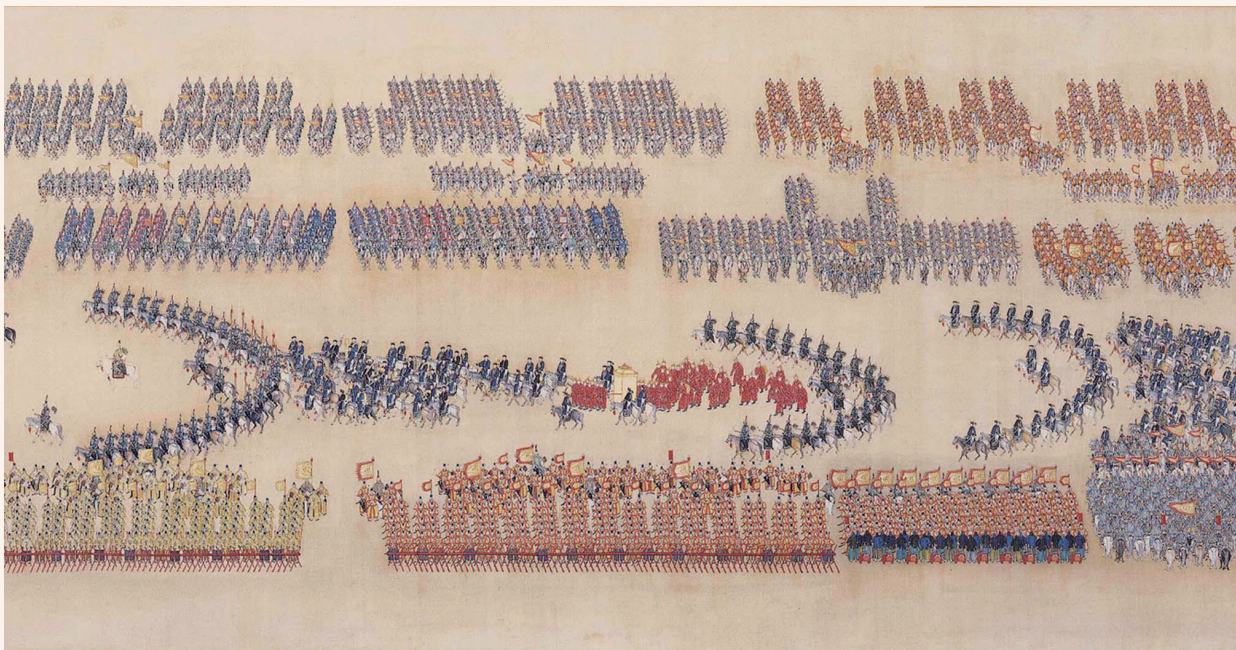
①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五集，卷24，第1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 行宫系指京城以外供皇帝出巡时居住的场所。一般分左中右三宫院，以及宫殿区和苑景区两部分。

③ 赵云田：《清朝皇帝的出巡活动》，载《清史参考》2014年第11期。

④ 《乾隆御制文集》卷14。

⑤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三集，卷2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乾隆大阅图（林琳供图）

到乾隆六十年的150年里，江浙两省就出了51位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87%；出了38位榜眼，占榜眼总数62%；出了47位探花，占探花总数77%。再就大学士九卿督抚来说，江浙两省人士也是名列前茅。同时，这里也是明末清初反清、抗清活动的中心。也就是说，清帝的南巡关系到清王朝的安危和大一统。因此，也是康乾二帝不得不为的战略选择。

北狩 即木兰秋狝大典。康熙二十年（1681），清廷设立了以“肄武绥蕃”为目的的皇家狩猎场——木兰围场。其地位于“蒙古各部落中，周一千三百余里，南北二百余里，东西三百余里。”北控蒙古（今内蒙古与蒙古国），南拱京师（今北京），东通盛京（今沈阳），西临察哈尔（今张家口），是京师通往内蒙古、喀尔喀蒙古和东北黑龙江的重要通道。到嘉庆二十二年

（1817）九月，嘉庆皇帝最后一次木兰秋狝止，前后一百三十余年，历朝清帝共举行木兰秋狝105次。故清代学者魏源说：“我朝抚绥蒙古之典，以木兰秋狝为最盛”。^①

当时清廷规定，每年行围“派兵一万二千名，分为三班，一次行猎播兵四千”，并令宗室及各部院官员随从。分班随围的还有青海蒙古、喀尔喀蒙古、内扎萨克四十九旗王公贵族、察哈尔八旗的蒙古官兵。乾隆时，从猎的蒙古王公多至百余人。

行围期间，清帝与蒙古王公礼宴往来。席间还有号称“塞宴四事”的“诈马”（赛马）、“什榜”（蒙古传统演奏）、“相扑”（摔跤）等极富民族特色的活动。同时，清帝亦赏赐蒙古贵族大量的绫罗布匹、金银瓷器、鞍马弓箭等。通过木兰秋狝等一系列活动，清廷既炫耀了武力，又

^① 魏源《圣武记》岳麓书社2010年。

加强了同满蒙贵族之间的联系，故清代史学家赵翼曾称赞说：“上每岁行狩，非特使旗兵肄武习劳，实以驾馭诸蒙古，使人畏威怀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①

嘉庆帝亦说：“秋猕大典，为我朝家法相传，所以肄武习劳，怀柔藩部者，意至深远……驻蹕避暑山庄，岁以为常，敕几勤政之暇，款洽蒙古外藩，垂为令典……若以山庄为从事游览，则京师宫馆池籞，岂不较此间更为清适，而必跋涉道途，冲履泥淖，远临驻蹕乎？朕之敬遵成法，不敢偷安。”^②

不言而喻，清代的北狩，实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正如乾隆皇帝所言：“我皇祖建此山庄与塞外，非为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然而凜天威，鉴前车，查民寔，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业，惩晏安之怀，所全者大，则其小者有不必修矣！”^③

西巡 即西巡五台山礼佛。《山西通志》记载，“国家绥柔蒙古，特兴黄教。宏启宗门，藉资控馭，是中外义安，边民享升平之福者逾二百祀。而清凉五顶近邻郊圻，岁或再至。怀柔最先，所以迓休祥而带乐利者，典尤巨焉。”^④这就是说：清朝统治者在五台山大兴黄教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达到“以黄教绥柔蒙古”的治国之策。康熙三十七年（1698）正月，第三次朝拜五台山之后，清廷便开始大规模的建设黄教寺庙，先后有达赖一系黄庙二十一座和章嘉一系黄庙六座，五台山实际上成为内地最重要的藏传佛教中心。

同时，清廷让统辖蒙古、青海佛教事务的大活佛章嘉呼图克图常住五台山镇海寺。以借助宗教怀柔人心，使得蒙古各部与清廷及内地关系日渐交融，有利于民族融合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

东巡 所谓“东巡”，就是清帝出巡盛京（今沈阳）、吉林等地。这里是清朝的发祥之地，祖宗陵寝所在。入关之后，曾有四位皇帝先后十次赴东北谒陵，康熙帝三次、乾隆帝四次、嘉庆帝二次、道光一次。

在谒陵的同时，行围习武，考察吏治，联络蒙古，关心农牧，修葺城垣，提倡文化，其中康熙帝第二次东巡（康熙二十一年1682），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抵御沙俄的侵略，故远行至松花江上吉林船厂，其意义更为重要。

清朝统治者的东巡，一方面宣扬“法祖”“孝治”等政治理念；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东巡中的阅兵行围活动“用习武事而昭家法”，倡导满洲的“尚武”精神。同时，亦借助地缘之便，联络周边少数民族、稳固满蒙联盟，切身履践“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当是时，蒙古王公闻知皇帝东巡，纷纷来朝。康熙帝在沿途行宫召见，宴会赏赐，以此宣示恩威，收笼络怀远之效。

巡狩是历代帝王的重大政治活动，驾出巡幸，要别造宝印携行，加“行在”字样。内外大臣的奏章由内阁汇齐，三天一送行在。故巡狩不是娱乐游玩，而是与清帝在三山五园一样园居理政、统治天下不可或缺的政治活动。

（未完待续）

① 赵翼《檐曝杂记》卷1，蒙古诈马戏，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 《清仁宗实录》卷101，嘉庆七年七月甲午。

③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初集，卷43，避暑山庄百韵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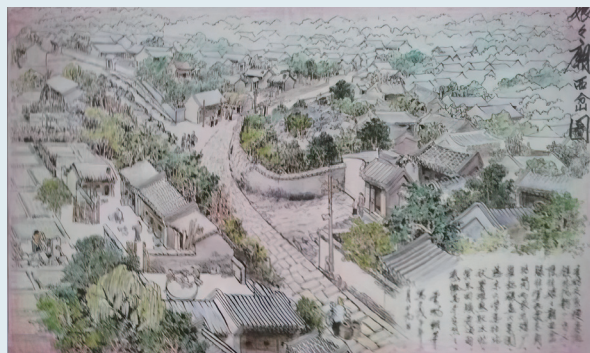
④ 《山西通志》卷81，巡幸记。

军机处里燕京人

关家麒



军机处三号院(对着两棵大槐树中间的那座)(作者供图)



娘娘庙西岔(作者供图)

老海淀镇上曾有条军机处胡同，里面居住过燕京大学的人士。这条胡同有些来历。

清雍正年间为平定西北准噶尔叛乱，于雍正七年（1729）成立军机处，是朝廷中枢影响最大的一个机构，军机处的全名叫“办理军机事务处”，设在清宫隆宗门内，有“值房”三间，这个机构为清朝所独创。

海淀古镇位于京城西郊，皇室在这山清水秀之地修建有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颐和园、万寿山）、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等皇家园林，谓之“三山五园”，做为皇帝的

行宫或夏宫。又把周围的承泽园、蔚秀园、淑春园、鸣鹤园、镜春园、朗润园和熙春园等或建或赐给皇亲国戚、王公贵族们作为花园别墅。皇帝每年有多半时间住在这里，军机大臣们必须随时应召承旨、启奏军情。于是朝廷就在附近的海淀镇另设一处“值房”，叫“外值庐”，以便辅理政务。大臣们在附近建有宅邸多处，形成了一条小街，久而久之这条军机处“值房”所在的小街就被称做“军机处胡同”了。

笔者生于海淀镇香厂子，长在娘娘庙西岔3号，离军机处咫尺之遥，学龄前常跟随我姥姥去



老虎洞和军机处南口的交汇处（作者供图）

老虎洞买东西，军机处是必经之地，不知走过多少遍。在二十世纪30年代，一个儿童眼里所看到的军机处是这样的：

娘娘庙西岔东起娘娘庙，是一条自东向西北倾斜的大鹅卵石路。从我家出来向西不远就是一个三岔路口，这里有个陈记小铺，卖些烟酒糖食、油盐酱醋之类。从小铺往西北这条路直通燕京大学南校门，是父亲去燕大上班和我去燕大附小上学之路；从小铺往西南上一斜坡就到了军机处。这是条很特殊的胡同，呈“J”形，图中横划是东西走向，很短约三四十米，竖划是南北走向，很长约一百米。上坡进入军机处后，在胡同由东往南拐弯之前，有几座坐北朝南的大宅院，其中一座门口是一个高台阶，大门两侧各有一座四方石墩，正对着大门两棵粗大的老槐树，常有人坐在那里乘凉。拐过去往南走不远右手有一座大院，两扇很洋气的大铁门标志着主人的身份。左手即胡同的东侧是自北至南很长的一段围墙，几乎没有住户，里面是个果园或菜园，经常看到一位秃头的工人在园里浇灌耕作。

军机处南口就是很热闹的老虎洞，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街，是海淀镇的商业中心区。在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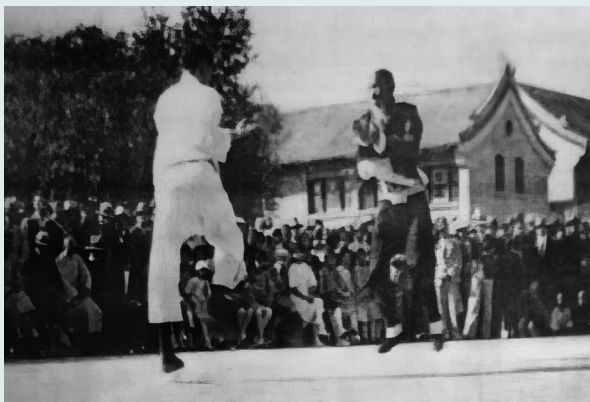


李剑华教授的燕大学生正在舞剑（作者供图）

机处与老虎洞的西北拐角处是一家当铺，里面的柜台比小孩儿的身量还高。过了当铺就是老虎洞路北的店铺，记得有吴德利茶叶庄、卖清真糕点的祥凝斋、还有一家香料铺、宝丰斋饽饽铺和一家澡堂子。路南有一家叫“小麻铺”的，卖些针头线脑、手绢绒线等布饰用。老虎洞西口就是清梵寺，每年腊月十五到三十举办春节庙会。

以上就是笔者幼年时看到的军机处和它周围的当年景象。

笔者成年以后，接触到不少与军机处有关的信息，但都没有在意，直到2012年年末在三亚遇见了燕大附中的学姐吴滨江，才知道她当年就住在军机处。吴大姐比我高三届，我们近年来曾在燕大校友返校节和张茵陈老师家里等多次见面，但彼此不熟。这次可谓是他乡遇故知。学姐变化不大，仍然是嗓音洪亮，说话干脆、爽朗。我俩彼此见面都很高兴，谈起当年的母校、老师、同学和校园，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就仿佛回到了美丽的燕园，回到了美好的少年时代。共进午餐时，谈到她在上燕大幼儿园时住在军机处三号，大门外有两个石墩，对着大门有两棵大槐树……突然唤醒了我沉睡八十多年的记忆，这不就是我幼年时经常走过的大门吗？原来我们还是相隔



在李剑华指导下的燕大学生正进行武术表演（作者供图）

不远的邻居啊！此时此刻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军机处3号大宅门，坐北朝南位于胡同即将拐弯的地方。房主李剑华先生，1940年燕京大学成立体育系后，被聘请为讲师。次年燕大被日军占领后，李先生连同全体师生员工离开燕大。抗战胜利后燕大复校，1950—1951年李先生回燕大体育部继续执教。

李剑华先生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十九世纪80年代末。祖上来京做有不小的生意，李家在海淀镇有宅院三处，即军机处胡同3、4号和斜对面路东的一座。李先生自幼读私塾，后来读商业学校，从汇文学院肄业后担任汇理银行职员，1924年后被海淀工商界推选为商会会长。李先生还是位武术家，曾拜清河武术大师范石山学习拳术，拜刘凤春学八卦，拜吴鉴泉学杨派太极拳，并联合京城诸多武林好友在西单开办北京体育研究社，请各路武林高手研讨传授各派武功，乃北平武术界的知名人士。1928年前后体育研究社改为北平市国术馆，馆长许禹生推荐他去东北大学教练武术，由于他武艺高强，深受师生欢迎。九一八事变后李先生回到北平，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平大工学院任体育讲师，在先农坛体育专科学校任训育主任。南京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也请李剑华



吴滨江（后排左1）在燕大幼儿园（作者供图）

先生任参事。七七事变后，李先生只在体育专科学校任教，在海淀镇上开设义顺祥粮店、福丰碾米厂以维持生计。1940年被燕京大学聘为体育系讲师。他在担任海淀商会会长期间，多次举办公益事业，开办学校、粥厂等。1948年人民解放军对北平完成战略包围，经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员许京祺建议，由李剑华与燕京大学教授褚圣麟、严景耀组成三人小组前去西直门与市政府交涉，同意派几十名警察回海淀维持地方秩序，解放军进驻海淀镇后，他又积极组织海淀商家支前。在此期间，李先生还出面借钱粮，为经费紧张的燕京大学支付了一个月的开支。

1954年李剑华先生去国家体委、市总工会所办的体育学校教授武术课，在《新体育》《体育译丛》《体育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研讨武术理论。他曾有一张习武照片登在《人民画报》上。1958年召开的全国武术表演大会上，他被聘为副裁判员。临终前他还在撰写《陈氏太极拳》一书，未及完稿即于1963年病逝，享年74岁。笔者在燕大附中读书时，常看到李剑华先生在燕大东操场给学生上武术课。李先生高挑身材、精神抖擞地做着示范动作，尽显一代武术家风范。



军机处胡同早已不复存在，当年3号院门前的两棵古槐仍保留于北大一食堂前（作者供图）

燕京大学理学院1937年录取了一名新生叫李维城，他就是李剑华先生之子，毕业后工作一段时间又考入物理系读研究生。他不仅擅长物理，还博览群书，精通英文和中国古典文学，在校期间曾长期兼任燕大附中物理课教师。学姐吴滨江家租住的军机处三号院就是李家的房产，李剑华全家住里院，吴滨江家住外院，两家既往里外院又是世交，吴父曾委托李维城做她的家庭教师。据吴滨江学姐回忆：“我每天放学后就背着书包去他家做功课，他边看书，边辅导我。做完功课，他还教我一些课外知识，他可以说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他的长期辅导下，我小学就能熟读唐诗三百首，在历史、地理、自然、英文方面也有了较大的长进。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他给我讲了许多日寇侵华和强占燕京的罪恶事实，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仇恨日本军国主义和热爱祖国的情感。

1992年11月，我又去看望李维城先生，走在路上就好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此行我还能不能见到恩师？因为他已被病魔缠身多年了，果然

一进门师母就告诉我，他已于10月份与世长辞了。呜呼！我的恩师，学生永远怀念您！”

吴滨江学姐从小就入燕大幼儿园、燕大附小、燕大附中，对燕大怀有很深的感情，对燕园有着极其美好的回忆，对燕大毕业的三位恩师终身不忘，一位是教语文的张茵陈先生，一位是教音乐的杨周怀先生，一位就是教物理的李维城先生。她动情地说：“一个好的老师，不但学识渊博，教学有方，还能和学生和睦相处，其对学生的感染和影响力有时甚至关系到一个学生的一生。”给她印象深刻的燕大附中老师还有教生物的王平先生，教数学的曹飞羽先生，教音乐的全如玢先生。

吴滨江对军机处3号故居也充满了眷恋，她描述说：“里外院都很大，全是青砖墁地，里院正中摆着一个大鱼缸，鱼缸里养着许多各式各样的金鱼，院中还放着许多大花盆，种了石榴树和各种花草……西屋窗外有一棵比房子还高的大杏树，春夏之交枝叶茂盛，把屋内的阳光都夺了去，当粉红色的杏花竞相开放，挂满枝头的时候，抬



1992年11月吴滨江（右一）在参加全国妇联执委会中与胡锦涛、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黄启琛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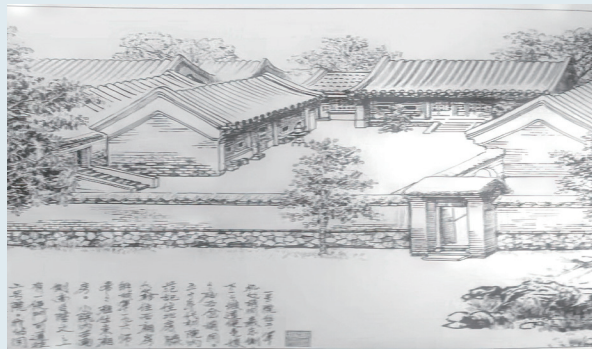
（作者供图）

头一看，蓝的天，白的云，绿绿的树叶，形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外院也栽种了榕树、海棠树、杏树、灯笼树，棵棵茁壮成长，给她们全家增添了无穷的樂趣。

吴滨江学姐后来长期在山西工作，由于努力工作、成绩突出，被选为省政协委员、常委，在担任25年的政协委员期间，三次被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两次被选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1995年作为山西省代表参加在北京举办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并获得嘉奖。

军机处3号的故事，引起笔者对军机处胡同的兴趣和注意。嗣后经过查阅资料、搜索信息和无数次电话咨询健在的老校友，考证核实，笔者发现原来这里住着许多燕大的教职员和附中的校友，3号院已经说过了，现在就回过头来从1号院说起吧。

从东面走入军机处需先上一个斜坡，路北第一家就是1号院，西隔壁是2号院，这两个院都是“随墙门”普通的平房，属于清华大学的宿舍。1号住的是在清华财务处工作的滕继舜先生，他女儿滕棣华是燕大附中校友，比我高四届。滕棣华1949年5月由燕大的张秀贞、谭恩菊两位



军机处胡同1号院（作者供图）

老师介绍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次年在通州女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历任通州女子师范、北京通师、石景山师范语文教师、教研组长、教导主任。被评为师范类高级讲师，获北京市颁发的连续从教三十年以上的教师奖牌。

1948年解放军入驻海淀，因1、2号院有些空房，经清华大学同意，某部的政治部领导机关便住进了2号院。2号院和1号院中间的墙有小门相通，在此环境下，燕大附中同学吴洪源、韩荣实、韩荣宽、韩成、张家骥就是在这里参军的。他们参加的63军文工团看中了1号院宽敞平坦，就在院子里排练歌剧《王秀鸾》，在海淀上演若干场，春节时还举行军民大联欢。1951年3月，66军从朝鲜回国，196师驻扎海淀，师部和师长、政委等首长就住在1、2号院。

走过路北的1至4号四个大院，向南拐就是南北走向较宽的胡同。路东6号院居住的是名医李天爵大夫。他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后留学美国，1931年受聘于燕京大学任校医，1935—1940年任燕大男校的医务主任，男校医务处即燕京人通常所说的男校医处。离燕大后他在院里开设“西医李天爵诊所”，把西医、西药带给海淀镇上的乡亲，对疟疾、小儿麻痹、大脑炎、痢疾等病的



现年93岁的滕隸华老师(作者供图)



李炳衡烈士(作者供图)



陈其田先生(作者供图)

治疗立竿见影，他医术高、医德好，是镇上的名医之一。

李天爵医生的儿子李炳衡生于1928年，小学时上燕大附小，接着读燕大附中，受家庭及燕园环境的影响，他具有较好的英语水平。1941年燕大被封，年仅13岁的李炳衡跟随一些爱国青年离开北平，辗转到重庆上了两年中学，后又到昆明边学习边在美国派驻中国的军队中当志愿服务人员。这些经历使他的英语听、说能力得到极大提高。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平，1947年从中国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新闻系，在燕大期间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当选为学生自治会委员。他性格活泼开朗，文娱体育活动样样都行，而且平易近人，很快就和不同系不同级的同学打成一片，大家亲切地叫他“歪毛”。他擅长打棒球，笔者在东操场看燕大队与美国学校队棒球比赛，李炳衡是“游击手”(Short Stop)，在场上非常活跃，观众啧啧称赞。

1949年初北平刚解放，李炳衡就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工作于新华

社广播电台英播部、国际新闻局、对外新闻编辑部。后又赴朝做美军战俘的采访宣传工作，凭着他流利的英语使战俘解除顾虑，自愿参加战俘录音的达千余人。在朝鲜期间他改名李平。1954年他作为特派记者参加日内瓦会议。由于他在新华社短短几年的出色工作，1955年被定为中国记者团成员去印尼参加万隆会议，不幸飞机被敌特爆炸而牺牲，年仅27岁，被追认为烈士。八宝山烈士陵园内矗立的那座万隆会议烈士纪念碑，寄托着对烈士们的悼念和哀思。

军机处8号院住的是燕大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陈其田教授。他早年赴英国在伯明翰大学主修经济，曾用英文出版多部专著，其中有《左宗棠：中国现代造船厂和毛纺厂的开拓者》《中国现代工业技术的先驱：林则徐、曾国藩和左宗棠研究》等。陈其田先生所著的《山西票庄考略》一书，对山西票庄兴起和衰落的原因进行全面梳理，分析山西商人、山西票庄的派别、组织和经营管理，对日后研究山西票号的历史、经营管理和晋商的兴衰提供重要参考。他于1929年入职燕



亚非会议飞机遭难的李炳衡等烈士在八宝山的纪念碑
(作者供图)

大，1930—1937年任经济系主任。1934年夏，由顾颉刚、郑振铎、谢冰心、吴文藻、文国鼎、雷洁琼、陈其田、容庚和赵澄组成“平绥沿线旅行团”，实际上是进行社会调查，考察开发西北的重要前景。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燕京大学成为孤岛，在艰难时事下陈先生就任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

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燕大，陆志韦、陈其田等十几位教授和学生遭逮捕，被囚禁于沙滩红楼日本宪兵司令部监狱，受尽煎熬折磨。狱中，陈其田与其他师生坚守爱国情操。日军查不到抗日证据，只好给他安上个“向学生灌注抗日思想”的罪名，于1942年5月16日宣判后释放。陈其田先生被判处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陈先生的女儿陈宝琪1946年毕业于燕大附中，在轻工业部基本建设司退休，已故；她的弟弟陈季琪也是燕大附中学生，毕业于1947年，在南京化工大学教学直至退休，现已九十多岁，尚健在。

军机处甲8号就是笔者幼年时看到的有两扇大铁门很洋气的大院，1950年前后住的是王宗宁，他是燕大附中学生，比我低一届，李炳衡是



1934年7月，北京文化名人西北旅行团在考察中与傅作义合影（左二起：雷洁琼、郑振铎、顾颉刚、傅作义、陈其田、吴文藻、文国鼎、冰心）（作者供图）

他舅舅。前几天打电话给南京的陈季琪学长，据他说李天爵医生后来从6号搬到了甲8号，这就证实李家确实住在这里，李大夫的外孙王宗宁住这里也就顺理成章了。

笔者上初一时，父亲拿回来一本书，书名《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着中国》），读后知道它的作者是在燕大教书的一位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后来听说也曾在甲8号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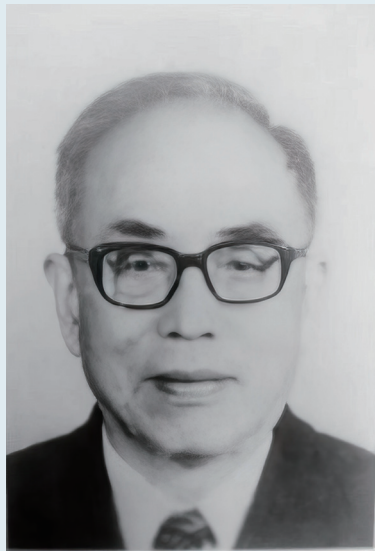
李炳衡有位表姐叫王碧霖（燕大学号W41107），也就是李天爵医生的外甥女，她1940年从慕贞女中毕业被保送燕大，次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转入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学习。1945年日寇投降燕大复校，王碧霖再次回校就读于教育系。在席卷全国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她积极投入并被选为学生自治会副主席，1948年参加共青团前身的民青组织，被当局列入进步学生大逮捕名单，在地下党帮助下离开燕园，跑到河北泊镇的解放区。1942年2月初随军入城，被分配到北京市教育局并参加接管学校的工作。1956年以后长期在市第十一中教授英语，被评为特级教师。她著作等身，在北京和中国教育学会担任市英语



埃德加·斯诺 (Edgar Snow)
(作者供图)



王碧霖 (作者供图)



侯仁之先生 (作者供图)

奥林匹克学校校长、教育部教材审查委员等要职。曾被评为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北京市劳动模范，曾任市政协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军机处 10 号住的是燕大历史系教授侯仁之先生，他 1932 年毕业于通州潞河中学，经保送燕大历史系（学号 32053），1936 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转为历史系读研究生，1940 年获硕士学位。此后继续留校任历史系助教，开始授课，同时被任命为“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夏仁德教授负责解决生活困难学生的经济资助问题，而侯先生负责帮助志愿离校参加抗日的学生安全离校。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次日，日军查封燕大，师生 20 余人被捕，侯先生也在其中。幸而日寇对燕大学生直接参加抗日战争之事一无所闻，遂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所谓罪名，对侯先生判以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

侯仁之经导师洪业（煨莲）教授建议，潜心

研究历史地理学。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寇投降，燕大复校，他继续完成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专题，在《燕京学报》上发表“北平金水河考”。又经燕大保送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深造，获博士学位回国。先后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改革开放之后，侯先生进行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出国讲学和科学研究。荣获美国地理学会颁发的 George Davidson 奖章，“何梁何利基金 1999 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该基金奖励通告中说：“他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的起源、发展和历久不衰的原因，对首都城市规划、水利建设、旧城改造、古遗址保护等做出了重大贡献。”

侯先生二十世纪 30 年代在燕大教书时，曾在军机处 10 号院居住，据侯仁之、张玮瑛夫妇的爱女、燕大附中校友侯馥兴说，侯先生是骑车去上课。她没说走什么路线，但我想当年侯先生一



侯仁之、张玮瑛夫妇（作者供图）



早年的老虎洞街·（作者供图）

定是从10号院出来，向北骑到军机处北口，下坡从冰窖西面骑到燕大南校门的，军机处应该留有侯先生的足迹。

遗憾的是没有留下侯先生的足迹，也没有留下上述所有燕京人的足迹，天空还是那片蔚蓝的天空，可是地上的军机处胡同已经彻底消失，留下的只有对故人的怀念和对胡同宅院的模糊记忆。幸而在书写本文时，重温和还原了儿时的美好回忆：那有着两个石墩的大宅门、两棵老槐树、一排典型的老北京大宅院、两扇大铁门里很洋气的院子。

更知道了里面住的都是谁，知道了那条热闹的老虎洞原来有“小大栅栏”之称，知道了拐角处的当铺叫“义兴”，香料铺叫“万香楼”，澡堂子叫“茂记”。还有意外的收获就是确认了吴德利茶庄是燕大附中校友吴恩福、吴恩禄的吴家开的，宝丰斋饽饽铺是我的同班同学简承源家开的。

军机处胡同虽已不在，但曾住在海淀镇的老年人心，那个地方仍然历历如昨，难以磨灭。正是：

海淀古镇何处寻？
京城西北美名闻。
商铺林立老虎洞，
军机处里多故人。

注：本文的钢笔画插图均取自郭云鹏的钢笔画集《北京海淀古镇风情》，特向郭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1. 《燕京大学史稿》，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人民中国出版社；
2. 《海淀文学—商海变迁》，王珍明主编，开明出版社；
3. 《燕京大学人物志》，燕京研究院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4. 《我家的悲欢离合》，吴滨江编著；
5. 《燕京大学校友通讯录》，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印；
6. 《海淀镇记忆》，海淀区图书馆地方文献出品，开明出版社；
7. 《北京海淀古镇风情》，郭云鹏钢笔画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怀念与张宝章先生的交往

吴剑群



与张宝章先生合影（2011）（作者供图）

惊悉“三山五园”研究的旗手、著作等身的文史研究大家、由海淀政协原主席成功转型的清史研究巨擘——张宝章先生于2025年2月5日仙逝，享年93岁。我倍感悲痛。

我与宝章先生的交往，始于1995年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在燕山大酒店召开的年会上。当时，我与先生聊了一会儿，先生就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我。回到家中给先生寄了我发表的文史文章即得到先生的认可。如今与先生结识已30载，

似弹指一挥间。

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我出生在北大勺园，在海淀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中年时期，我的人生与海淀息息相关，我的生命打有海淀深深的印迹，我对海淀怀有无限眷恋之情。2011年、2017年我的《圆明园景观史略》和《丹棱纪事》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两本书得益于海淀史志办同志的帮助。

宝章先生看到后说我的文章“别有新意”。这种肯定与支持，让我铭记在心。张先生还将他写的《京西名园》《雷动星流》《曹雪芹和香山》送我，并在每本书上都题签、盖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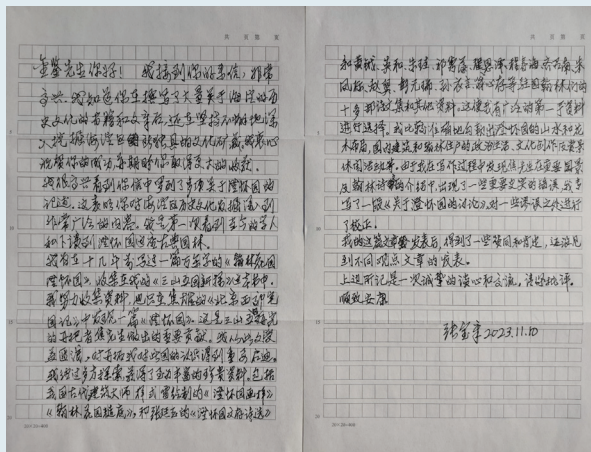
2006年我给先生去信，交流“自怡园”的位置、向先生请教关于圆明园八旗印房以及香山护军营的事情，张先生都回信认真地一一解答，使我受益匪浅。信末先生谆谆告诫我：“做学问是一件清苦艰难的事，当然也有乐趣，需要持之以恒，深入开掘，你的艰苦跋涉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希望你继续努力，新获及更大的进步，顺祝笔健。”

先生对我在学术上的爱护与提携，是我莫大

的荣幸。要知道宝章先生是我国研究“三山五园”的巨擘，我仅仅是个文史爱好者，与先生无法相比。

2023年11月，我给宝章先生去信，请教关于澄怀园的问题（我觉察到这座紧邻圆明园的重要园林——翰林园，至今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它可是几代皇帝身边的智囊团），张先生回信说：“我曾在十几年前写过一篇万余字的《翰林花园澄怀园》，收集在我的《三山五园新探》这本书中。我努力收集资料，也只在焦雄的《北京西郊宅园记》中发现一篇《澄怀园》，这是三山五园研究开拓者焦雄先生做出的重要贡献。此文对开拓我对此园的认识是重要的启迪。我经过多方探索，获得了丰富的珍贵资料。包括我国古代建筑大师样式雷绘制的《澄怀园画样》《翰林花园糙底》，张廷玉的《澄怀园文存诗选》和黄钺、英和、朱珪、祁隽藻、程恩泽、程春海、齐召南、朱凤标、赵翼、彭元瑞、孙衣言、翁心存等驻园翰林们的十多部诗文集和其他资料。这使我有广泛的第一手资料进行选择。我比较准确地勾勒出澄怀园的山水和花木布局，园内建筑和翰林住户的政治生活、文化创作及赏景休闲活动等。由于我在写作过程中发现焦雄先生在重要园景及翰林诗文的介绍中，出现了一些重要史实的错误，我专写了一段《关于澄怀园的谈论》，对一些谬误之处进行了校正”。宝章先生的回信，坦荡而有情理，不仅说明他将澄怀园的翰林琢磨透了（他将驻园翰林们的十多部诗文集都熟读了，这使得宝章先生对澄怀园了如指掌）。他承认焦雄先生在研究皇家园林的开拓性，并指出其存在谬误，实在是位了不起的学术带头人。

宝章先生博览群书，潜心于明、清实录、杂记史籍之中，深入挖掘、融会贯通、著书立说，



张宝章先生关于澄怀园的回信（作者供图）

他对北京西郊清代盛时三山五园及其周边的王公府邸及私人园林了如指掌，对其历史背景、思想内涵和艺术手法有独到的见解与评价。他创作有《京西名园寻踪》《静明园述往》《畅春园记盛》《乾隆三山诗选》《雷动星流》《图说“西山永定河”文脉：三山五园》《三山五园新探》等多部关于西郊园林的著作。《三山五园新探》洋洋洒洒90万字，是首次对整个三山五园进行较全面研究的学术著作，史料丰富扎实，内容新意迭出，被称为海淀区三山五园的“百科全书”，其中对畅春园进行首次全面梳理，对静明园、样式雷家族的研究，都填补了空白，是京西清代园林文化研究的扛鼎之作。他主持编纂的关于海淀方面的书籍与史籍近50部，奠定了先生成为我国三山五园研究大家的地位。“宝章先生这样的学者极少极少，或许再无人与其比肩”（张文大语）。

我人生能遇到张宝章先生这样的大家倍感荣幸，衷心感谢先生对我学术上的帮助与提携。先生能给我予以写作指导与帮助让我终生难忘。先生虚怀若谷，谦逊、平和的为人，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宝章先生千古！

白十源与奥美大会及其他（下）

胥天寿

（接上期）

策划马帮进京。云南茶马古道,是从唐代起,在中国西南地区形成的以茶叶为主要交易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商品贸易通道。其地跨云、贵、川、陕、甘、青、藏等地,外延达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作为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在存续的千余年间,推动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团结。2013年茶马古道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5年,为恢复传统文化,再现一百多年前云南马帮送茶进京的历史,白十源和朋友们策划“马帮进京,普洱茶文化北京行”活动。为保证活动的顺利实施,他们提前组织一些赶马人和12匹骡马,穿越西双版纳无人区,进行为期5天的极限试验,以获得马帮饲料供应和人员食宿的经验。是年5月1日,由云南贡山、宁蒗、腾冲、思茅、西双版纳、施甸六地的六支马队、共43名赶马人(从上千名报名者中选出)组成的云南大马帮,驮起地道的云南普洱茶,从普洱县城出发,开始重走古老的茶马古道,经过云南、四川、陕

西、山西、河北、北京6省市、78个县区,跨过长江、黄河,翻越乌蒙山、秦岭、太行山,历时5个多月,行程4125千米。马帮一路宣传茶文化,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如马匹不习惯在沥青公路上行走,马蹄经常打滑,有时干脆一路小跑;第一次遇到火车,马队被惊得四下逃窜;面对黑洞洞的隧道口,马匹吓得不敢前行;为避免扰民和回避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流,马队改为夜行晓宿,打乱了马匹的生物钟;遭遇河堤崩溃、国道大拥堵等等。各种传媒一路跟踪报道,在全国引起轰动。马帮每进入一座城市,都有警察在前面开道,马路两侧挤满了热情的围观市民。10月14日,这支长达1千米的马队,时隔166年再次出现在北京街头,受到市民们贵宾般的礼遇,大家就像穿越时空一样,目睹了古代才有的茶马古道和马帮,品尝到南国来的“贡茶”。此次马帮进京,通过义卖、拍卖普洱茶,五斤茶叶拍出160万元,分别在滇、川、陕、晋、冀等省援建“希望小学”。这是一次茶文化的大宣传、大普及,促进了茶叶市场的繁荣。

收藏大运河老照片。京杭大运河,是在春秋

时吴国开凿邗沟，隋朝时开凿贯通并大规模扩修改建至都城洛阳且连通涿郡（今北京），元朝时弃洛阳而裁弯取直至北京的一条沟通中国南北的人工河道，全长 1794 千米，至今已有 2500 余年的历史，为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一条人工河道。2014 年 6 月，京杭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大运河申遗成功后，该做的事情就是如何保护、利用和发展大运河。就保护而言，需要有史料作为依据。而最能还原运河历史的资料，就要数早期的照片了。

白十源一直关心大运河。他以超乎常人的文化敏感，很早就意识到大运河一定会受到社会和国家的重视，并一定会兴起运河文化热。同时，作为一名收藏家，白十源敏锐地意识到，对于保护、传承运河文化，历史老照片非常重要。老照片作为历史的瞬间，其所呈现的历史信息，具有直观性、证据性和不可替代性，可以用具体的形象弥补文字难以传递的信息，为后人提供了解过去生产生活方式的窗口。2000 年前后，白十源同摄影家张超音一起，开始在国外大海捞针，寻找大运河老照片。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寻找到二十世纪早期京杭大运河沿线景观老照片几千张。这些照片，是一位西方摄影师用一年多的时间，从北京开始，沿大运河一直拍摄到杭州的，涉及码头、驳岸、古桥、牌坊、坛庙、水街水巷、古街巷、古民居、游船、古灯、纤夫等运河沿岸建筑以及运河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社会活动等。这些照片，揭示了大运河的历史风貌，可以让人清晰地感受到大运河曾经的繁忙和盛大，历史价值非常之高。

集纳思想汇聚人才。白十源的艺术品收藏与时俱进，他在保护古代艺术、收藏古代遗存的同

时，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也非常关心与支持。他说“收藏是判断的艺术、等待的艺术、认知的艺术”。他不仅收藏有大量古代珍贵的金石陶器、古玩杂器、书法绘画等，而且对收藏现当代艺术珍品非常感兴趣。

在这个过程中，白十源集纳思想，汇聚了大量艺术人才。如他在坦博艺术中心开办名家御窑创作中心，引入景德镇明清官窑制瓷技艺，先在景德镇制作出瓷胚，然后请在京的当代艺术名家对这批瓷胚进行艺术创作，再拿回景德镇去烧制，期望创作出融明清官窑制瓷技艺与当代大师艺术创作于一身的瓷器精品。



坦博艺苑内景（林琳供图）

白十源收藏有当代画坛大家黄永玉、范曾等的精品力作，也支持培养推动了一大批新锐艺术家如墨客、崔自默、蒋山青等人的创作。其中墨客的画作在 2011 年春拍市场上，取得单季成交额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的佳绩；中国书画协会主席崔自默，无论书法、篆刻、国画、油画还是漫画、雕塑、摄影等等无所不精，被誉为“五百年来一奇才”；蒋山青的作品被艺术大家称为“当今最好的水墨画”。白十源不但具有识才慧眼、惜才仁心，更愿意培育人才。他鼓励新人创作，为他们提供创作条件，推出许多中青年书画家。如苏俊卿，福建南安人，“早岁北漂，文苑蹉

跚，商海浮沉”，30岁开始沉湎于书法，如痴如醉，50岁时获得白十源帮助和指导，进入坦博艺术中心深造，致力于汉魏摩崖刻石《西狭颂》《石门铭》的临摹，如鱼得水，学古不泥古，书艺大进，被文化部授予“中国当代优秀书画艺术人才”称号，书法作品入选第七届世界华人书画大赛，出版《苏俊卿书法集》等。

白十源利用坦博艺苑这个平台，发现、培养、扶持了许多艺术人才，把他们一个个推送到全国和世界的艺术舞台。白十源发现、培养、扶持艺术人才，大方慷慨，不遗余力，不计私利，完全出自对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 and 责任担当。他感情细腻，言语幽默，极具亲和力，懂得人的内心需求，总是鼓励朋友们解放思想、放弃陈见，因此获得了朋友们的信任。于是围绕白十源，围绕坦博艺苑，聚集起一大批艺术家。这些艺术家们，集聚坦博，风云际会，“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品评古今名作，创作惊人新品，“一时多少豪杰”。而白十源在这些中间，默默无语，倾耳悉听，偶有浅浅一笑，却欣慰之色毕现。白十源，是这群艺术家中的灵魂。

筹办“2008北京奥美大会”。2001年7月13日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之后，白十源意识到，北京奥运会是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最佳契机，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机会千载难逢，必须紧紧抓住。于是，他开始夜以继日地研究奥林匹克美术大会的信息和过往资料。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带领中国当代艺术家走上这个舞台，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他下定决心，全力以赴参与北京奥运会奥美大会的筹备与举办。

认准了的事情，白十源向来是说干就干。他主动和中国文化艺术促进会取得联系，并以自己的

热忱、智慧及在艺术品收藏界的名望与实力，获得国家认可，被确定为北京奥美大会的总策划。



2008 奥林匹克美术大会开幕式现场（林琳供图）

经过精心筹备，2008年8月11日，北京奥林匹克美术大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隆重开幕，成为与北京奥运会同步举行的奥林匹克艺术盛典。白十源作为总策划，通过大型艺术展览形式宣传奥林匹克精神，展现中华文化魅力，取得圆满成功，成果丰硕：相较于2004年的雅典奥美大会（56个国家和地区选送作品百余件），2008年的北京奥美大会（1.7万名艺术家提供作品）无疑规模要大得多。大会还邀请全球10位知名评论家组成评委会，评出5件金奖作品和850件参展作品。北京奥美大会得到了国际奥委会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萨马兰奇、时任主席罗格和一百多个国家的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国家领导人李长春、刘云山、刘延东、刘淇等出席开幕式并参观展览。

为确保北京奥美大会的顺利举办和圆满成功，当年5—7月举办奥美艺术作品展览的预展；为扩大奥美大会的影响，使更多人看到当代世界的顶级美术作品，当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在全国举办奥美艺术作品的巡展。

还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北京奥美大会的艺术家联谊会。展览是作品的相会，联谊会是艺术家的相会，它们都是文化交流和相互促进的好形式。

在确定北京奥美大会艺术家联谊会会址的时候，客观上讲，当时只要提出来，无论是人民大会堂，还是钓鱼台国宾馆，或其他重要场所，国家都会大力支持。但白十源想，将来参加联谊会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各国奥委会主席以及众多国际知名艺术家们，对现代的东西了解太多了，国内再现代的东西都不能使人惊叹；“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自己收集了那么多的古建筑，如果拿出一套展现出来，让参会的各国人员看一看四百多年前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们生活的状态，可能对他们更有冲击力，也更便于他们了解中国灿烂的传统文

为此，2007年，白十源在北京西山脚下的四季青把一个徽州明代古祠堂原汁原味地复建起来，命名为“坦博艺术中心”，作为奥林匹克美术大会中外艺术家联谊会的会场。

2008年8月12日下午，北京奥林匹克美术大会中外艺术家联谊会在这里举行，800余位中外艺术家出席。大家欢聚一堂，兴高采烈，挥毫泼墨，展示才华，互相交流，签名留影，乐此不疲，流连忘返……其中奥美大会金奖获得者墨客和银奖获得者崔自默联手共同手绘的兼具中西画风的《天地人和图》巨幅作品，表达了对北京奥运会和奥美大会的祝福。

中国有“以文会友”的传统。古代的文人聚会，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雅集”。其中著名的，有三国曹魏时今安阳的“邺下雅集”、西晋时洛阳的“金谷园雅集”、东晋时会稽（今绍兴）的“兰亭雅集”、初唐时豫章（今南昌）的

“滕王阁雅集”、中唐时洛阳的“香山雅集”、北宋时洛阳的“西园雅集”、元代时昆山的“玉山雅集”等，都传为佳话。就“文人聚会”的性质来说，我们是否也可以将北京奥美大会联谊会称为“坦博雅集”呢？所不同的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古代雅集一般也就十几、几十人而已；而今天的“坦博雅集”参加者竟达八百余位之众，且中国的外国的都有，堪称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世界雅集交流活动。这无论是在奥林匹克历史上，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2008年北京奥美大会的成功举办，使北京奥运会更美更光彩夺目，它成功地将一大批中国当代艺术家推向了世界文化艺术的舞台，促进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被外界视为全球视野中重建文化中国当代形象的重要时刻。

而这次世界文化活动的核心组织者，就是中国的白十源！

策划系列奥美大展。奥美大会结束后，白十源作为总策划和策展人，相继策划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并获得成功。

一是2009年8月在国家体育馆举办的奥运回顾展——“奥运记忆·中国当代艺术展”。展出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墨客的《奥运之光》《萌》，崔自默的《和谐盛世图》，蒋山青的《毓秀图》，刘宇一的百米长卷《奥林匹克颂》，刘墨的《万物之奥》，国际油画大师马克的《吉祥中国》以及楷书大家张瑞龄的书法作品，还有李英保、白敬周、范澎等名家的艺术精品，每天吸引了大批人员参观。

二是2010年8月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的纪念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两周年美术大展“梦想永恒·艺美重光——奥林匹克美术作品鸟巢回顾展”。展出2008年奥美大会获奖者墨客的《奥

运之光》、黄永玉《中国=MC²》等数十位艺术家的作品。这是鸟巢举办的第一个大型美术展览，是尝试将鸟巢打造成中国创意艺术中心的一次有益探索。

三是2011年8月在国家游泳馆“水立方”举办的“第一届艺术水立方国际书画大展”。大展主题是“汇聚·永恒”，蕴涵“奥运文化海纳百川”和“艺术永恒”之意，又暗合展馆的特殊属性，可谓构思精妙。参展的有我国当代著名的艺术家的作品，也有很多海外艺术家的作品，其中著名画家崔自默的巨幅画作《上善若水》获得金奖。

四是2012年的伦敦奥美大会。2008年白十源策划举办的北京奥美大会，获得国际奥委会和国内外文化艺术界的高度评价。2012年第30届奥运会在伦敦举办，白十源被特聘为伦敦奥美大会的总策划和策展人。这不仅是白十源的荣誉，更是国家的荣誉。



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美术大会启动仪式（林琳供图）

企业家做事，自然要考虑经济成本和回报。但白十源作为企业家，却不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待承办国际事务这件事。他认为，中国人受邀策划、主办在外国的世界性重大活动，表明中国人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和在世界舞台上发声和主导的权利，这是代表国家办事，必须办出精彩，为国争光。

此外，白十源还有一种带领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家走向世界、迈向世界文化巅峰的崇高理想。

筹办伦敦奥美大会，白十源及其团队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如再度筹措巨额资金，调度多方资源，协调各国艺术家等等，其中光亚洲艺术家就联系了200多位。

在组委会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白十源策展的以“泰晤士河·长城——拥抱世界”为主题的伦敦奥美大会于2012年8月1日在欧洲最大的艺术展演中心——英国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隆重举行。此次美展展出世界各地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500余位艺术家的美术作品，展出7天，4万余人次参观，成为一场国际文化融合与分享的盛会。国际奥委会文化与奥林匹克教育委员会主席尼科拉奥代表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说，“此次奥美大会，实现了国际奥委会始创者顾拜旦所颂扬的体育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五是2012年12月在国家游泳馆“水立方”举办的“第二届艺术水立方杯国际书画大展暨2012伦敦奥林匹克美术大会中国区巡展”。其中除展出100余位海内外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的百余幅国画、油画作品外，同时展出伦敦奥美大会全部绘画精品500余幅，将伦敦奥美大会的盛况真实地呈现给国人，让国人能够近距离观赏到世界顶级艺术家的美术作品。

六是2013年12月举办的“第三届艺术水立方杯国际书画大展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作品展”。大展展出艺术精品600余幅。

七是2014年8月，与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同时举办的南京青奥美术大展。大展展出来自79个国家的艺术家创作的艺术精品500余幅。其中有著名书法大家雒三桂历时半年创作的81章5000余字、面积达1050余平方米的巨幅书法作

品《老子·道德经》；有国际艺术大师崔自默独自创作的1045平方米的《大好荷山》；有抽象派色彩主义国际大师墨客独立创作的世界最大油画作品《盛世梵歌》；有崔自默创作的仅1.8平方厘米大小，却内含有山、水、树、石、题款、落款、印章等要素的水墨画《长河落日》；有著名画家童红生创作的当时世界最大写实油画《同在》等。在展览展出的国画、油画、书法、版画、雕塑、陶瓷等六大门类中，有世界最大的国画、最大的油画、最大的书法、最大的水墨画和最小的水墨画，成为迄今为止中国举办的一次最高水平的国际当代艺术大展，是国际奥林匹克艺术和世界美术史上的新的里程碑。

八是2016年10月在巴西国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里约奥美大会。此前8月，第31届奥运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简称里约奥运会。里约奥美大会以“巴西·中国——融合世界之美”为主题，以“艺术·让奥林匹克更美”为口号，展出100余幅中国、巴西、日本、新加坡等国际优秀艺术家的绘画作品。



2016年里约热内卢美术大展剪彩仪式（林琳供图）

九是2022年年初，坦博兴善苑举行的“迎冬奥历届奥美大会作品回顾展”。本次展览线上线下

上同步进行。是白十源及其团队在特殊情况下对奥美大会举办形式的新探索新尝试。

十是2022年3月12日在北京米座和坦博兴善苑举办的“2022奥美大会”和“冬奥之美·相约北京”艺术品展览。展览展出水墨之美、书法之美、篆刻之美、版画之美、雕塑之美、国际大美五大板块共近800幅（件）艺术精品。同时举办的“历届奥美大会作品回顾展”，以时间为轴，以主题为线，展示了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以来至2022年北京冬奥会14年间历届奥美大会的300余件珍贵档案和实物等文献资料，再现了历届奥美大会的精彩瞬间和丰硕成果。

2008年—2022年14年间，围绕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白十源担任总策划和策展人，先后成功举办了上述6次奥美大会及多次特邀展和巡回展。先后从83个国家、近2万名艺术家中，遴选出近3000位艺术家的3000余件作品参展。这些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涵盖中国画、书法、油画、版画、综合材料绘画、雕塑等各种艺术门类，堪称“艺术的奥林匹克”，充分体现了世界大家庭的和谐团结与“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展示了中国发展成就，传播了中国文化，为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推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得到了国内外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历届“奥美大会”的参展作品作为奥运文化遗产均留在了北京。

历届“奥美大会”，均由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主办，得到了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际奥委会、当届奥组委、当届奥运会举办城市政府及所在地驻华使领馆，以及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画院、中央美术学院等艺术院校的大力支持及国内外艺术家的积极参与。这其中，白十源作为奥美大会组委会的总策划和策展人，



白十源收藏的贝叶经（林琳供图）

亦即奥美大会的核心组织者，特别是在中国举办的北京夏奥、南京青奥、北京冬奥，从出资、构思，到组织、联络、运输、场地、布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汗水和智慧，为国家赢得了荣誉，扩大了奥美大会影响，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和繁荣，实现了奥林匹克美术大会的大满贯。由一个人策划组织五次奥美大会，这在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堪称奇迹。

打造文物“家园”，慷慨捐赠文物。经四十余年在国内和世界各地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地多方访求，白十源购藏到数百万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为了妥善保存这些历史文物，广泛传播、弘扬这些文物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使其损毁湮灭，以造福社会，经多年努力，白十源已经修建起众多展馆式建筑，作为这些文物的“家园”，将这些文物悉心保护起来并对外展出。如在北京海淀区四季青建起“坦博艺苑”；在北京大兴区魏善庄复建起 10 座徽式古建筑，营造了一个恢宏的坦博古典园林；在南京建起青奥会回顾展展馆；还有“贝叶经与丝绸之路文物精华展馆”“坦博钧天百琴堂”“坦博中国观赏鸽苑”“中国寝具和牌匾展馆”以及位于北京元大都遗址公园的“坦博艺苑展厅”等。展馆和展馆中展出的艺术品鳞次



白十源向双桂堂捐赠贝叶经仪式（林琳供图）

栉比、琳琅满目、美轮美奂、璀璨夺目，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文化价值。

为弘扬、传播文化，白十源向许多佛寺和文化机构慷慨捐赠文物。除向中国国家画院捐赠徽州古门楼、古戏台外，还先后向西安大慈恩寺捐赠佛舍利、贝叶经和金锡杖；向北京房山云居寺捐赠贝叶经；向庐山东林寺捐赠贝叶经；向新加坡居士林捐赠佛舍利；向陕西镇安县兴隆寺捐赠佛舍利；向洛阳师范学院中国大运河研究院捐赠二十世纪 30 年代西方传教士拍摄的 5000 张大运河老照片；向澳中佛教总会捐赠佛舍利和贝叶经；向河北定兴县大佛光寺捐赠贝叶经和佛舍利；向台湾十方禅林捐赠贝叶经；向厦门市政府和厦门美术馆分别捐赠巨幅美术作品《美丽厦门海晏山青》和《美丽厦门锦绣呈》；向南京奥林匹克博物馆捐赠美术作品《里仁》；向中国国家版本馆捐赠贝叶经和桦树皮文献各一部等等。

白十源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在世界日趋一体化的今天，更需要文化上与世界各民族美美与共。人称白十源为“传统文化的守望者”“新文明的使者”。就白十源在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做出的独特而重大的贡献而言，诚哉斯言，信哉斯言！

携手深耕研究传文脉 赋能海淀发展谱华章

——《海淀发展与改革研究》创办20周年的行与思

黄琪

【引言】

2026年是改革开放48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海淀发展与改革研究》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创办20周年。通过回顾20年发展积淀、纪实二十载薪火传承，笔者希望能进一步提升这一刊物的影响力与服务效能，汇聚各方智慧为海淀“十五五”发展改革工作注入新动能、新征程笃行谱新章。

一、初心如磐：应势而生，锚定发展改革使命

2006年，正值北京落实“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构想、全面推进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海淀区凭借科教资源富集、创新活力迸发的优势，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与改革创新的先行阵地。彼时，海淀区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成果层出不穷，行政管理体制、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改革走在前列。为整合辖区高校、科研院所、



期刊书影（作者供图）

党政机关、企业等多方研究力量，破解发展改革中的战略性、关键性难题，海淀区成立全市十八区县首家发展与改革研究中心，《海淀发展与改革研究》应运而生。

《海淀发展与改革研究》由海淀区发展和改



刊发的图表（作者供图）

革委员会主管、海淀区发展与改革研究中心主办，扎根海淀沃土，紧扣时代脉搏，以“服务决策、引领实践、推动发展”为初心使命，见证并记录着海淀区从创新突破到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历程，成为区域发展改革的“思想阵地”“决策智库”与“交流窗口”。

刊物创办之初，便确立了清晰的宗旨：为海淀各行业加快发展提供研究探讨阵地，为区委区政府推进改革提供决策参考，为社会各界参与海淀建设搭建互动平台。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时任主任丁向阳对此刊寄予厚望，要求海淀打造“三个结合”的高水准刊物——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相结合、理论研究与经验总结相结合、自我创新与社会革新相结合。这一初心定位，成为刊物二十年来始终坚守的原则，也奠定了其“立足海淀、服务发改、赋能发展”的底色。

2006年取得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接受市委宣传部审核。初期，出版物聚焦区域经济发展、改革攻坚、政策落地、基层实践等核心主题印发调研文章、政策解读、经验总结等内容，文风严谨、内容精准，快速成为海淀发改系统及各委办局、街镇交流工作、借鉴经验、启迪思路的

重要载体。

早期出版物的版式简洁、栏目简约，始终坚守“内容为王、质量为要”的务实原则，每一篇稿件都紧扣海淀发展实际，每一组数据都精准反映区域脉动，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及时、专业、可行的参考依据，也为海淀改革创新的探索实践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录。

二、迭代升级：守正创新，构建多元发展格局

从2006年到2026年，《海淀发展与改革研究》走过了不平凡的二十年。二十年来，区委区政府四套领导班子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给予关心厚爱，众多作者结合实际提供稿源、给予大力支持帮助，一代代编辑部成员用心血和汗水诠释了20年来经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重大探索，从最初黑白印刷，历经多次改版，实现了从“传统媒体”到“融合媒体”再到“智慧媒体”的两次飞跃。20年累计印发一大批兼具理论深度、实践价值与海淀特色的研究成果，编撰文字百余万，赠送十余万本，成为传递区域发展思路、凝聚改革共识、赋能决策部署的重要平台，成为在海淀区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有影响力的可读出版物。

20年来，伴随海淀区从“创新高地”迈向“发展高峰”，《海淀发展与改革研究》始终立足海淀发展改革实际，聚焦区域高质量发展核心议题，深耕政策研究、实践探索与经验交流领域。始终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在坚守初心的基础上不断突破自我，尤其2024全面改版以来，更是推动出版物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实现了从“单一读物”到“综合平台”的转型升级。

1. 版式设计焕新，彰显海淀特色与时代质感

2024年，启动全方位版式升级，打破传统政务读物刻板印象，实现视觉呈现与内容表达的深度融合。封面设计融入海淀区科技创新、产业发

展、城市建设、生态人文等核心元素，以简约大气的设计风格凸显区域亮点与发展活力；扉页、封底图文并茂，全景展现海淀区重大项目建设、重要会议活动、发改系统工作风采等内容，兼具史料价值与视觉美感。

内文排版全面革新，优化配色体系，采用蓝白为主、辅以科技蓝、生态绿等色调搭配，契合海淀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定位；丰富数据图表呈现形式，运用柱状图、折线图、示意图、“一图读懂”等可视化载体，让政策解读、数据对比、工作成效更直观易懂；优化文章框架设计，通过层级标题、板块分割、图文穿插等方式，提升阅读流畅度与舒适度，实现“专业性与可读性兼具、政务性与观赏性统一”。

2. 栏目体系重构，打造层级精准化内容矩阵

出版物始终以“服务发展、服务决策、服务落实”为核心，持续优化栏目设置，逐步构建起“版块统领、栏目支撑、内容精准”的层级化体系。2026年进一步优化整合，形成卷首语、海淀政声、海淀实践、海聚汇智、发改脉动、热点互动六大核心版块，下设20余个细分栏目，精准覆盖政策传递、实践展示、调查研究、经验交流、动态跟踪、政企互动等多维度需求。

“卷首语”提纲挈领，紧扣当期核心主题与时代大势，传递发展思路；“海淀政声”聚焦领导指示、政务要闻、专题报告，彰显政策高度与决策导向；“海淀实践”全景呈现区域发展成果、基层创新经验，展现实干担当；“海聚汇智”汇聚调研成果、前沿思考，新增“领先园区”“实地采访”等专栏，聚焦中关村科学城等重点园区建设与产业创新；“发改脉动”跟踪经济运行、项目推进、营商环境等核心工作，展现发改领域动态；“热点互动”搭建政企沟通桥梁，通过政

策速递、企业家访谈、建言回应等栏目，增强出版物互动性与影响力。栏目体系的持续优化，让出版物内容更贴合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决策需求，更聚焦海淀发展改革核心工作，实现“定位更精准、内容更丰富、导向更鲜明”。

3. 内容质量提升，坚守原创精品与专业导向

20年来，出版物始终将内容质量作为立身之本，建立“选题策划—资料收集—稿件采编—排版设计—严格审校—配送分发”全流程专业化工作机制。编辑团队秉持高度责任感与敬业精神，严把政治关、质量关、文字关，加强编辑设计人员专业培训，提升文字功底与设计水平；严格执行审校制度，杜绝差错疏漏，确保每一期出版物都成为精品力作。

在内容建设上，出版物坚持“精准定位、强化质量、调整布局、创新形式”四大原则，聚焦海淀区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深入挖掘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增加调研成果比重，为中青年干部提供展示交流平台，促进跨领域研究与经验共享；创新内容呈现形式，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双媒融合”，提升成果传播效率，让出版物既保持政务传播的政治性与严谨性，又兼具时代性与传播力。

三、实干笃行：深耕沃土，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海淀发展与改革研究》始终坚持扎根海淀、服务海淀，以文字为媒、以调研为基，全方位记录海淀发展改革的坚实足迹，多维度展现区域创新突破的生动实践，为海淀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智力动能。

1. 当好发展“记录者”，留存区域改革史料

作为海淀发展改革的“文字档案”，出版物20年来持续记录着海淀区的重大变革与发展成就。

从“政事分开、管办分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先行探索，到中关村科学城建设的加速推进；从GDP突破万亿元大关，到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到基层治理不断创新；从“十三五”“十四五”规划落地，到“十五五”开局谋篇，以一篇篇深度调研、一组组精准数据、一个个鲜活案例，全景式留存了海淀区从创新试点到引领示范、从经济大区到发展强区的全过程，为海淀年鉴编纂、改革经验总结、发展脉络梳理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资料。

2. 当好决策“智囊团”，助力科学精准施策

出版物始终坚守“服务决策”的核心使命，聚焦区域发展重点、改革难点、民生热点，组织开展深度调研，印发高质量研究成果。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民生保障、生态治理等领域，编印专题报告、调研文章、对策建议，为区委区政府及发改系统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及时传递国家、市、区级政策精神，深度解读政策内涵，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成为连接政策制定与实践落地的重要桥梁。

3. 当好经验“传播者”，搭建交流互鉴平台

出版物充分发挥交流窗口作用，搭建起各委办局、街镇、园区、企业之间的经验共享平台。通过“海淀实践”“经验交流”“一线思考”等栏目，编印基层创新举措、特色工作方法、可复制推广的实践经验，促进区域内各单位互学互鉴、共同提升；通过“他山之石”栏目，借鉴国内先进地区发展改革经验，为海淀发展提供有益参考；通过“企业家访谈”“建言回应”等栏目，搭建政企沟通桥梁，倾听市场主体心声，汇聚社会各界智慧，形成推动海淀发展的强大合力。

4. 当好队伍“练兵场”，培育发改专业人才

出版物始终注重人才培育，为发改系统干部及中青年研究者提供展示才华、交流思想的平台。鼓励基层干部、项目负责人结合工作实践撰写思考文章，引导研究人员围绕区域发展开展课题调研，在撰稿、编校、交流的过程中，提升干部队伍调研能力、文字水平与专业素养，培育了一批懂发展、善改革、能调研、会总结的发改人才，为海淀发改事业持续发展储备了坚实的人才力量。

四、薪火赓续：砥砺前行，续写新时代发展华章

作为海淀发改系统深耕调研、凝聚智慧、传播经验的重要载体，《海淀发展与改革研究》历经二十载迭代升级，在内容建设、栏目体系、版式设计、传播效能上不断突破，为海淀区打造现代化强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撑与文化滋养。

站在创办20周年的新起点，恰逢“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海淀发展与改革研究》将继续秉持初心，紧扣海淀区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以更坚定的担当、更专业的水准、更创新的姿态，续写发展改革新篇章。

未来，出版物将持续聚焦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领先科技园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点领域，深化调查研究、提升内容质量、优化传播形式，不断增强专业性、可读性与影响力；将进一步发挥“记录者、思考者、服务者”作用，全方位展现海淀区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建设、现代化强区打造中的新举措、新成效、新风貌；将持续搭建交流平台、汇聚智力资源，为区委区政府决策提供更优质的参考，为各单位经验交流提供更广阔的载体，为海淀发展改革事业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作者系区发改委研究中心成员）

平沪旧报中关于 一二·九运动的相关线索

肖伊绯

小引：重回历史现场

在艰苦卓绝的14年抗日战争历程中，在全民族统一抗日战线的缔造历程中，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的爱国学生运动，即一二·九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值得后世永久铭记与追念。

然而，时至今日，后世读者从历史教科书或普及历史读物上了解到的这一历史事件的相关记述大多过于简略与概括，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始终有些笼统与模糊，印象不够深刻。

为此，笔者特翻检了当年的一些旧报刊，试图从公共传播的场域里，重探这一历史事件的细节信息，希望能另辟蹊径，重回历史现场。

前兆：一二·九当天的平沪报纸

《北平晨报》第九版“教育界”栏目，版面出现了一处“挖空”，临时以广告“填充”。这一现象表明，当天或许确有关涉时局的所谓“涉

敏”报道，只不过因当局新闻舆论管控极为严苛，遂临时“改版”了。

同日，北平《世界日报》第七版“教育界”栏目头条，刊发了一条简讯，从中略微可以揣摩出学生运动的“前兆”。原文如下：

何应钦昨召集蒋梦麟等谈话：

——谓一切均甚安谧

——嘱转告各校学生安心上课

军政部长何应钦，昨在居仁堂召集各大学校院长蒋梦麟、李蒸、陆志韦等谈话，报告最近华北局势及与各方商讨经过，谓现在大致均已就绪，华北绝不能脱离中央，一切均甚安谧，希望各校当局，转告学生安心上课云云。

当天的上海《立报》也有类似报道，可能因为言语过于直白，有所违碍，径直从中删除了一段文字，出现了版面“挖空”，且未作任何相应

处理的情形。原文如下：

何请四大校长劝阻大学生请愿
市府向中学校长作同样训话
今日起平禁止学生结队外出

【本报北平八日专电】何应钦八日晚邀四国立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徐诵明、李蒸等谈话。说明最近华北局势及与各方商讨经过，现大致均已就绪。无论如何，华北决不脱离中央，请蒋等劝导学生安心读书。（笔者按：此处有“挖空”）



1935年12月9日，北平《世界日报》第九版“教育界”栏目，头条刊载，“何应钦昨召集蒋梦麟等谈话”（作者供图）

八日夜市府又召集各中学校长训话，意旨与何应钦对蒋梦麟等所谈相同。为免学生枝节计，九日起禁止学生结队外出。

看来，北平当局对学生请愿活动及可能随之发生的群体事件是早有预判的，于12月8日晚，

就事先做了一定的部署来预防。但何应钦对华北局势的谈话，其人所谓“一切均甚安谧”云云，真的能让北平师生与民众感到“安谧”吗？

事实上，由日军策划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在整个1935年度，一直在步步推进，中国主权遭受极大破坏。1935年7月6日，正是南京政府亲日派首领的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向日方承诺取消河北境内的国民党组织，撤出河北境内的中央军，取缔一切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之后，日军及其收买的各路汉奸，开始大肆鼓噪所谓“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自治”。1935年11月24日，日本指使原国民党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大汉奸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在通县发表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的宣言，次日又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作为“华北自治”的“榜样”，提倡华北特殊化，将冀东十二个县独立于国民政府管治之外，由日本幕后操控。

在这种国家主权丧失殆尽的情形之下，1935年12月6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会，通过并发表《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随即，平津15所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要求政府讨伐汉奸殷汝耕，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就在这天，却又传来在日本侵略者逼迫下将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终于引爆平津各大中学校罢课风潮，抗议与声讨的人群汹涌而出。如此看来，何应钦对华北局势的所谓“一切均甚安谧”云云，只是单方面的掩饰欺瞒之辞，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最终不可抑制的爆发是势所必然。

一二·九之后的报纸版面“挖改”现象

由于报纸所刊新闻的时效性与不可避免的

“时滞性”，依常理推断，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实况报道，最早应当在12月10日见报。

查阅《北平晨报》，该报第六版“本市新闻”头条，题为《平市军警昨日严加戒备，禁止集会游行等举动》，虽然标题极为醒目，可内容却极为简略，仅有“平市当局以近时地方不靖，恐有奸人从中鼓动，影响治安……”寥寥数语的“官话”。从这一报道中，看不到更感受不到学生运动的现场状况，仿佛只是官方颁布的一纸“安民”告示。

但在同一版面左下角末端，每日照例由该版编辑所撰“随感”一栏的话语，却分明又透露着报界人士对学生运动的支持与同情。原文如下：

无题

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大家必须认清：“此时是什么情形，此地是什么环境”，识时务者为“俊杰”，要做“俊杰”须识时务。

青年人气壮，往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一般死过性的人，一定要说他们“越轨”，不但讨不了他们的好，也许还要受一番申斥，这够多么冤！但是，一个国家除非不要青年，如要青年，就不要那许多“少年老成”的青年，“面黄肌瘦”的青年，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青年人多少也应当保留一点。

上述短评，依惯例为该版编辑根据每日新闻要点与时局重点，以随笔感言的方式做一番简要拈提。这一天的“随感”题为“无题”，只谈青年人性情如何如何，却只字未提刚刚发生的学生运动，这实在也是无奈却又不甘之举。当局管控言论之严苛，令报社编辑无法正常报道这一重大新闻，却还是禁不住由此生出的一番“随感”，

于是乎，就有了这么一篇明确表露着支持与同情的“无题”，悄然见诸“报末”了。

应当说，对于此次学生运动，《北平晨报》的记者编辑，是及时搜采并有意刊发独家报道的。该报第九版“教育界”栏目头条，本来是有一篇幅可观的独家报道的；遗憾的是，当局严令之下，不得不在报纸版面上临时“挖”出一大截空白版面，由三条广告仓促“填充”之后，仍有大段“留白”。若仔细察看被“挖”之后的版面残留铅字，尚可依稀辨识出此次报道的末端，有“由该校代表送去医治，被刺伤同学转送协和医院”等模糊字样。相信当年的读者见此情形，一方面对报社绝难违抗当局之苦衷是心知肚明的，另一方面对学生运动中伤者的情况也莫不揪心痛惜。

12月11日的《北平晨报》，第六版“本市新闻”头条报道，原本应当也与学生运动相关，依然被“挖空”为两条广告。第七版“北晨艺圃”栏目头条，由该栏目主持人、著名画家于非闇所撰《闲谈·围城杂感》一文，以非常委婉的笔调表达了对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的忧愤之情，很能反映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及文艺工作者的态度。文末有这样的表述：

“突然接到了严君既澄的一封信，拆开了一看，七绝四首，题曰“围城杂感”，朗吟了三遍，在我尚未至于十分停止的心灵上，怦怦地仿佛增加了几下跳动，不过这时只宜传观，不便刊布就是了。”

这一天，该报第九版“教育界”栏目头条，依然被“挖改”，临时以广告填充版面，报道标题残留有“平市各大中学学生”字样。

12月12日，该报第九版“教育界”栏目头条，只有轻微“挖改”痕迹，报道题为“平市各大学当局严禁学生轻举妄动”，看来当局认定局

势得到了基本控制，要做出进一步的惩戒与清查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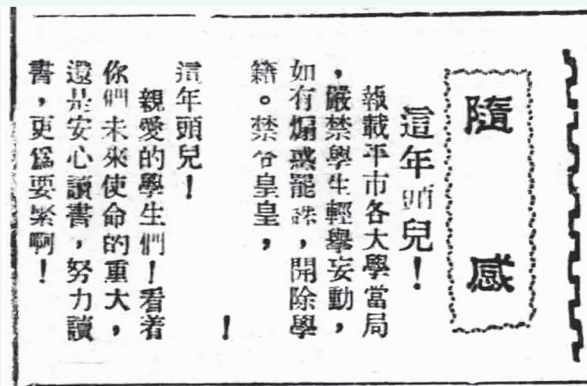
特别有意思的是，12月13日，第六版“本市新闻”版面末端，那个由本版编辑执笔的“随感”专栏，竟然因为前日当局颁布的这一通“禁令”，刊发了一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式的话语，且看原文如下：

这年头儿！

报载平市各大学当局，严禁学生轻举妄动，如有煽惑罢课，开除学籍。禁令皇皇，（笔者按：此处有“挖空”）

这年头儿！

亲爱的学生们！看着你们未来使命的重大，还是安心读书，努力读书，更为要紧啊！



随感·这年头儿，原载《北平晨报》第六版，
1935年12月13日（作者供图）

寥寥数行，不足百字，竟还是有一句话被“挖”去，版面形成了“挖空”一列。这“随感”字面上的意思，看似于当局意旨并无“违碍”，实则不难从中感受到“反讽”之意；且那二指宽的逼仄版面上，还配有仅有的一列“挖空”，更令人感到北平当局拼命压制社会舆论，全力粉饰太平的手段，真真是费尽了心机，“挖空”了心

思。这一天该报第九版“教育界”栏目头条，再度出现大面积“挖改”情形，也属意料中事了。

12月14日，该报第九版“教育界”栏目头条，只有末端尚有轻微“挖空”痕迹，总体内容可以阅读。报道题为“平市各大学校长，昨联合发告学生书：希即日复课努力学问研求，下午并与秦德纯晤谈”，乃是北平当局联合各大院校管理方，采取的一番试图平息事态、恢复秩序的举措，仍然没有关于学生运动当天现场状况的任何记述与说明。

12月15日，该报第九版“教育界”栏目头条，末端有较大“挖空”痕迹，总体内容可以阅读。报道题为“平各大学校长再开会，商讨劝导复课办法：蒋梦麟谈下周可复课”，乃是北平各大院校管理方，再度开会商议如何让参与学生运动的学生尽可能回归校园与复课的相关办法，仍然没有关于学生运动当天现场状况的任何记述与说明。12月16日，该报相关报道内容及版面“挖空”情形，与前一日相仿，事态似乎朝着渐趋平息的方向发展了。

报纸版面“挖空”现象愈演愈烈及微妙转变

不过，12月17日的情形，却有些异常。该报第九版“教育界”栏目版面，突然出现大面积“挖空”情形，不得不全部以《北辰画刊》的矩形广告图片临时填充，竟然用17张图片去“填空”。这样一来，当天该报的“教育界”栏目，几乎没有任何报道内容，出现近似于“白卷”的状态，令人感到事态可能又有新的变化。

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这近乎“白卷”的版面末端隙处，竟然还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了一条关于北平学生再度游行示威的简讯。原文如下：

据公布消息：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由学联合会发动于昨日复举行第二次游行示威



1935年12月21日《北平晨报》第九版局部(作者供图)

运动，事先军警闻讯，即在各通衢严密戒备，当各学生游行至正阳门时，该处军警和平制止，不令通过。惟学生人多坚欲进城，致双方冲突，学生警察各有受伤，因内城西直、阜城、和平、宣武各城门，均临时关闭，故清华、平大、东北、辅大等各校学生，仍在宣武门外立待，直至昨晚八时左右，始各散去。

这条简讯应当是北平当局默许，至少是没有明令禁止、可予发布的公共信息。这一信息的发布，表明一二·九运动还在继续，学生游行示威的群体行为还时有发生，但在当局的严密戒备与周密布控之下，这些群体行动被逐渐“分而治之”，然后“逐个击破”，事态仍在当局可控的范围，故而不再忌惮这样的报道了。

12月18日，该报第九版“教育界”栏目头条，仍有较大“挖改”，总体内容可以阅读。报道题为“教部昨电秦市长及各大学校长：盼对学生妥为处理，并希军警以诚恳忍耐态度应付”，乃是来自南京国民政府的官方关注与相关处理意见，这也几乎是“五四”以来官方对待学生运

动的一贯策略，即从一开始的强力管控镇压，逐渐演变为以“怀柔”姿态来分化瓦解学生群体，进而达到“分而治之”之功效。

12月19日，该报第九版“教育界”栏目版面，再度出现大面积“挖改”，用16张广告图片“填空”。据此揣度，事态可能并没有按照官方预期的那样发展，至少还没有什么令人乐观的重大消息可予披露。

12月20日，该报第九版“教育界”栏目版面，仍有较大“挖改”，但尚存不少可以阅读的最新消息。头条报道题为“平各大学校长昨开会，决再发告学生书：恳切劝导学生即日复课”；另有题为“京市学生数千人，昨日继续游行”，这是披露南京学生响应与支持北平学生的群体事件之爆发。还有“高商学潮尚未平息，学生昨赴局请愿”报道，复有“留德学生黄弁群忧国自杀”报道，更有“韩复榘以钢甲车，护送学生回籍”的简讯等等，学生运动的第二波高潮，大有南北呼应，海内外响应之势。显然，北平当局与南京政府都暂时还没有平息事态的良策，在新闻发布的管控上，似乎也开始有所松动。

12月21日，该报第九版“教育界”栏目版面，自一二·九以来，首次出现没有“挖改”版面的情形，这或许表明当局在新闻管控方面，有意采取相当程度的宽松政策，以“怀柔”姿态，尽力营造与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群体的对话、沟通乃至互动的渠道与平台。

这一天的栏目头条，题为“平市各大学校长，昨再发告学生书：盼认清报国目标勿虚掷光阴，社会局今日召小学校长谈话”，北平当局仍是奉行以劝导为主的策略，希望能尽可能以“怀柔”姿态去疏解学生激愤情绪，进而“分化”与“分治”学生运动群体，以达到尽快实现复课的工作

目标，并最终达成平乱维稳的施政功效。不过，同一版面上出现的“武汉学生昨游行，参加学生万余人”“济学校提前放假，当局派钢甲车护送回里”等一系列报道，业已表明一二·九运动虽源发于北平，可其强大持续的社会影响力却并不局限于北平一地，而是早已渗透到南北各地，呈现出遥相呼应、星火燎原之势，令各地官方都非常紧张，疲于应付。

梁实秋讲演：为学生运动“出谋划策”

12月22日，该报第九版“教育界”栏目版面，只有一处“挖改”，关于学生运动的相关报道呈现出当局管控力度减弱，进一步放开的形势。版面头条题为“平市中小学校，一律提前放寒假”，表明北平当局为避免源发于各大学院校的学生运动，继续向教育体系基层渗透，避免为数众多的中小学校也被此次学生运动所波及，以提前放寒假的方式，令这部分可能会被统摄到学生运动中的社会资源，即刻陷入“停摆”状态，藉此继续其“冷处理”策略，坚决杜绝“死灰复燃”。

在该版头条报道之下，紧接着即是一组总题为“各地学生蜂起，作救国运动：武汉长沙开封等地学生，昨日均作大举请愿游行”系列报道，可见一二·九运动的后续影响力依然强劲，南北各地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即便北平当地学生运动因当局“刚柔并济”手段稍作敛迹，其公共传播与社会影响的力度却并没有随之削弱，反而呈现出一浪高过一浪，“后浪”更见汹涌。

值得注意的是，位于版面中偏右侧刊印有一篇题为“梁实秋昨在北大讲演：学生运动及时局意见；提出结束办法三项，并今后应注意两点”的报道，篇幅也较为可观，应当也是当时报社方面特别重视的一篇报道。应当说，这篇报道很

能反映出在官方、校方、学生之外的“第四方”势力及其影响力的客观存在，以及这一势力将在一二·九运动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等等。原文如下：

【本报特讯】北京大学学生会学术股，于昨（二十一）下午二时，在该校二院大礼堂请该校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主任梁实秋氏讲演，听众二百余人，讲题未确定，仅泛论个人对此次学生运动及时局之意见，兹录讲词大意如下：

此次蒙学生会学术股请我来讲演，我于答应后，即又想不来，原因是自己所学的东西离目前实际问题太远，同时自己对政治又向无研究，不过既答应来讲，当然不能不出席，因而又想找一专门题目和大家研究，后终觉不如就现在学生运动及时局一抒己见，庶可与大家共同讨论，并望大家听完之后，提出问题，以便详细回答。学生运动已经过多年，我自己作学生时（五四时代），此种运动即开始。当时之运动在组织之严密，进行之步骤各点上，皆远不如现在，故我对现在学生运动极为钦佩。但因时过境迁，现在运动之意义与从前已大不同，其不同之点有二：（一）对像不同，（二）环境不同。

就（一）而言，从前学生运动之目标小，敌人少，故易有成就，现在则目标大，对像多，故不易收效。就（二）而言，从前之运动是全国中上下一致的，而且在合法的保护与鼓励下进行，而现在则学生是站在民族最前线，其有力者不敢作不敢骂的事，赤手空拳的学生肩负起来去做。故在目标上，环境上，现在学生运动的进行，

的极单纯，极纯洁，是纯粹的爱国表示，故能博得国内国外的同情与协助，在同一目标下，各种不同的意见皆能合并起来，而向惟一的一条路线走。

但现在此种运动既然造成，我们首须注意的是今后怎样作，如何作，在决定“作”以前，我们须认清事实。华北问题并非局部问题，此种局面非一二人所能造成，亦非一时所能造成；而是演进的，渐渐发展而成的局势。自塘沽协定，梅何协定后，局面渐渐酝酿，以至今日，造成此种局面。故华北局势实是因一方有整个的策略，而他方竟无整个的策略应付所致。

(二) 须注意领导至如何程度，及注意如何结束。关于结束(告一段落)我看到不外三策：上策，自动的想一具体办法，使此事告一段落。中策，因运动之继续进行开展，而引起外力干涉压迫。下策，工作渐渐消极，而入于停顿状态。

在此三策中，据我意应取上策，即既然能做出去，也要能收回来。最初对目前局势应有表示，现在既已昭告天下，引起世界人之注意，举世对我同情，即应考虑不要一发不可收拾。现有人主张非复课后积极补课，以表示学生罢课，非图苟安。这种表示是很深刻的。同时我希望早日复课，复课后改善“天下太平”式的教育内容，增加有俾于实际需要的课程，至为重要。至于提前放假之说太无意义，同学可不必置信。其次复课后则学生之团体组织或更加缜审。

此外，希望同学此后应注意两点：(一) 希望今后外交公开，(二) 希望本国内部

梁實秋昨在北大講演 學生運動及時局意見 提出結束辦法三項

並今後應注意兩點

【本報特訊】北京大學學生會學術部，於昨(二十二)下午二時，在該校二院大禮堂請梁實秋氏講演，文學系主任葉實秋氏講演，聽眾二百餘人，議題未確定，傳校論個人對此次學生運動及時局之意見。茲錄其詞大意如下：

此次學生會學術部，我於答覆時，即又想到，現在學生運動及時局，其不同之點有二：(一) 對象不同，(二) 環境不同。

前學生運動之目標小，敵人多，故不易收效。現在則目標大，對敵少，故易收效。

但在此種運動中，我們須注意，如何作，在決定“作”以前，我們須認清事實。華北問題並非局部問題，此種局面非一二人所能造成，亦非一時所能造成；而是演进的，漸漸發展而成的局勢。自塘沽協定，梅何協定後，局面漸漸酝酿，以至今日，造成此種局面。故華北局勢實因一方有整個的策略，而他方竟無整個的策略应付所致。

關於結束(告一段落)我看到不外三策：上策，自動的想一具體辦法，使此事告一段落。中策，因運動之继续进行开展，而引起外力干涉压迫。下策，工作渐渐消极，而入于停顿状态。

在此三策中，据我意应取上策，即既然能做出去，也要能收回来。最初对目前局势应有表示，现在既已昭告天下，引起世界人之注意，举世对我同情，即应考虑不要一发不可收拾。现有人主张非复课后积极补课，以表示学生罢课，非图苟安。这种表示是很深刻的。同时我希望早日复课，复课后改善“天下太平”式的教育内容，增加有俾于实际需要的课程，至为重要。至于提前放假之说太无意义，同学可不必置信。其次复课后则学生之团体组织或更加缜审。

此外，希望同学此后应注意两点：(一) 希望今后外交公开，(二) 希望本国内部

梁实秋昨在北大讲演，原载《北平晨报》第九版，

1935年12月22日(作者供图)

确比从前困难得多。北大在学生运动上，素居领导地位，在物质方面，北大在建筑上，在设备上，不如人的地方很多，但是北大学生目光较远大，思想较成熟，故凡发起或参加任何学生运动时，都是站在最前面的。但在此次学生运动中，如何才能居于领导地位，领导大家，我认为有两点要注意：(一) 认清事实。此次之运动目

政治能加以改革，即迅速实行宪政，而内部得以团结。

梁氏讲毕复征求同学批评，至三时余散会云。

上述讲演记录，充分表明时任北大外国文学系主任的梁实秋对一二·九运动抱有同情与支持的态度。

与本文前边已经提到的当局或校方的告诫与劝导有所不同，梁实秋的此次讲演，一定程度上是在为学生运动“出谋划策”，是在为参与运动的北大学生“剖析形势”，力图为这些学生“指明方向”并“权衡利弊”。讲演中，梁氏强调此次学生运动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华北危急的局面，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南京国民政府与北平当局的施政体系，既如此，在已然将中国华北危急与日本侵略野心昭告天下的情势之下，理当“见好就收”，谋求主动退场之可能；否则“一发不可收拾”之后，反倒令自己陷于被动境地。

应当说，梁氏讲演中的观点客观平实，措辞也亲切得当，与官方或校方的“官腔”（官方腔调）比较起来，似乎更合乎情理，也更能起到所谓“劝导”的作用。因此，对官方立场或长官意志感到极端反感的学生群体，对梁氏讲演的观点与措辞，在心理接受度上可能要好一些。不过，当时意犹未尽，尚觉意难平的相当一部分学生群体，一旦从梁氏讲演中体味到某种“变相”的劝导之意，也不免会将梁氏的这番演说，视作官方立场的一种变通说教，认为梁氏本人或简直就是秉承官方意旨，来“暗渡陈仓”的另一种更高明的“说客”罢了。

胡适及北大教授俱乐部的“集体亮相”

与梁氏讲演报道略呈对称布局的，刊印于报纸版面中段右侧的一条简讯，篇幅极微，读者往往忽

视，可一旦细读，便觉事关重大。这条简讯里透露的历史讯息，不啻为包括了梁实秋在内的，却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介于官方、校方、学生之间的“第四方”势力的集体亮相。且看简讯原文如下：

北大教授俱乐部前晚聚餐商讨时局问题

【本报特讯】北京大学全体教授所组织之北大教授俱乐部，前晚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到全体会员八十余人，席间对目前时局及学校近况皆详做讨论，对学生运动原则上规定继续劝导学生复课，但并无具体议决案。提前放假事并无人提出，至晚十一时许散会。该俱乐部之常委规定七人，当推举胡适、周炳琳、张景钺、吴俊升、陈受颐、陶希圣、燕树棠等教授担任。并决定设咨询委员会等三特委会，各委员会负责委员亦已推定，常委会定今日开会云。

据此可知，1935年12月20日晚，北大教授俱乐部组织了一次八十余人参加的聚餐，“席间对目前时局及学校近况皆详做讨论”，“对学生运动原则上规定继续劝导学生复课”。北大教授群体此时的“集体亮相”，对学生运动所持立场与态度，均与官方、校方保持了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第四方”势力的北大教授群体，可以视之为官方、校方势力在校内的一股“潜流”，可以视之为官方、校方势力在校内的另一种“代言人”或“代理人”，在这样的局势之下，学生群体必然势单力孤，学生运动渐将偃旗息鼓，也就不言而喻了。

那么，作为“五四”运动亲历者，作为“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代表人物，曾被北大“新青年”一代视作“精神导师”之一的著名学者胡适，当时在北大教授俱乐部也身任七常委之首，其人又是怎样看待一二·九运动呢？

据《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记载，1935年12月9日，即一二·九当天：

“上午十点上课。班上人还是满的。外间各校学生今天有请愿之举，北大学生都没有加入。”

“十二点下课时……始知因清华、燕大学生要进城请愿，西直门也关了。”

“一点聚餐。大家都谈学生请愿事。……今天学生此举，虽出于爱国热心的居多，但已有几张传单出现，其中语言多是有作用的，容易被人利用作口实。”

“从长安出来，过王府井大街，见有学生一队，似是游行至此；车过东安门大街，见最后一部分打着北京大学旗子，约有三四十人。他们见我的车子，都纷纷私语。”

“我赶到第二院，见着郑秘书长，始知游行队到第一院门口站了十五分钟，高喊‘欢迎北大同学参加’的口号。有几十个学生忍不住了出去加入游行。”

“我回到家中，得郑秘书长电话，知游行队已散了。”

“晚上居仁堂打电话来，邀各校校长开会商议学生游行事。到者，蒋、梅、李、陆四校长，刘运筹代表徐。秦德纯市长报告，今天高桥武官（即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氏）去市政府抗议，说今天学生游行，是有背景的，主谋的人是蒋梦麟与胡适。”

从日记内容来看，胡适在一二·九当天，对于学生运动似乎还是略微抱有一份同情与关切之意的。不过，日记中的措辞力求客观确切，并没有多少个人情感的流露，也没有个人意见上的明确评

判，因此，还不能据当天日记内容即遽下定论。

一二·九次日，《胡适日记》突然出现了明确评判之语：

“今天到学校，知道学生要罢课，真是幼稚之至。”

此时，“幼稚之至”成为对此次学生运动的基本评判。显然，胡适从一开始，就是不支持一二·九运动的。

12月11日，因为积极劝导学生“复课”，竭力恢复校内教学秩序，胡适当天甚至还收到了一封北大学生发来的“恐吓信”。这封信，胡适特意将之粘贴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中，权作“备忘”，亦作“史料”。信中有云：

“今天一院的通告，你亲自撕下去了！在你撕的时候，你的耳朵还红了一红！我们看见你那样的心情，真哭笑不得！胡先生，我们深切的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院长吗？”

信末一段话，更是直截了当的提出警告与威胁道：

“现在警告你：向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了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勿谓言之不预也！”

这封署名“将来杀你的人启”的“恐吓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胡适不支持学生运动，以及因此而与相当一部分学生群体产生了隔阂与对立的历史实情。之后数日的日记中，胡适的记述都充斥着失望的情绪，对于自己无法阻止学生罢课等一系列群体行为，深感失望。

12月15日，胡适从失望情绪中抽拔出来，

感到对目前的学生运动与时局都应当有所剖析与表达，遂撰成《冀察时局的收拾》一文；这一天，《大公报·星期论文》上，更刊发了胡适所撰《为学生运动进一言》一文，算是公开表达了自己不支持学生运动的个人意见及其理由。12月22日，这两篇文章还一起刊发在了他自己主编的《独立评论》第182号上。

综上所述，也就大概可以明晓，作为“第四方”势力，以胡适为首的北大教授俱乐部，对一二·九运动所持立场与态度，从一开始即是与官方、校方保持一致的。

当然，由《胡适日记》看他真实态度实不可取，因为他当年写日记时，就知道以后会出版，怎会轻易写出认为不合适的想法。

一二·九运动的“北战南征”

笔者曾一度以为，除了《北平晨报》，要想查阅一二·九当天或早期学生运动现场状况的相关报道，翻检当时北平的另一民营大报，向以“敢讲真话”著称的《世界日报》，应当是另一个可能更行之有效的途径。

遗憾的是，与《北平晨报》的情况相仿，从12月10日至12月15日，在该报的“世界要闻”“本市新闻”“教育界”等各个栏目中，均没有关于一二·九当天现场状况的任何报道，就连一条简讯也没有出现。当然，版面上临时“挖空”的痕迹随处可见，当年北平当局对新闻报道与社会舆论管控之严苛，复又随之再次领略了一番。或许，正如1935年12月22日《北平晨报》第六版“本地新闻”栏目的编辑“随感”所言：

“在检查新闻制度下，全国报纸早已不能行使其固有之使命，更谈不上权威……然而吾人却为读者想出新闻的读法

来：要知国内新闻应看外国报；要知本市新闻应看外埠报……”

循着这一思路，笔者又试图从当时北平之外的报刊中，去搜寻相关线索。在诸多旧报文献资源中，最便于翻检，也是最易于寻获者，莫过于当时公共传媒产业最为发达，新闻传播也最为便捷，社会舆论自由度相对最高的上海地区的众多报刊文献。

譬如，上海《立报》从12月10日开始，至12月中下旬，就一直以相当可观的篇幅，在跟踪报道平津地区乃至南京、上海的学生运动实况。

《立报》12月10日头版的“评论”头条题为《大家起来》，明确表达了支持北平学生运动的立场。以大号黑体字的醒目标题，第一时间报道了北平学生运动。报道原文如下：

结队游行示威平学生反对“自治”

大学中学参加示威者数千人

清华燕京学生被阻未能入城

口号：团结救亡

【北平九日电】本日北平各大学各中学学生，举行反对自治示威运动。九时许结队赴中南海向何应钦请愿。口号为反对自治伪组织，要求团结救亡。十时许，集于中南海前门（即新华门）者千人，在门前列队，秩序尚佳。平市当局闻讯，即令警宪出动戒备。同时因西郊清华燕京两校学生约千人早八时即出发来城中，欲参加示威运动，当局即下令将西直门紧闭阻止入城。清华燕京学生立于城外，不肯返校。中南海门外之学生则要求入内见何应钦，因何应钦赴汤山，由侯成出见，向学生宣示，何不在城内，可由代表述请愿意见，

当为转达。学生等即照办。至十二时半，学生愈聚愈多，数达数千。乃列队游行，沿途高呼请愿口号，并向民众讲演。由中南海前门向西行，至西单牌楼，与警察相遇。警察挥棍图将学生驱散，结果只解散一小部分，余仍继续游行。至清华燕京学生，与守门警察在冰点下之严寒中，相持至下午五时，犹不肯去。何应钦在汽山闻学生请愿，即以长途电话促各校校长阻止。各校校长即分头派员劝学生回校，至下午六时清华燕京学生始返校，城内学生，亦散尽。

在《立报》12月10日第二版，还刊出一则简讯，当时南京的各大中学校教职员也发表宣言，声援北平学生运动。原文如下：

京大学教职员宣言望政府忠荃谋国
严拒无理要求
不可有迁就的协定或谅解

【南京九日电】京各大学教职员于登等一百八十四人九日发表《对华北问题宣言》，说中华民国整个领土与主权，绝对不容分裂破坏。倘任何部份，假借民意，制造所谓自治运动，或其他妨害统一之组织，皆足以危害国家命脉。我政府，际此存亡关头，允宜博谕众议，秉忠荃谋国之初衷，对于任何足以危及我最后生命之无理要求，一切严予拒绝。更不可有迁就之协定或谅解，以作茧自缚。

面对南北两地师生的同时请愿，南京政府与北平当局，并没有即刻做出回应。与之相反，日方反应强烈，反而抗议中方“仇日”。12月11日，《立报》头版新闻报道，即将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的抗议登在头条。原来，日人高桥于12月

10日访晤北平市长秦德纯，当面表达了强烈不满与抗议，对此，北平当局竟迅即做出了“侧面”回应——于当日即在北京大学等各大高校贴上官方布告，“劝学生安心上课，勿受鼓惑”，并称“如不听劝诫，鼓动罢课，即开除”。



1935年12月12日，上海《立报》头版报道，“平学生游行示威记”（作者供图）

12月12日，《立报》头版再次刊出两篇“重磅”报道，一是“平学生拟再示威”简讯，二是由北平记者于12月10日寄至报社的——一二·九当天的现场通讯稿。此稿篇幅相当可观，细节记述生动直观，使读者恍若身临学生运动现场。原文如下：

平学生游行示威记学生拟偷渡

军警关门忙救火

唧筒浇散热心青年

【本报北平特约通讯】九日北平的学生游行示威，是有预定计划的。燕京清华两大学的学生都是九日早七时卅分，就在校内集齐，预备坐长途汽车进城，与其他各校学生联合游行。但是长途汽车因为某种原因休息了。结果四百个燕京学生，与二百个清华学生乃徒步出发。清华的大门，事前已有警察把守并下锁，这二百人，是由近平绥路的一个旁门溜出来的。因为警察并不知道，还有小门可以出入，未予注意。两校学生到了高亮桥，（距西直门约一里，为由两校赴西直门之孔道。）已有警察及乘机器脚踏车带有机枪之警车队，在此拟阻学生前进。经过一番冲突，数学生受轻伤，仍被冲过。九时一刻抵西直门，门已闭，由廿九军与警察把守。警察请学生派数代表入城，学生不允，必全部进城，遂僵持于城门口。是时新华门前已集有数百请愿学生，其中三分之一为女学生，手持旗帜，高喊反对伪自治口号。闻清华燕京学生被阻城外，遂并要求放彼等入城。候成出见无结果，学生乃结队西行，走向西单牌楼，目的是欲赴西直门开城放两校学生入内。至西单，因有警察欲解散学生行列，又发生冲突。有少数受伤，并有人被逮捕。余则仍折向北进，通过西四牌楼，至护国寺（距西直门已里许），因有人提议赴辅仁大学，更纠合多数学生，乃又折而东向赴“辅仁”。结果由辅仁唤出约百五十名，乃更东行，赴东城，沿途每过一学校，

即唤学生出校参加，至下午一时半，学生已聚至千五百人，沿途行人围观，学生乃散放传单。并派骑自行车之学生赴将经过之各校纠集学生。由地安门转道经过马神庙、沙滩、译学馆的北京大学一二三院，然后出东华门大街，南转至王府井大街。

（北平东城之冲要街道，东安市场即在此街。）沿途皆有警察看骑车追随，维持秩序，并拟乘机予以解散，但无结果。至王府井大街，因内一区警署在此，遂更增加警察，打算驱散学生使入西面各胡同，然仍无结果。于是就有一部警察在王府井大街南口，距中央饭店五十码之一自来水龙头上，接上救火喷水唧筒向学生身上喷水，阻学生前进。请愿学生中亦即有人向前夺取喷水唧筒，警察为免武器被夺，即解下腰间皮带向学生抽打。一阵混乱之后，警察学生多半已水淋淋，而街头亦变成小河，且霎时间人身与地下之水皆已结成薄冰，学生行列始散。此役又有少数学生受伤赴协和医院就诊，尚无受重伤者。至在西直门外之清华燕京学生，下午二时与城外之中法大学孔德学院（该校在西直门阜成门之间）学生取得联络，遂分派学生二队拟偷入德胜门及阜成门。当局更下令将北平西北两面城门完全关闭。至下午三刻城外学生开会，始决定各本校。清华燕京仍徒步走回，到校已六时半，天已全黑。此次学生运动，闻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及民国学院未参加。又平市新社会局长雷季尚九日期晚发表公告，谓市立中学皆未参加此项运动。（十日自北平）

这篇通讯稿，将北平一二·九当天的学生斗

志之昂扬顽强，冲突对抗之激烈，现场情势之危急艰险，迭映于眼前。

一二·九的现场照片：以《良友》杂志的图文报道为例

事实上，关于北平一二·九当天的现场实况报道，较之北平本地报刊一律被当局“挖空”而呈全面“禁言”之势，上海的各大报刊对此次学生运动给予了高度关注与充分披露。

除上海《立报》的这篇“千字文”报道外，可称一二·九新闻报道的代表之作，较早刊布一二·九现场照片并予以图文报道者，应以《良友》杂志为代表。就在一二·九运动爆发仅仅六天后的1935年12月15日，《良友》杂志第112期印行，推出题为“学生救国运动”一个通版的图文报道，刊布了一组四张现场抓拍的照片。

分别为“北平各大中学生，为反对华北伪自治兴起之救国运动，于本月九日齐集赴政府请愿，于北风凛冽中列队前往，促起国民自救”，“请愿学生为警察所阻，图为学生代表与军警交涉之情形”，“学生代表在西直门演讲，向民众宣传救国运动，义气磅礴，听者动容”，“北平各学生请愿，事前当局已有所闻，即严为戒备，军警密布，如临大敌”。

这四张照片，抓拍得相当及时，留住了宝贵的历史瞬间。事实上，这四张照片随后还被上海多家报刊分别转载，甚至还被用作刊物封面，确实堪称反映一二·九运动现场实况的代表之作。

譬如，“学生代表在西直门演讲”，所呈现的是一位女学生站在板凳上，立于人群中央演讲的情形，这张照片确能唤起“义气磅礴，听者动容”之悲壮氛围，颇具现场感与感召力，即刻就被上海《时代》半月刊（第9卷第1期）用作封面，随即又被上海《新中华》杂志（第4卷第1



学生救国运动复兴，原载上海《良友》杂志第112期，1935年12月15日印行（作者供图）

期）用作图文报道的首要图片。

再如，“军警密布，如临大敌”，更是印证了前述《立报》所载北平军警持械戒备并殴打学生，所持器械确有大刀一项的情形，由著名作家邵洵美在上海创办的《人言周刊》于1935年12月30日印行的第2卷第42期的封面，正是采用的这张照片。只不过，为了更好突出与烘托主题，将《良友》刊布的这张横向拍摄的现场照片，裁切为以一位手持大刀肃立的警察为中心的竖式构图（其人前端还有一位手持大刀之军警，影像较小），封面上就明确标示出图注称“镇压北平学生运动之警察大刀队”。

又如，“学生代表与军警交涉之情形”，半

个月之后，也即1936年1月间，即被《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与《时代》（第9卷第2期）半月刊相继取用。值得一提的是，因《良友》所用此图为圆形局部截图，图像尺幅较小；《东方杂志》以椭圆形局部截图方式使用，图像尺幅略微扩大了一点，《时代》半月刊则可能直接使用了照片原图，为横幅原状，照片中的图像也更为清晰了。

尤其注意的是，《时代》半月刊在使用这张图片时，为之所加“图注”又有所改动，没有再使用“交涉”一词，而是强调学生在与军警对峙情形之下主动谋求“沟通”，一直试图以情动人且以理服人，尽可能化解这原本对峙且将产生对抗的局势。“图注”原文如下：

“北平学生为反对华北自治而大游行、大示威，无奈军警以大刀木棍反向学生示威，学生们前后受伤者数百人，图为游行学生以情感感动军警时的情形。”

此外，《时代》半月刊在本期刊物（第9卷第2期）中更以“五四精神的复活”为概括主题，对一二·九运动及其“北战南征”式的社会影响力与精神感染力，予以热烈激昂的赞颂与表彰。本期刊物封面主图，选用的就正是一张反映上海社会各界以实际行动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现场照片，封面上即印有“图注”：

“五四精神的复活：十二月廿四日上海市工商学各界为响应北平学生的救亡运动，集合代表数千人举行救国示威大游行，于朝晨八时聚集于南京路大陆商场，散发传单，无奈上海为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根据地，于是工部局里的洋警察，看守马路的红头阿三们，个个都武装起来，手拿着木棍向聚集的群众们乱施打击，虽未致

‘五卅’再现，但因而受伤者着实不少，可是我们的群众，心是不会死的，于是日下午还是游行示威。”

我国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的《东方杂志》，更为一二·九运动辟出图片报道的专版，凭借其强大的公共传播网络与庞大的国内读者群体，令这一重大事件的现场实况，得以更为充分广泛的披露与流布，渐为南北各地的读者大众所周知。

1936年新年元旦之际，《东方杂志》便不失时机在“新年特大号”（第33卷第1号）上，推出题为“悲壮热烈的北平学生运动”的图文报道。用多张现场图片介绍称：

“最近以来，华北局势日急；北平各大学学生激于义愤，曾数度举行示威游行，向当局请愿，反对所谓‘自治’运动，情况之热烈悲壮，为‘五四’以来所仅有。兹特将当时情形，刊发于此。（张万里寄）”

此次刊发的照片共十张，分别为“鹤立西直门外的一部分学生，彼等原拟入城请愿，但其时城门已被军警关闭”，“在西直门外守候开城之又一部分学生”，“从西直门折赴西便门途中”，“阜城门外守候开城之学生（据报载十二月九日游行时，被阻城外之学生曾在零度下寒冷中鹤立八小时）”，“清华燕京两大学学生入城请愿，在途中与警察交涉之一幕”，“与军警冲突前之交涉”，“寒色紧密中的热烈游行——入城请愿之学生赴西直门途次”，“西直门外戒备之军警”，“从西直门至西便门，西便门又闭，学生仍守候不散，皆以冷馒头充饥”，“学生举旗至西便门时，军警又以骆驼十余匹拦住去路，学生乃纷纷从小河越过”。

从这些现场照片以及带有浓厚同情与支持口

代表的北大教授俱乐部等三方势力，均以敦促学生“复课”、力图平息事态为当务之急。然而，事态的发展出人意料，原本手无寸铁、势单力孤的北平学生群体，以其爱国热诚和顽强到底的精神，令南北各地社会各界人士均表同情、感佩、支持，乃至随之热烈回应与遥相呼应。

一二·九运动，不久即呈现出南北互动格局，已然形成了席卷全国的发展态势。直到1935年年底，北平各大院校均未实现“复课”，一二·九运动还在向纵深发展。以《立报》《东方杂志》为代表的上海各大报刊，对此纷纷予以及时细致的图文报道，倾力将这一重大事件与这段历史存档。时隔90年后，抚读这些故纸旧迹，从中去考察历史细节，重回历史现场，一切都还历历在目。

一二·九运动爆发不到一个月，即迎来1936年元旦。在这辞旧迎新的节日里，按业界惯例，国内各大报刊无不为之营造喜庆祥和的氛围。除前述《东方杂志》，特意在1936年元旦这一天印行的“新年特大号”刊物上大张旗鼓的刊发关于一二·九运动的图文报道之外，著名学者、作家林语堂也曾于1936年1月3日，写过一篇《新年试笔》，文中一反新年之际说吉祥话的惯例，决意要为一二·九运动说几句公道话，要为政府无能骂几句痛快话。

两天之后，即1936年1月5日，林氏此文就发表在在了上海《立报》之上。文中既表达了对学生爱国情怀的激赞，也表达了对学生运动惨烈处境的同情，更表达了对南京政府不去励精图治、整军抗敌，却全力镇压学生运动的愤慨。开篇即语：

“政府者何，人民之冤家也。此人民与政府之所以狭路相逢了。北平军警以大刀背砍伤学生，使我想到如此。察哈尔六县无声无臭去了五县，而政府仍言在交涉

中，也使我想到如此。”

接下来，文中颇感痛心的提到：

“学生未尝怨军警，军警亦未尝怨学生。学生要爱国，军警何尝不爱国……问题不在军警而在当局！当局所虑不在地方治安，乃在外交纠纷，不得不打学生给日本人看看！”

试想，一贯以“幽默”与“闲散”著称于文坛的林语堂，在了解一二·九运动实况与真相之后，竟然也写出这样意见明确、态度鲜明的时论文章。由此，足见当年一二·九运动对中国社会各界的影响。

事实上，对于一二·九运动，南京政府与北平当局除了想方设法加以阻挠、调停、训诫与劝导之外，对于广大学生与民众的呼吁，并未也不可能予以实质性的响应与支持。因多年军阀混战与割据造成的政治经济体系混乱不堪，导致名义上统一南北的南京政府一直治国乏术、施政无方，早已自顾不暇。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在华北政治、军事上的侵略行径愈演愈烈，南京政府方面却只是一味退让求和，对随之出现的由日伪策划的“华北自治”问题，也没有采取坚决措施，仍存有苟安求和的幻想。直至1936年“西安事变”与1937年七七事变接踵而至，才不得不服从全民族统一抗战的大局，投入到全面抗战的历史洪流之中。

以上述历史背景与历史事实为前提，一二·九运动作为随后不久多个重大历史事件的“预警”与“催化剂”，自然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一运动，的确是以爱国学生为主体，以“团结抗日”“维护主权”为号召的一次重要历史事件，这一事件为全民族统一抗战大局的形成，做出了极为重大且卓越的贡献。

海淀抗战史话（二）

徐佳伟

（接前）

一、天津事件再激怒火

1931年11月8日，驻天津的日军武装袭击天津市公安局、市政府及河北省政府，并策动汉奸李际春、张璧组织游民千余人武装暴乱。为此，天津市当局宣布戒严，并拘捕了61名闹事者。9日，日本驻天津领事借口一名日军排长被中国士兵打死，下令驻闸口的日军炮轰市区。26日，日军又一次袭击河北省、天津市政府部门及电话局，狂妄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天津、绝对取缔抗日活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命令中国天津驻军撤出。天津事件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激发海淀人民抗日救亡斗争的不断高涨。

1931年11月11日，北平大学农学院抗日救国会举行第五次常委会议，通过三项决议：一是向北平各界抗日救国会发函，随时电话告知城内最新消息，保持一致；恳请学校方面想办法加强与市内的联系，及时了解城内消息；二是请求张学良方面配发枪弹，加强军事训练，准备对日作战，必要的时候联合其他学校共同请求；三是召



图5：1931年11月8日，日本策划天津的便衣队暴乱，制造天津事件（作者供图）

集学院工场的工友以及附近的小学，宣传报告日军在天津的暴行。燕京大学召开全体大会，通过军事训练案，决定全体学生每日早6时半至7时半军训一小时，并要求市政府发给枪支。此外，还停办刊物，将费用充作抗经费。燕京大学教职员就天津事件向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发电：“津变突起，无任震惊，公等守土有责，不应畏缩；苟失寸土，国民当有严重之制裁，诸警士奋不顾身，为国杀贼。敝会同人除已委派专员赴津慰问

外，并请先代致恳挚慰劳之意。”^①清华大学联合各大学致电政府，要求对日宣战：“窃自辽吉沦陷以来，瞬将两月，我全国同胞，忍辱含垢，静候我政府之提诉国联，欲以人类正义，国际公法，屈彼方张之寇。乃倭奴狼奔豕突，凶焰日肆，非惟撤兵无期，近更纠合浪人，扰乱天津，野蛮狠毒，凶暴卑污。盖亦逾人类行为之范围，而不可与语正义人道国际公法矣，我国家人格，民族精神之受其蹂躏践踏者，可谓无以复加，是即可忍，孰不可忍。为此电请钧府，即日对日绝交，准备作战，我全国人民，自必誓效前驱，愿洒我全民热血，以争国家之人格，以求国际之正义，否则众怒所激，诚不能逆料者矣，迫切陈词，不胜翘企之。”^②

二、抗日援马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马占山临危受命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江桥战役中，中国军队在嫩江大桥及其附近与日军展开殊死拼杀。马占山调兵遣将，亲临前线指挥，击退敌人的一次次进攻。这次战斗，日军共损失兵力1000余人，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受到的首次重挫。江桥抗战打响了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全国人民以各种形式纷纷支援马占山抗日，形成了“抗日援马”活动。

马占山的爱国行动引起北平各界的巨大反响，各界声援慰问信、电报纷至沓来。燕京大学教

职员抗日会电报中说：“暴日无厌，进窥黑境，先生及诸将士力抗不屈，为国家守疆土，为民众争人格。敝会同入敬谨慰劳，幸坚守原地，万勿退却，全国国民，愿为后盾。”^③燕京大学全体学生致电：“山河破碎，举世昏懦，国家柱石，唯公一人。伏唯努力杀贼，为民族留最后人格，并将此遍传部曲，宣慰吾民感泣爱戴之至。”^④燕大教师容庚在杂志《火把》上发表二十余篇文章，总标题为《悲愤》，痛斥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歌颂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救国的壮举。北平大学农学院教职员抗日会、清华大学学生抗日会、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也都向马占山致电。清华大学的教师还向蒋介石、张学良致电，要求援助马占山抗日：“南京国民政府蒋总司令、北平张副司令钧鉴：黑龙江马代主席及将士孤军守土，神勇精忠，举国同钦。务望即派军汇饷，火速援应，万勿使忠义之士以援绝致败，国家幸甚。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叩。”^⑤

1931年11月17日，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在《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上登出启事：拟由本校教职员捐资千元电汇黑省，慰劳卫国战士。捐款先请学校垫付，再以扣减同人十一、十二两月薪津百分之一补还。因召开大会不易，故以公开启事方式征商同意。12月2日，马占山回电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称：“三军袍泽，同布谢忱。谨拜嘉言，益励初志。本政

①②③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6页。

④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

⑤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页。

府现移海伦。尊处汇款已派员前往哈尔滨接洽拨转。”清华大学学生抗日会同步发起募捐活动，12月25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公布612人捐款情况与个人捐款数清单。“计共募得国币925元整，已于本星期二由大陆银行电汇至滨江该行分号。同时由抗日会致电海伦马将军，请其派员前往领取代为发给为国效命之忠勇将士，藉资慰劳之意。所有捐款清册即于本期校刊上刊登，如有错误，务希函示，以便更正是幸。经手人王德政敬启。”1932年1月16日，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向马占山汇款1000元。

三、东北形势的恶化和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在攻占沈阳的同时，沿南满铁路、安奉铁路疾进，迅速占领安东（今丹东）、营口、凤凰城等城市。接着又把兵锋指向其他城市。从9月19日到25日，仅用一个星期，日军几乎没有遇到大的抵抗就占领了沈阳、长春、营口等30多座城市，控制了南满、安奉2条铁路和部分控制了北宁、中东等10余条铁路。10月，日军的侵略范围扩大到辽西和黑龙江省。1932年2月5日，哈尔滨失陷。日本帝国主义仅仅用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从山海关至黑龙江之间面积达110余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国土。

1931年9月21日，国民党政府就九一八事变向国联提出申诉，并向全国宣告，“要求国人镇静忍耐”，“信赖国联公理处断”^①。但是，为英、法等国操纵的国联并不像国民党政府所希求

的那样，对日本实行制裁措施。国联理事会对日本的侵略不作任何谴责，只是劝告中日双方协商日方撤兵事宜。日本对国联作出的限期撤兵的决议拒绝接受，国联也无可奈何。同年12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就职演讲中要求清华师生“紧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清华大学抗日会向国民党政府、顾维钧、各报馆致电反对设置中立区和中日直接交涉。燕京大学全体教职员、学生、工友通电全国拒绝国联决议，认为：“守土有责者，不能御侮保民，则亦已矣，何必掩耳盗铃，卖国固位。尚望各界共起力争，拒绝到底。”^②议案无果后，国联成立由英、美、法、德、意五国成员组成的调查团，对九一八事变进行调查。1932年3月2日，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在生物馆大讲堂召集全体大会，50余人参加，叶企孙担任主席。经表决同意：以全体教职员名义，致电政府，反对撤兵、妥协及设立中立区，敦请政府出兵收回东北失地。4月，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发布致国联调查团意见书，提出六点最低希望，并明确表示“中国人民必不予以许可”更低限度的解决办法。10月2日，调查团发布报告书。报告书承认东北为中国领土，把责任归咎于中国，并建议由西方列强共管东北。10月14日，燕京大学政治学会主席卓还来主持大会，谴责国联调查团偏袒日本强占中国东北领土。

四、吴其昌绝食哭陵

在社会各界纷纷参与行动、抗日救亡轰轰烈烈

^① 《蒋主席召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纪事》（1931年9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81页。

^②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页。

烈进行之时，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吴其昌及妻、弟到中山陵绝食哭陵事件震动全国。

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号正厂，浙江海宁硖石镇人。幼年双亲离世，备感生活艰辛，学习认真刻苦。1921年17岁时，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受业于唐文治。1925年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治甲骨文、金文及古史，从梁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及宋元明史。1928年因梁启超的举荐，任南开大学讲师，后任清华大学讲师，1932年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全面抗战爆发后，随校迁至四川乐山，吴其昌任历史系主任。

吴其昌自青年时期就非常爱国。在无锡国专时，感慨国事一日日衰退，因此撰写文章上书政府。唐文治改杜甫的诗称赞他为：“吴生拔剑”。1926年吴其昌参加三一八反帝大游行。惨案发生时，枪弹从他耳边飞过，幸免于难。九一八事变后，吴其昌、吴世昌兄弟二人忧愤满腔。9月21日，吴世昌在燕京大学校园里贴出要求抗日的大字报，即《告全体同学书》：“国家亡了，只要有志士仁人，还是可以复兴的。哀莫大于心死！所谓士大夫阶层对国事如楚人视秦人之肥瘠，这才是最大的耻！耻！耻！”^①他还被选为燕京大学学生抗日会第一任主席。

吴其昌、吴世昌时刻关注局势变化，参加爱国活动。11月20日，吴其昌夫妇、吴世昌到张学良居住的北平顺承王府绝食请愿，要求：“一、急调大军，由昂热线昼夜趋进，捣日寇之背，以

解黑龙江之围；二、急电蒋主席，调首都空军飞黑，驱逐暴日；三、急电巴黎施公使，在日军未退出跳昂线以前，拒绝任何和解……上列三事，副司令一日不行，则其昌全家一日不食；副司令电发符行之顷，即其昌全家重新进食之时。如终不见允，或效马将军为国成仁，则其昌羞与副司令并立于此庄严神圣之禹域，当即率妻弟全家饿死于副司令之庭，以彰我副司令遗臭万年之德。”^②经与张学良副官反复磋商到夜8时，张学良只允第一条，称已电令吉黑各军全由马占山将军指挥，第二、三条则允发电请示南京。于是，吴其昌携妻、弟连夜赴天津，乘津浦路车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③在天津车站时，吴世昌向燕京大学校方及师长写信请假，信中称“吾辈书生，无以报国，但有血泪，誓当挥洒。明知此等消极行为，必为爱吾诸师长所不许，但望能因此激发对国事漠不关心者之天良”^④。11月23日，吴其昌等人到达南京，教育部长出面接待并帮助安排住处。11月24日，由国民党政府秘书谭翊、参军处刘志道、黄国雄送至蒋介石私邸。此时，吴其昌夫妇和其六弟吴世昌绝食已达84个小时。所请三条要求得到蒋介石的肯定答复后，吴同意复食返校。^⑤随后，吴其昌等人前往中山陵前哭陵，宣读《昭告总理文》：

我国自鸦片战争以还，应亡国者屡矣，至庚子之役，而中国实际上遂受凌迟。仰赖先觉先烈，戍戍诸贤，呼救于前；至我先生挺生，慈悲勇猛，作狮子吼，钜伟人格，照耀寰宇。赤忱精

①② 吴令华主编：《吴其昌文集》（伍），三晋出版社2009年版，第328页。

③ 苏艳萍著：《抗战中的中山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④ 吴令华主编：《吴其昌文集》（伍），三晋出版社2009年版，第328页。

⑤ 苏艳萍著：《抗战中的中山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诚，感格灵蠢，使我中国，白骨重肉，是皆依赖我先生一人之光明也。今哲人萎谢，不及七年，而暴邻凶戾，遂肆掠劫。最近东省沦亡，平津起盗，国家存亡，危系一发。其昌不忍见我祖国宗社沉沦异族，誓率我妻我弟全家绝食，以促元首觉悟。计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十二时起绝食，由北平忍饥匍伏晋京，至二十四日上午十二时止，凡绝食八十四小时。而蒙主席蒋中正、副司令张学良分别当面答复，全部诚意接受，对于国家，有最后彻底之决心。吾先生在天之灵，实昭闻之。谨率全家拜告于先生灵下：此后如蒋主席、张副司令果能实践前诺，毅然御悔，是不愧为先生肖徒，尚望先生在天，明神佑之。如蒋中正、张学良背言卖国，或食言误国，是甘心为先生之罪人，尚望先生在天，明神殛之。谨率吾全家即在先生陵下开始复食。并当锻炼此躯，为国家尽虫蚁劬瘁。^①

当时中外报纸都对吴其昌全家绝食哭陵进行了报道。

五、肇始于清华大学的南下请愿运动

就在吴其昌绝食哭陵之际，清华大学学生掀起南下请愿运动。11月22日，清华大学学生召开大会，“僉以日寇益逼，国亡俄顷，马占山苦战无援，政府亟应立决自卫方策，爰一致议决，全体赴京请愿，如国府无具体答覆时，当绝食以待，以示坚决。”校方多次劝阻学生不要南下，为学生所峻拒。对于路局不让学生乘车的可能，学生们决定以卧轨表达抗议。学生们还发表赴京请愿宣言：

各界同胞们：本校教师吴其昌先生，因感马占山将军孤军转战，饷尽援绝，日寇横肆侵略，亡在眉睫，忧国情深，悲愤绝食，爰率全家向副司令请愿以下三事：（一）急派大军直捣日军之背，以救马将军之危，（二）请蒋主席速派空军营救；（三）电施公使在日军未撤退前拒绝任何调解，所请三事一日不达到，则全家一日不复食，今已为副司令送往南京矣。吴先生为社会柱石，青年导师，一门忠义，舍身救国，令人激昂奋发，感动泣下。同人等谨继吴先生之志赴京请愿，抱必死之决心贯彻吴先生之主张，若国府不予容纳，则誓饿毙于首都，以光吴先生之志向。祈各界同胞，一致声援，共挽危亡，谨此宣言。^②

在学生南下请愿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学校方面发出公告：“举动虽嫌激越，热情尚属可嘉，应即准其个别请假，以成其志。并商准教授会，待其返校后为之补课。”

《世界日报》关于《清华请愿团赴京》的报道如下：

“车站集合：清华请愿团，本定全体同学南下，因校方劝告，以学业为重，最终始决定由义勇军及一部分同学南下，昨日午后三时后，请愿团即乘学校汽车分队进城，至四时三十分在车站集合完毕，统计请愿团人数约二百三四十人，先在候车房集合，然后陆续入南月台，全体共分三中队，每一中队又分三组，推林文魁为总指挥。

军人装束：请愿团全体，均着灰布军装，在雪地冰天中，表现悲壮之气。每人左臂缠白布标志一方，上书清华请愿团，并盖印章。全体集合

^① 吴令华主编：《吴其昌文集》（伍），三晋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

^②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11页。



图6：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下请愿团开展卧轨斗争
(作者供图)

后，由总指挥训话，不准扰乱秩序，不准个人对外发表言语，不准无标志者混入对内，并严令纠查队纠查，请愿团每人携口袋一个，内装饼干衣毯等物。

决心卧轨：平浦车五时始调集完毕。请愿团即登入三等车内。距车站以未奉局令，不能开车。旋由津浦站长高某，用电话向总局请示，路局方面，首先坚持不能认可学生乘车。全体学生为表示其请愿决心，全体即卧机车前之铁轨上，亦不顾及雪地，每人手持请愿小旗，约半小时后。路局始来电话，允拨出二等客车两辆，为学生乘坐，请愿团因交涉圆满，遂由总指挥下令集合。

群呼万岁：全体集合既毕，当有清华同学发表演说，略谓我们这次南下赴京请愿，大家要一致的向政府请求，务须达到我们最后目的，当时全体群呼‘中华民国万岁……’声如雷动，车站并有昨晨自沪来平之上海援黑救护队一队送行，齐唱国歌，至六时十分车鸣笛开动，清华请愿团，遂于‘万岁’声中，离旧都南下矣。”

六、大规模的青年学生南下请愿示威

清华大学学生的南下请愿开了北平学生南下请愿、示威运动的先河，其他学校也纷纷行动起来。11月29日，燕京大学190名学生不顾校方劝阻南下请愿。12月1日，北京大学300余名学生组成示威团到南京示威。12月4日，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法学院、女子学院、农学院、铁道学院、盐务学校、辅仁大学、河北省立十七中学、大同中学等9校共计2100余人赴车站南下。当局阻扰，学生在车站滞留两天，与之进行抗争。到6日晚，学生总人数已增至4000人。12月7日，抗争胜利，学生乘车南下。

在南下途中，学生内部发生了“请愿”与“示威”的名义之争，终至分裂为请愿团和示威团两个部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学生到达南京后，多次组织请愿、示威活动，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12月11日，请愿团1300名学生前往国民党政府请愿。在学生们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被迫出面作出“解释”，即目前中央方针是静候国联处理，望学生努力求学，作政府后盾。12日下午，请愿学生再次前往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蒋介石北上，蒋介石敷衍说：“本人北上并非难事，但国内不统一，外交势必受到影响。”几天之后，请愿团的大部分学生认为请愿的目的已基本达到，纷纷返回北平。请愿团中少部分学生加入了示威团的斗争行列。

燕京大学未南下参加请愿示威的学生则参加了学校赞助的爱国运动周。11月30日，举行宣誓典礼，爱国运动周开始。由全体院长、中国教职员抗日会五名代表、学生抗日会两名代表、学生会两名代表组成运动周委员会，负责统筹运动周工作。“我们希望在此期间，能够实际合力从事于各项爱国工作，使这一星期不至于随随便便的过去，能有真成绩可以拿的出来，同时并给去南京请愿的同学一种精神上的支援。因为工作重大，所以不能不有严密的组织规定一切。”^①

按照安排，上午开展讨论，题目包括对日宣战问题、外交上应采取之步骤、东北问题之基本原因、今后之改造工作等；下午为训练班，军事训练、无线电队、测量队、军事化学演讲及文字工作、救护班、手工团等。晚上则是专家指示次日讨论大纲。鉴于普通民众对国家大事丝毫不知，燕大学生还组织宣传队于12月2日起开始在燕大附近村庄及远途演讲，“宣传暴日侵略我国真相，使乡民对于中国近日之情形，与所遭遇之侵略危害，更有深切之认识。”演讲队还到北平小学校演讲，曾就“病夫”问题连讲3天，让小学生明白中国失败的原因及改良的方法。另组织长途宣传队男女10人于12月3日上午出发，先乘平绥车至南口，然后再分往各村宣传，“听者闻听之下，皆悲愤交加，咸有为国效劳之慨。”12月5日，爱国运动周结束。校长吴雷川在结束时讲话中说：“爱国运动周活动虽然结束，爱国的

运动实在是才起头。”教务长司徒雷登则希望燕京大学学生锻炼身体、修养品格、努力学习，从而能使中国“不出二十年，在世界上必得他相当的地位”。^②爱国运动周结束后，学生抗日委员会决议于上课后，每星期仍继续讨论中日问题一次，藉以研究对日策略。“‘爱国运动周’是燕大有史以来一种有价值的运动，也是中国教育界对于爱国运动创始的贡献，其意义之重大，自不待言。”^③

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北平青年学生的南下请愿、示威运动，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政策，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抗日救亡热情。

七、支援淞沪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淞沪抗战爆发。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几十所学校发出通电，表达支持十九路军之意。燕京大学学生的通电中说：“义师屡捷，举世震奋，精忠神勇，感格灵蠢，伏维再接再厉，拒绝调停，保我人格，壮我河山，我辈后死，誓作后盾。”^④海淀各高校积极组织捐款捐物支援前线。2月2日，燕京大学学生会决定向全体同学每人征收1元钱，慰劳十九路军；全体女生缝制带有“一针一线密加工，送至军前慰有功；勿忘御寒并御侮，闺闱救国与人同”小诗的绒衫棉衣，送往上海作鼓舞

①③ 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1页。

② 《燕大爱国运动周拾零》，《真理与生命》第6卷第4期，第33—34页。

④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二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

士气和御寒之用。4日，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抗日会向十九路军电汇1000元。8日，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向日委员会捐出薪水慰劳十九路军，“淞沪御敌，振国家之声威，转世界之视听。全体国民，极深感佩。同人等谨捐薪五百元，由大陆银行汇交贵军，藉表慰劳微诚，仍祈继续努力！”同日，教职员公会又续汇慰劳十九路军捐款五百元。22日，清华大学抗日会募捐630.56元，汇往上海。面对淞沪抗战缺医少药的情况，清华大学师生开展相应支援活动。26日，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抗日会决定长期扣薪，支援抗日将士。3月1日，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开会议决：（一）由本大学教职员公会每月捐薪五千元，暂以三个月为限，共计一万五千元，专作救护淞沪伤兵医药费；此款可协助或委托协和医学院同人，赴沪办理救护事业。（二）推选叶企孙、陈岱孙、萧叔玉三人商定捐款分配方法。经讨论，用级数累进法，将各人薪金，以百元为单位，分成若干单位，然后按各单位之百分率累进抽取捐款。2日，教职员全体大会通过了商定的办法。淞沪抗战结束后，清华大学的捐款还没有用完。1932年4月22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公布：“大陆银行现存清华之抗日捐款，截至本日止，总数如下：音乐会票价237.4元，外籍教员捐款250元（三月份），三月份教职员捐款4932.25元，四月份教职员捐款4985.58元。共计10411.23元。”

在援助之外，各界还积极了解宣传淞沪抗战情况，开展纪念活动鼓舞斗志。2月25日，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抗日会邀请郑振铎在礼堂做报告，讲述淞沪抗战事宜。2月26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专题刊登郑振铎讲演内容《我所见的上海战争》。2月29日，清华大学邀请刘文典演

讲《东邻野心侵略之计划》。3月21日，何海秋演讲《沪战之影响及教训》。演讲中提到三个重大影响，即促醒了大部分国人的民族观念、改革政治的运动、得了自信力。3月，清华大学联合燕京大学等学校发起北平市民公祭抗日殉国烈士大会和九一八半周年纪念会，以唤起民众同仇敌忾抵抗日本侵略的斗志。3月18日，清华大学举行三一八国耻纪念会，特邀阎宝航来校讲义勇军在东北活动情形。

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第十九路军和随后参战的第五军部分官兵英勇作战，取得重大战果，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迷梦。但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方针基本仍是求和。在这种情况下，各校纷纷致电国民党集团当权派。清华大学反日会致函张学良请求出兵收复东北失地；教授俞平伯以“鄙人未隶任何党籍，供职国立学校，以不敢放弃国民之天责”的坦承致电国民党政府、刚刚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提出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中不可理解之处六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两校教授陈寅恪、容庚、吴宓、俞平伯等人3月3日特电国民党政府，表示反对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要求坚决抗战到底，说：“今日之事，敌兵在境，岂可作城下之盟，置东省失地、淞沪牺牲于不顾。”3月19日，香山慈幼院抗日救国会发出敦促政府积极抗日通电，指出“敌著著进犯，我著著退让，进犯者贪得无厌，退让者示人以弱。我之地有限，敌之欲无穷”。

支援淞沪抗战的民众运动充分显示了蕴藏其中的抗日力量，在活动中抗日救国运动得到进一步宣传扩大，民众救亡运动越来越深入。

八、开办西山干部训练班

1931年9月27日，以“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的东北民众抗日

救国会成立。该会成员的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反帝大同盟盟员和广大爱国青年，团体中的一些领导人还与共产党人建立联系。1932年夏，东北全境一半以上的义勇军接受救国会委任和领导。

救国会为提高义勇军的政治、军事素质，加强通讯联络和提升治疗伤病员的医疗水平，从东北籍学生中挑选出一批学员，分别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派到各部义勇军中去工作。1932年7月，共产党员徐大同、宁匡烈、张希尧等人向救国会常委们建议成立干部训练班。常委们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责成阎宝航负责筹办，徐大同、宁匡烈、张希尧、宋醒池协助。经过严格审查，他们在东北籍青年中选拔了100余人，于8月初在西山卧佛寺组建西山干部训练班，对外以东北大学学生复会委员会名义为掩护，阎宝航任班主任，张希尧负责组织工作兼管生活事务。在授课方面，阎宝航负责讲授时事报告，徐大同讲授游击战术和思想教育，宋醒池讲授马列主义，宁匡烈讲授火药制造和爆破。训练班纪律严格，同学们不准问对方的家乡和真实姓名。训练班快结束时还进行一次实习，由领导布置回到北平城里，选择不同的保护色和秘密住址，只和指导自己的联系人对接，以是否隐藏自己住址和行踪作为评判成绩是否优良的标准。如能顺利完成，再给简单的任务进行实际训练，如探寻某人的行动、住址，某机关的性质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等。10月，训练班结束，学员有的留在平津，有的到苏区，大部分被派往东北。“开办西山训练班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批受训练的东北青年认清了国民党投降卖国

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本质，确定了跟着共产党走，为实现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任务而斗争的方向。”^①不少人私下提出入党要求。

九、匹夫有责的爱国行动与情怀

1932年，经中共北平党团组织动员和派遣，很多东北籍学生返回东北开展抗日斗争，其中有原中共西郊区委书记、清华大学学生张甲洲和同学于天放等人。他们奔赴被日军占领的黑龙江省巴彦县，组织抗日游击队，曾一举收复巴彦县城。对于抗击日寇，张甲洲认为：“当前是民族危亡的时候，抗日救国是大事。我们都是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外打日本鬼子，决不能打自己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②

李庭槐，1928年以后在北平大学农学院化学系求学。1930年暑假期间，李庭槐、武斌、蒋基金等联合北平、天津、奉天读书的家乡同学，借放假回家的机会，赶走县长翟星凡，推倒了巴彦花园里前任县长王玉科竖起的“德政碑”。1932年春，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分批返回巴彦，配合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抗日游击队开展地下反日工作。李庭槐在中学任教，不穿协和服，不学日本话，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他经常找机会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抗日救国教育，一些学生在他的教育下，入关参加了革命。

高程云，北平大学农学院学生，积极参加反日爱国运动。1932年12月8日，学生宿舍号房信箱被发现传有传单，国民党政府当局严查后，将高程云等28人列为缉拿对象。1933年5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高程云投笔从戎，参加同盟军。

① 王驹邵宇春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4页。

②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英烈》，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图 7：1932 年巴彦游击队领导人合影，后排中立者为张甲洲（作者供图）

香山慈幼院创始人熊希龄在香山北辛村的熊家墓园为自己建成生墓，并自撰墓志铭：“……今当国难，巢覆椽崩，若不舍己，何以救群？誓身许国，遑计死生，或裹马革……”在淞沪抗战爆发后发布的《香山慈幼院通告》中，熊希龄将全家都进行动员并分配工作：

“余婿第四校主任朱霖，本属飞机制造专家，此时应尽其所能，以任前方航空队之修造诸工作也，故第四校主任即应委人代理。

余女熊芷遵其先母遗意，应即组织女红十字救护队前往战区，尽其救护伤兵，看护后方医院之责，故第一、第二两校主任，应即委人代理。”

1932 年，清华大学学生吴晗在《清华周刊》第 37 卷第 5 期发表两首七律《感事》以表达对不抵抗政策、伪满洲国的建立、东北义勇军英勇抵抗、上海淞沪抗战的愤慨：

阴风起地走黄砂，战士何曾有室家。
叱咤世惊狮梦醒，汤除人作国魂夸。
烦冤故鬼增新鬼，轩轾南衙又北衙。
翘首海东烽火赤，小朝廷远哭声遮。

将军雄武迈时贤，缓带轻裘事管弦。
马服有儿秦不帝，绍兴无桧宋开边。
江南喋血降书后，北地征歌虎帐前。



图8：熊希龄墓（作者供图）

回首辽阳惊日暮，温柔乡里着鞭先。

吴晗还写信给胡适，“看着人家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宰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点热血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也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过去四个月，无时无刻不被这种苦痛

所蹂躏。最初的克制方法，是把自己深藏在图书馆中，但是一出了馆门，就仍被袭击。”^①

志向和优势在文科的钱伟长，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攻读中文专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钱伟长认为只有科学才能救国，决定改读物理。当他提出转系申请时，数理化三科总成绩还不到一百分。与物理系课业重、每届都有一半同学因承受不了繁重的学习负担而被迫转系形成对比的是钱伟长身体单薄瘦弱。秉持“真理只有一条，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3页。



图9: 1932年《燕大周刊》关于周振光将捐款交给朱将军的报道（作者供图）

国家需要你干，你就学”信念的钱伟长打动了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决定让他试读一年。如果一年内钱伟长数学微积分和物理的成绩在七十分以下，立即退回中文系；并要钱伟长同时选修化学，加强体育锻炼。那一年，钱伟长除了吃饭睡觉，全部时间和精力扑在物理和数学及补修数学和化学系的相关课程。到学年结束时，他的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科目的考试成绩都追到八十多分，得到以严格著称的吴有训的认可。

1932年9月18日，燕京大学学生会与教职员抗日会举行九一八纪念活动。上午在大礼堂召开九一八周年纪念会，下午组织宣传队到成府、海淀各地。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周振光为此编写


《九一八国难周年大事记》，其中写道：“沈阳事变，瞬息周年，山河破碎，金瓯残缺，而国内上下，泄沓如故，光复失地，未知何日，惟此国耻，当永世勿忘。爰将一年来大事，择要录出，用促阅者反省。振光附识。”周振光、杨志信等四十余名学生得知东北义勇军为国流血、血战日军而寒天衣单，于是提请学生会发起援助东北义勇军募捐运动。11月18日，募捐活动结束，学生方面实捐洋870元1角5分，“即于十一月卅日，由本团主席周振光携往北平，面交朱庆澜将军”。

1932年9月24日，燕京大学史学系毕业生及在校生谭其骧、朱士嘉、邓嗣禹等鉴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及当时存在的“以外人所著之中国历史为教科书”的紧迫情况，发起北平史学会，旨在集一方之才智，作共同之努力。史学会以阐明史学发扬文化为宗旨，分类研究民族、交通、译述、经济、典章制度、史学方法、社会、地理沿革、政治、考古各史组。

面对国民史地知识短缺的情况，1934年9月，由洪业、张荫麟、容庚发起的《大公报·史地周刊》出版。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当时所处的时代——这一方面是经济力上，政治力上，甚至信仰力上，皆分立而不集中，散漫而无组织的时代；另一方面意识已形成新生产方式诞生的前夕的冲突，在强敌的威胁下挣扎生存。面对存亡之际又如此分散的现状，刊物的目标就是，“我们的野心是以兴味的甘饵引起一般人对于史地，尤其是本国史地的注意，并且供给他们以新国民所应有的史地智识。……本刊的任务是直接地或间接地使史地智识，尤其是本国史地智识，兴趣和普遍化”。

（未完待续）

寻迹明代的广济桥

 董三福

北五环上清桥西北隅的小月河上有一座东西走向的三孔连拱石桥，《北京地名典》记录“此桥是北京地区仅存的五座古桥之一，属市级保护文物”。这座桥就是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的广济桥（俗称清河桥）。原是横跨清河、南北走向的桥梁，怎么挪到清河支流小月河上了呢？

按《钦定日下旧闻考》引《明一统志》载“广济桥在府北三十里，跨清河”。原来，北五环外的清河地区曾是明清时期一座军事重镇，因清河穿流分为南北两部分，是通往居庸关的必经要道，从德胜门到昌平的官道就穿过清河镇。从清河直向北留存的四拨子、二拨子等村落地名至今仍是记录着这条官道的印记。

史料记载，元代皇帝每年“春秋行幸”过清河时，都是在清河上搭建季节性木桥，秋冬架桥，春夏设渡，桥板便存放在桥头庙中，河里只留桥桩。等到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北上飭边，以及把皇陵确定在昌平天寿山以后，官家修整了从京城通往皇陵的道路，即南起德胜门，经元大都城的健德门，过清河店（即清河镇），往北经沙河店（今沙河镇）、昌平县城至皇陵区。修路期间，

重修了健德门鸾桥及其北侧的卧虎桥，新建了三孔联拱实心栏板石桥的广济桥。

广济桥建成于明永乐十四年（1416），由明廷工部监造。广济桥桥体和泊岸全部用块石包砌，内部结构完全用条石和城砖混砌而成，并浇灌白灰浆。桥长50.14米、桥宽12.46米，用条石横向铺砌。两侧望柱每侧24根，柱头雕刻有覆莲纹，柱身及中间栏板均两面对称刻长方倭角双线边框图案。三孔桥洞拱券中孔跨径6.35米，两边孔跨径5.87米，拱券上方共布有长锁石6块，桥洞间建有楔形分水石，分水石采用纵联横向砌法，上顶宽3.84米，迎水面尖、背水面平。

广济桥的建成，为明清两代皇室北巡、谒陵乃至木兰秋狝提供了便利。《明史》中朱棣有三次过清河的记载。宣德皇帝朱瞻基祭陵过广济桥被详细记录在顾炎武先生所著的《昌平山水记》中：“宣德五年（1430）二月，上奉皇太后谒长陵、献陵，上躬橐鞬骑导皇太后辇至清河桥，下骑扶辇，既度桥，上复乘骑，郊甸之民夹道罗拜，皆称万岁”。清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皇帝



小月河上的广济桥（林琳供图）

留有御制诗《过清河桥》：“北过清河桥，遥见天寿山。胜朝十三陵，错落兆其间”。

民国时期，清河官道东侧逐渐形成一条新道，就是后来德昌公路的雏形，并在广济桥东侧新建跨河的五孔木桥。解放后，德昌公路拓宽改造，将五孔桥拆除后建起十三孔木桩大桥，后来又建成钢筋混凝土大桥，广济桥作为交通主干道桥梁的作用逐渐减弱。二十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政府对清河河道进行“截弯取直”和拓宽改造时，广济桥因为长度受限，有关部门决定拆除广济桥另建新的大桥。为此，文物部门经过专家论证，决定将广济桥移建在原址东南附近的小月河入清河河口处。

1983年3月，广济桥被整体拆除，拆卸下来的桥石构件标号保存。次年10月，由河南林县建筑工程队施工的广济桥重建工程在小月河上正式动工。1985年6月竣工。重建后的广济桥外观尺寸、石件按照古桥实样复修，建筑风格也保持原有风貌，但石桥因小月河是南北走向而更改为东西走向，楔形分水石面向南方。广济桥移址复修后，1984年5月2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核定并

公布广济桥为北京市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同年9月，在东桥头树立广济桥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

笔者探访广济桥时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2024年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时，桥南侧有一块标注为“广济桥地伏刻字砖石”登记在文物清单里，其上凿刻着“林县”两个稍大的字和漫漶不清的两个小字疑似名字。笔者认为，这是在广济桥移址复建过程中，某施工人员凿刻的，现在竟然被文保部门作为刻字地袱石记录成为了文物，可算是最牛的一个“到此一游”。笔者判断，这应该是对广济桥进行文物登记的工作人员不清楚河南林县施工队来施工的这段历史，以至于闹此乌龙。

现在，广济桥上的明代望柱、桥栏板、桥面宽大的石板以及四角的抱鼓石，虽然偶有破损之处，但整体保存状况良好，成为北京现存明代石拱桥中建造年代较早、保存较好的一座，相信广济桥不仅是见证清河地区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实物载体，也是研究我国古代石拱桥构筑及砌筑工艺不可多得的好样本。

熊希龄与梅兰芳情谊之交和爱国 济世之心

——赏析熊希龄《瑞鹤仙·寿梅畹华三十生日》

常乃麟

民国时，著名人士熊希龄曾在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三十岁生日时赠其贺词，全文如下：

瑞鹤仙·寿梅畹华三十生日

玉笙音几啜？记云路翩翩，十三银雁。步虚下霄汉。又宣传供奉，东华尘换。年时曾见，佛桑归，青童都羨。算麻源，小掷丹砂，未觉人间春晚。

一片。西山石在，遥忆当年，翠华游宴。摩崖亲篆。萼绿华，立天半，想雨花香里，卷帘人瘦，天女前身未变。只老夫，胜隐结邻，再添吟卷。

再叠前韵

菊花风信转。正节过重阳，数声秋雁。寿光照云汉。是现身尘劫，机缘随换。众生皆见，更无边，天魔惊羨。怅人间，歌舞湖山，一线斜阳垂晚。

千片。莲花步步，萱草重重，彩衣曾宴。梦回沙篆。数甲子，又刚半。只杜陵老矣，莫谈天宝，沧海桑田都变。记鸿泥，自写流年，画图诗卷。

《瑞鹤仙·寿梅畹华三十生日》释文：

歌喉如玉笙婉转，绕梁几旋？“天女散花”云路悠悠，舞姿翩跹，仿佛随古筝十三弦，化作凌空银雁。宛若仙人步虚而下凡间。你又承续“内廷供奉”之誉，历经京城朝代更换。往日曾见你东渡归来，连慈幼院的孩童都倾慕叹羨。料想麻姑在麻源轻掷丹砂，你以艺术济世，不觉人间春色已晚。

一片，西山御笔刻石仍在，遥想当年帝王游宴盛景。你亦在石壁上亲手题写“梅”字，镌刻留名。宛如萼绿华仙子，伫立半空。想那雨香馆帘栊间，清瘦的卷帘人，天女前身未改本性真容。



图1：香山雨香馆现为冯用威（应为冯幼伟）租建别墅（《香山风景》）（作者供图）

唯有我这老者，有幸与你结邻幽居，与你酬唱，再寄诗情。

《再叠前韵》释文

菊花开放风信已转。恰逢重阳过后，几声南飞秋雁。寿星之光映照霄汉。你为度尘劫而现身人间，机缘随世事变幻。众生皆得见你高超艺术，更令无边天魔惊羨。可叹人间，歌舞升平不知河山已变，唯剩一线斜阳垂暮天边。

千片，莲花步步，步步舞姿轻盈，萱草重重，重重孝爱之情，难忘义演后彩衣游宴之景。犹记沙石篆纹梦境。数你年华，三十正当半生。只我如杜甫年迈，莫提开元天宝旧宗，沧海桑田皆已变迁朦胧。但记雪泥鸿爪，自写流年遗踪，凝于画图诗卷之中。

梅兰芳（1894 - 1961），名澜，又名鹤鸣，字畹华，别署缀玉轩主人，艺名兰芳，熊希龄好友。熊希龄亦是民国时的知名人士。熊希龄与梅兰芳虽然相差25岁，但在戏曲、绘画等艺术方面有共同情趣与爱好，并与国内外艺术家有联络

交往。

梅兰芳在吉祥园初次演《思凡》时，张季直（张謇）、熊秉三（熊希龄）、梁任公（梁启超）并坐台前第一排，时人谓第一流阁员同时出席云。^①1935年2月18日，上海市长吴铁成召集各界为梅兰芳赴苏联演出举行茶话会，叶恭绰、褚民颐、顾维钧、熊希龄、杜月笙、张啸林、王晓籁、虞洽卿、许世英、陈光甫、谭泽闿、阮玲玉、郎静山、王人美、林语堂、欧阳予倩等三百余人参加。^②

熊希龄赠梅兰芳《瑞鹤仙·寿梅畹华三十生日》贺词收录于熊希龄女儿熊芷编辑的《双清集》（1929年自刊本）。据张缪子：《梅兰芳三十生日闻见录》载：“民国十二年十一月（农历九月二十四日）为梅氏三旬览揆之日，缀玉轩内，贺客如云……”，熊希龄词作有“正节过重阳，数声秋雁”词句，由此推断熊希龄的写作时间大致在1923年10月18日至11月2日之间。这首《瑞鹤仙·寿梅畹华三十生日》贺词，融合

① 罗惇融遗编、李宣侗校补、樊增祥批注：《鞠部从谈校补》，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② 吴洪亮：《中国书画鉴藏研究叶恭绰研究第2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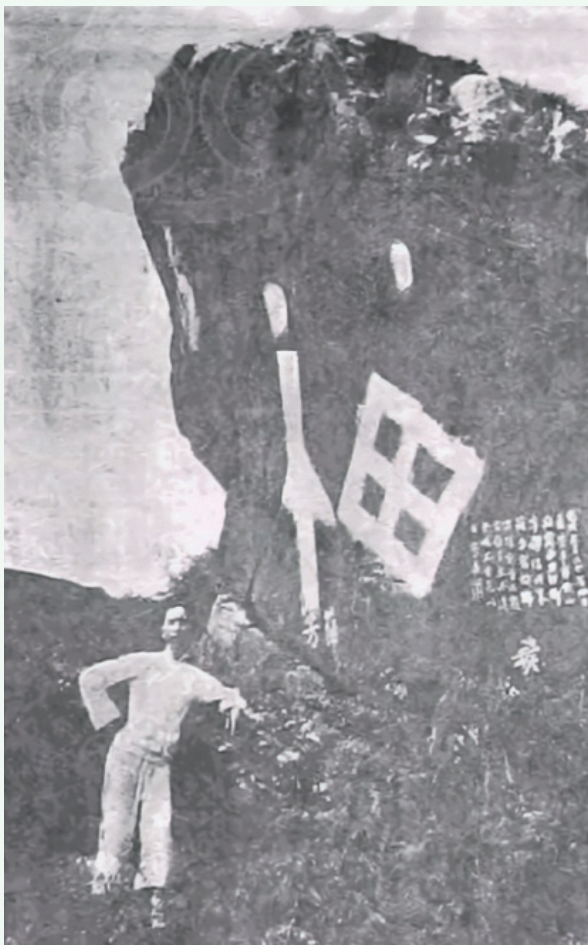


图2：冯启鏐：《北京香山静宜园新刻梅石：北京诸名士为梅兰芳刻（照片）》，《礼拜六》1922第185期（作者供图）

对梅兰芳艺术人生的赞美、二人交往的情谊以及时代变迁的感慨。拜读赏析此作，可以体悟出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情谊之交和他们的爱国济世之心。^①但觉立意高远、情义交融，感佩之情油然而生。

1918年京畿附近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初步完成后，逊清内务府允许熊希龄在香山静宜园内办学收养灾童。熊希龄在松坞云庄遗址修建双清



图3：2021年4月摄香山梅石（作者供图）

别墅，接着紧锣密鼓筹备创办香山慈幼院各项事宜。1919年底第一期校舍工程竣工，1920年10月香山慈幼院成立，收录灾童700余人。

1918年10月成立的香山静宜园董事会“专管园内租地和一切自治事宜”，允许官僚富商在香山静宜园内修建别墅，“租地息金用于资助静宜女校办学和修治马路，培养树木，设立园警的用途”。

静宜园二十八景之一的雨香馆遗址，曾被银行家冯耿伟（冯耿光，字幼伟）租下，建为中国传统风格别墅。1919年梅兰芳第一次出访日本，

^① 笔者最初认为此作是熊希龄赠内侄女朱畹的生日贺词。经与高士元老师交流，确认此为赠梅兰芳的贺词。

演出大获成功。他酷爱香山，每每度假郊游，总是应挚友冯幼伟的邀请，下榻在雨香馆别墅。雨香馆别墅在双清别墅西侧不远，这样熊希龄与梅兰芳就成为邻居。梅绍在《我的父亲梅兰芳》中也提到：“夏季歇暑不演出时，梅兰芳和福芝芳同友人常到香山避暑小住，编排新戏，绘画、读书，他们很喜欢香山这个地方。在香山小住时，梅兰芳常同齐如山、李释戡等友人踏青、逛山……”^①。

1930年《北洋画报》（总第431期）发表武越藏撰文：“壬戌三月念四日，名伶梅兰芳偕友游于北平香山静宜园，攀临高处，发现童石（园内有石处乾隆题刻诗字殆遍），因用扫帚蘸石灰，书大梅字其上，倩匠刻之……”。现在游客浏览香山公园美景，登临“梅石”前还可以看到清晰的“梅”字右下镌：“壬戌（1922年）三月二十有四日，萧紫亭、齐如山、梅兰芳、王幼卿、李释堪同来，兰芳写梅，释堪题记。香山游者虽多，未必遂登此石，亦足以自豪矣。”刻字为齐如山监刻。巨大的“梅”字清秀、俊逸，潇洒苍劲，“不篆不隶，大逾六尺，见者无不叹赏”（英敛之语）。不仅为香山增添一处胜境，同时也为研究梅兰芳提供一件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不久，此事“为熊秉老（熊希龄）所觉”，熊希龄院长找到梅兰芳，戏言“以其任意损坏公物，罚捐慈善费数百金”。请他为香山慈幼院筹募基金义演一场戏。梅兰芳爽快答应，择日便在香山寺遗址修建的甘露旅馆前临时搭起的舞台演出一场《宇宙锋》，也有记载是在香山慈幼院风雨操场演出的。演出那天，许多达官贵人都来捧场，真是宾客满堂。锣鼓声中，梅兰芳表演拿



杂志封面（作者供图）

手好戏《宇宙锋》，博得台下阵阵喝彩。这次义演所得善款全部捐献给香山慈幼院，从此成为一段佳话，广为流传。

1927年11月，东京美术学校校长正木直彦、同校图书馆主任北浦大介、东京帝室博物馆美术课课长沟口禎二郎、诗人田边华同来中国……据《文字同盟》（1927年第9期）载：“正木一行于十一月七日到达北京，下榻北池子大仓别墅，与前月来京之画家渡边晨亩，均承中国各界之欢迎……就中金拱北门弟子组织之湖社同人招邀一行及京中名流于钱粮胡同金宅，颇极盛会；又东方绘画协会北京本部开茶话会于传心殿，备示欢

^① 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

迎之意，会者百数十名，亦复一时之盛也。前总理熊秉三（希龄）招宴于香山别墅，名优梅兰芳亦备茶点，招待一行……”^①。

1929年底，梅兰芳应邀赴美国。1930年初在美演出并受到美国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与高度评价。美国波莫纳学院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均授予梅兰芳以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此行结识不少美国知名的艺术家，如D·贝拉斯科、斯达克·扬、卓别麟、费尔班克斯（汉名范朋克，亦称飞来伯）、保罗·罗伯逊、R·圣丹尼斯、T·肖恩等。^②1931年2月，飞来伯访问中国，熊希龄与梅兰芳一同欢迎接待这位美国电影明星。“美国影星飞来伯抵（北）平时，梅兰芳剧团迎之于北宁车站”^③，“五日晚梅兰芳宅茶会招待飞来伯之盛况”^④。更有图文报道熊希龄宅中欢迎美国电影明星飞来伯茶会盛况，曰：“飞氏五日，赴熊希龄代表联华之宴。席间熊氏有极长之演说”。

1935年，熊希龄夫人朱其慧逝世后第四年，熊希龄在上海迎娶他的新夫人毛彦文，“结褵于慕尔堂，嘉宾莅止如黄郛、吴铁城、李石曾、覃振、贺耀祖、梅兰芳等，达五百余人，多海内闻达……”^⑤。1935年2月9日《申报》也记载，梅兰芳参加熊希龄与毛彦文的隆重婚礼，在签名册上提笔并敬送贺喜花篮。

熊希龄和梅兰芳一个是归而不隐的政治家、

慈善家，一个是继承创新的梨园翘楚、艺术大师，虽然身份地位不同，但他们艺术追求上情趣相投，且在坚守民族大义上有着共同的风骨和信念。梅兰芳在抗日战争期间通过蓄须明志拒绝为日伪演出、创作爱国剧目鼓舞民众、毁画抗议侵略者等行动，展现坚定的民族气节。熊希龄则在九一八事变后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救亡阵线之中，“全家总动员，全院总动员，以期全国总动员”，并身先士卒，冒着战火硝烟，慰劳将士，鼓舞士气，抢救伤员，安抚百姓。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事变，1933年的长城抗战，1937年的淞沪会战，都留下熊希龄坚毅而疲惫的身影。熊希龄目睹国破家亡，悲痛万分，1937年12月25日不幸病逝于香港……数十年后梅兰芳被誉为“人民艺术家”，1962年8月8日逝世于北京。二位逝世后都极尽哀荣。

《瑞鹤仙·寿梅畹华三十生日》等两首词超越一般酬唱之作，成为记录民国精英交往、慈善与艺术互动、传统文人与表演艺术家关系转型的珍贵文本。熊希龄以政治家之眼光、诗人之灵感、知音之情愫，为梅兰芳绘就一幅融艺术之魂、君子之德、家国之情于一体的精神画像。这份情谊之交，实是近代中国转型期，精英阶层通过文化纽带维系价值认同的缩影，至今仍闪耀着人格与艺格双峰并峙的光华。正如秦燕春博士在评论熊希龄诗作时感叹：“一位老派绅士特有的价值关怀”！

① 参见《香山双清别墅中日名人雅集（日本正木直彦、沟口顽次郎、田边碧堂、北浦大介、渡边晨亩诸君来游，熊秉三先生开宴欢迎摄此）》，《艺林旬刊》1928年第1期（创刊号，中国画研究会主办）。

② 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组织编著：《中国京剧史中下》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大亚画报》1931年第281期。

④ 《图画周刊》1931年。

⑤ 《东南日报》1935年2月10日。

门头村轶事

张嘉鼎 铁木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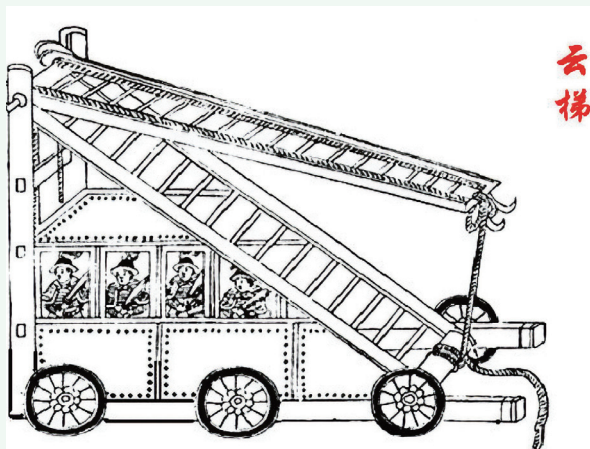
飞虎云梯健锐营的变迁

在北京香山南路有一组清代建筑群落，如今尚存团城阅武楼、云梯楼、记功碑亭等古建，可惜跑马黄城于二十世纪50年代拆除，建为公社的养猪场，已不存。这组建筑是清代外三营之一的八旗健锐营的守卫演武场，每年二、八月在此操练的炮兵、骑兵、步兵和水军。健锐营是乾隆朝建立“十大武功”的劲旅。在训练的项目中，数“跑马观山门”最为雄范。在如今颐和园南门广场集合，八旗兵的骑兵，从大道排开，往西经过西苑、玉泉山、粥棚路、门头村、栅栏门、塔门、绕塔门内“站房”一圈儿，领“号牌”后，再沿原路返回到颐和园南门广场，交号牌为凭证，记录时间和名次，为考核晋升的凭证，每天如此。夏天天气变化无常，有时看不到法海寺的山门，只能望山上的“小白塔”为目标，以免跑错路和跑偏迷路。所以叫“跑马观山门”。有多远呢？来回二十里，为何在塔门内站房堆子上发号牌？是为防止投机取巧，从半路跑回，没号牌不算数。考核是很严格的，谁跑最末也很难堪，因为八旗都统和各旗副都统、佐领都在现场监督



法海寺塔门（作者供图）

操练，好的表扬，差的被本旗佐领训斥，激励八旗子弟上进。这是平日的训练。每年二、八月会操，由皇上和王公大臣，在阅武楼（团城）上观



攻碉云梯（作者供图）

演，炮兵与三军在跑马城前广场操演，水军在颐和园昆明湖内操演。在乾隆朝最雄浑的操演，就是“云梯攻碉”表演。是香山周围山上的“七死八活石碉”吗？死碉不能上人，活碉可以上人。每旗七个死碉一个活碉，共六十四个碉楼。不是，这是后来震慑吐蕃盖的，真正操练的石碉叫“云梯楼”，在阅武楼西侧马路东边。乾隆初次平定金川时，久攻不克，“师老无功”，杀了武将张广泗，抗辩不服，朝野震动。乾隆想到老祖宗在东北攻城用云梯取胜，可是在大小金川不成，敌酋石碉，高耸入云，居高临下，滚木礮石，易守难攻。一般的云梯，被巨石砸下全部断裂，比攻城困难百倍，为此，皇帝从京城各旗抽调三千健勇，齐集西山脚下，操练新式云梯攻碉战术，新式云梯如同战车，下有车轮，几十力士轮番推着云梯飞奔，云梯前端有立杆托举，在云梯运动中，会武功的飞虎手（小个子），身轻如燕，在云梯上奔跑，当云梯前端接近石碉时，飞虎手挥刀飞上碉楼杀敌，后续飞虎手飞上石碉，同时炮兵攻击围子，四面攻击的官军断水、断粮和用火攻击敌巢，首战告捷，皇帝大悦，赐封号为“飞虎云梯健锐营”，犒赏三军。大小金川三百多



云梯楼（梯子楼）（作者供图）

寨，石碉无数。清军重金收买敌酋带路，重赏来投诚的番兵，瓦解敌寨士气，逼迫逃离的山贼归诚，最后攻克玛尔古大营。敌酋献军门投降，大战告捷。清军押解敌酋首级百余户回京，皇帝在瀛台亲审，将萨罗奔泉首示众，将其余番酋押解西山法海寺南沟，建“孤柁燕檩单椽子”的营房囚驻，设白碉楼、黑碉楼两个由归诚番首居守，建八旗健锐营永久营房驻扎看管。这个部落因地处阴坡，营房简陋，“不立小口”（生孩子易夭折），“二百年后灭绝”。后来出了“阿凤姑娘”伺候皇帝，得皇帝开恩，命番寨“起死回生”，在法海寺阳坡建营房，“与正黄旗营房同”，更名为“正黄旗小营”，延续近三百年。并重修法海寺，由章嘉国师驻寺弘法，每年小营人要上演铜鼓舞、狮子舞（阿尔萨兰）、大郭庄等，与庆隆舞一起为皇帝和太后贺寿。当地有古藏语（嘉绒）歌曲“念昨”流传下来世代相传。到解放时，小营还有“百（白）伯龙达虎（胡），阿哈萨穆伊，张郎强（杨）”十三姓百余人居住寨子里。著名的曲艺家荣剑尘就是小营人士，穆子玉就是著名藏医，杨春海是大队长，萨继承是大队书记。1965年拆迁，小营人搬进门头村。如今的

门头村社区是个汉满蒙回藏等多民族的村落，分为南北东三片，都住进了楼房，用上天然气取暖和做饭，他们的后代子女都能得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九十多岁的老人处处可见，大家过上了自由平等快乐祥和的幸福生活。

轱辘锅媳妇

轱辘锅媳妇，从夫应该姓赵，旗下出身，大高个，大脸盘，两只大脚，梳着高髻儿，挺着腰板，嘴角有个黄豆大的黑瘡子，更显得嘴大声厚，加上喘气粗，更显说话急促和爽快。她嫁给轱辘锅的老赵，在家里是老赵的大帮手，不管是宰猪用的大锅，还是寺庙里煮粥的大锅，在老赵和他媳妇的手里都不是个事儿。不管是裂缝还是破洞，只要锅体尚完整，都会轱辘一新，最后打磨上一层青灰，如同新锅。

老赵媳妇，身大力不亏，大手大脚，轱辘起铁锅来，颇有兴味儿。她打下手很到位，砸生铁片、拉风炉化铁水、用铜子夹上厚薄大小的生铁片于破洞处，将融化了的红彤彤的铁水，配合老赵，用油垫堵牢锅底，老赵用坩埚舀一勺铁水，从里面补在破洞的四周，将生铁片与铁锅四周粘合融为一体，眼见铁水由通红熔铸于破洞四周，逐渐变成黑蓝色、亮白色，最后敲打，没有沙眼，结合紧密，补锅成功。然后，将四周凸起的部分用砂轮、刮刀、砂纸打磨平整，用砂纸整体打磨一新，用干布擦干净，用青灰水里外刷一遍，晾干，用水洗净，一个新锅出现在面前，比铸造一面新锅要省很大的功夫，而且便宜，不比新锅质量差。

老赵说：“锅最难补的是脐的部位，留有原来的锅脐还好，如果没有了，必须找一个与此锅相当厚度的锅脐，小锅脐不够厚重不行，所以，平日收集破铁锅的任务也由他媳妇来完成。老

赵媳妇走街串巷、串门聊天，发现有不要的破铁锅，就收集起来，所以老赵媳妇很会说话，虽然没有多高文化，但是说起话来，满口的八旗京语，让人听着亲切客气，招人喜欢，还透着爽快和幽默。特别是谁家有红白喜事时，更显出她语言的魅力，例如有一家的男主人往生了，她“适时”去哭哭，送送亡灵，不差礼，但不是在人家忙丧事之时添乱，而是刚刚发引后清净时，她来了，进院前就哭声大作：“哎吆我的哥哥吔，你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前几天我还见到哥哥您好好地呢，您甩手就走了，留下妹妹我再也见不到您，听不到您说话味，我的亲哥哥吔……”。主人家将其劝进屋里，坐下。她止住哭声，还在抽抽噎噎，过一会问：“都安排妥啦？还需要我出力的事没有？我哥哥走了，咱们还得好好过不是！您走您的，咱们过咱们的，别让我哥哥惦记着，他到那边忙他的去，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别松劲儿，当我哥哥出差出远门儿了，咱们过咱们的，需要钱，多了没有，百八十、千八百的您说话儿，我哥哥在时没少帮助妹妹们，这咱不会忘，帮不了亲哥哥大忙，小小不言的事儿，决不惜力……”。

要说“话暖人心”，还真是这样。一个村子，张王李赵，乡里乡亲的，让人觉着亲兄弟一样，真是不容易。这媳妇不是光会说宽心话儿，真是懂得人情世故，说话有分寸，句句打动人心，这是真本事。

据说外地有一种“哭丧”经理人，不管多大的丧事，都会哭的人闻声落泪、明码标价，真哭的水平高过演员的演技，价有所值。但是与轱辘锅媳妇相比，他们缺少亲近和感情。她用的是八旗京语，感人劝人，又尊重仙逝的“亲哥哥”，又宽解人心。一个操持轱辘锅的老妇人，有金子

含量，没有低俗，也不奉承，真实可信、乃是真善所感所为，令人难忘。

老舍与《正红旗下》

人艺将老舍先生的小说《正红旗下》搬上了舞台。有不少文章介绍，我也来凑个热闹。理由简单，就是老舍先生1964年秋，到我家访问我的父亲张永海时，谈到了他的创作计划，其中就有那“八部曲”之一的《正红旗下》，当时已经动笔“写了几万字”。因改稿《西望长安》而暂停，来“旗下搜集资料……”。

一、老舍与门头村诗歌



老舍先生（作者提供）

1964年秋天，正是“四清运动”高潮兴起的时候，老舍因患高血压，请假来香山养病，暂住香山门头村街里军队正红旗建设指挥部院内西屋。这里是过去的地主庄园，院子很大也安全。先生吃住在部队，由炮司王主任和高上尉（文化干事）陪同走访。

1964年10月22日，老舍先生与王主任、高上尉来我家拜访我的父亲张永海。

老舍第二天向郭沫若部长写信汇报在这里的工作和当地的风貌，并且写诗给郭老：

门头村里好为家，文艺源泉岂浪夸。

金玉红楼终是梦，镰锄碧野遍开花。

东流巨浪今潮北，霜降香山叶染霞。

瓜果齐歌丰产日，高天一弹吐光华^①。

1964年10月23日”

二、老舍谈《正红旗下》书名

我父亲见贵客登门，赶快沏茶招待，并且到自己的葡萄试验园，剪下两嘟噜纸袋包裹的葡萄，洗净放在果盘里，请老舍和客人品尝。老舍说：“我有高血压，不能吃凉的。”父亲说：“吃葡萄没影响，我也是高血压，造成两耳重听。”于是老舍先生先尝了“红鸡心”，又尝了“玛瑙红”的葡萄，惊喜的说：“真好吃，真好看，真好真好！”随后说：“今天来认认门儿，以后我会常来拜访，我现在就住在门头村街里。”当谈到创作计划时说，他说打算写个“八部曲”，这第一部《正红旗下》已经写了几万字，大约每部12万字。八个旗，每旗写一个故事，独立成章又有连贯性。正在收集资料，然后到密云檀营和东北走走。

说到书名，两位老人哈哈大笑，说：不是光给旗下人看，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看明白也是很费功夫的事。就拿“旗下”两个字来说，口语念“器恰”，可能应该是老字“奎”字，“正红旗下”，应该说“整红器奎”。“整黄器奎”“整蓝器奎”“整白器奎”。“镶红器奎”“镶黄器奎”“镶蓝器奎”“镶白器奎”，就是八旗旗下的那些人和事儿……

时间过得很快，老舍先生问起：“您发表的《曹雪芹在香山的传说》原稿还在吗？”我父亲说：“还在报社没退回来，这里有那天的《北京日报》。”（1963年3月18日《北京日报》文

^① 父老传言，曹雪芹曾在附近法海寺出家为僧。

化生活栏)。先生遂带走参考，这时已经到午饭时间。

三、郭沫若的“和诗”

郭沫若先生接到老舍的信，遂给他回信，并且写了一首步其韵的和诗：

门头村里社员家，四季青青岂浪夸。
争取青边三点水，赢得锦上又添花。
欢腾西域冲天弹，红遍香山映日霞。
反帝防修站前哨，万邦翘首望中华。

虽然历史的车轮向前，留下许多伟迹，也将许多遗憾掩埋，老舍的“八部曲”只留下这部《正红旗下》几万字，没有写完的第一部曲。老人那时65岁，正是出佳作的最好时期，可惜，文化大革命断送了许多人的生命，老舍先生也人沉新外太平湖。如果再多给老人几年时间，那震撼世界的《八部曲》将永垂文坛宝库。如果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是遗憾的文学，还有那样多的续集涌现，老舍先生的《八部曲》，有谁能给续齐呢？这也许是老舍留给人间的又一个“选题”。太难了，连正确的书名都没有人念对，何况生活啊！如果两个旗人见面说话：“他大大（汉语大妈），您这是干嘛去呀？”“我上整红器他二爹（二叔）家看看他二妈（二婶）病啦。您纳？”“我去街里麻记端点羊肉汤晚上吃酸菜余儿面。”如果说“我上正红旗下他二爹家看他二妈病啦。”拿腔拿调，还不让人笑掉大牙？

四、老舍为何走向太平湖？

老舍为人正直，很讲义气，又勇于负责。文化革命兴起后，他所在的单位无论是文联，还是作协，文化口是重点。许多革命老作家受到革命小将的批判。典型的做法就是“撅着”，后来演变到挂“黑牌子”“坐喷气式”。要说这些老作家，哪个不好面子？况且“士可杀，不可辱”，

特别是满族人，面子比生命重要。“人有脸，树有皮”，特别是文人，活的就是尊严。当初，并没有触及老舍先生，毕竟他的《龙须沟》《骆驼祥子》深入人心。可是当运动深入之际，老舍上台给他的部下老作家解释，红卫兵认为老舍这是“自己跳出来”了，要他“陪斗”，还给他挂一块带木框的石板黑板。本来就很重了，还用拴烟囱的细铁丝挂在脖子上，如同刀割，老舍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屈辱，从脖子上摘下来丢到批判台下。正巧有个小女孩突然跑出，被石板碰破额头，这下激怒了下面的不明真相的人，上来就对老舍拳打脚踢，当时的机关干部和同事保护老舍匆匆离开。受伤的小女孩被送往医院治疗。

当时，体院的学生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总部设在先农坛体育馆，凡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或是“牛鬼蛇神”，都会送到这里来“接受再教育”。拳击和散打的运动员轮番“教育”这些“陪练”。几个回合就结果了。从后门拉到火葬场，身上没有任何伤痕，全是致命内伤。当时一提送“先农坛”，没有不害怕的。老舍回到家不说话，也没吃饭，早早就睡了。睡前“造反派”送来“勒令”，要他第二天一早到文联“接受批判教育”，有好心人告诉他：“您连夜逃跑吧，听他们说要把您送先农坛呢！”

老舍其实没有跑，也无处逃。他一夜没睡，又怕给家庭带来灾难。于是他夜里悄悄出门，什么也没带，只带上《毛泽东诗词》。受批判的人都是要向毛主席请罪的，都带毛主席的著作。看来是老舍还是做好了去文联接受批判的准备。夜里没车，他信步来到新街口外，那时由于修“地铁”，这里成了堆积的土山，东北面成了一个湖泊，再北就是“北太平庄”，所以这里叫“太平湖”。老舍坐在土坡上，不知待了多久。当东方

发白的时候，有遛早的老人看到一个老头坐在土坡上看书。老舍没有去文联，也不愿临死还要让肌体遭受痛苦。他朝着东方向太平湖里走去，在那里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当人们报警有人淹死在太平湖里，派出所警察捞起他来时，经过多方辨认，才知道这老头就是“老舍”！此时，1966年8月24日，他的单位和家属正四处寻找他呢……

老舍就这样走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后来平反安葬的骨灰盒里是老舍的眼镜和他常用的钢笔，没有骨灰。那个年代，两位老同志在太平湖畔写下“老舍辞世处”的石碑，一个年青人拓

下了上面的文字，成了唯一的历史纪念物。



“老舍先生辞世处”石碑（作者供图）

“获益匪浅”中的“匪”是什么意思

本刊编辑部

“匪”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强盗”。例如下列词语中的“匪”都是“强盗”的意思：

盗匪 土匪 剿匪 匪徒

“匪”还有一个意思是“非”，也就是“不”“不是”的意思。“匪”表这一意思时，有明显的书面语色彩。例如：

(1) 读了这本书，我获益匪浅。

(2) 他们的这些做法实在匪夷所思。

(3) 他整天思考研究问题，夙夜匪懈。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匪”表“不”一类意思时，一般存在于熟语之中，在使用时不宜随意扩大使用范围。

有时人们写“获益非浅”后，常被别人否定，被指为“硬伤”。认为必须写成“获益匪浅”才算正确。这种做法不妥。“非”有“不”的意思，例如“非同小可”“非同寻常”中的“非”都是“不”的意思。“非浅”可以理解为“不浅”。因此“获益非浅”也是说得通的。

摘自杜永道《缺失的语文课》

海淀上庄地区曾有过的古桥

张起林



在南沙河永福桥旧址不远处修建的南沙河桥（作者供图）

海淀上庄地区地处京西北。南沙河、北沙河从上庄地区两翼穿流而过，著名的京西北古道横贯上庄地区的南北。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上庄地区不仅古桥众多，而且每座桥的建立、演变的过程，都有着历史的故事和传奇的色彩。

一、榆河桥

古代，上庄地区有一条横贯南北的京西北古道。历史上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一般采取设置两都或几个都城的城市制度。特别是元朝皇帝在北京建立大都后，每年春天都要由大都前往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度夏，秋天时再由上都回到大都过冬，由此大都与上都之间的道路建设必然得到加强。大都与上都之间的道路分东路和西路。其中西北路是主要道路。它由大都向西北，经清河、榆河（玉河）、皂甲屯、双塔、辛店、龙虎台，然后出居庸关，一路向西，经榆林、怀来、土木、宣德府（宣化县），出张家口、张北县，然后至上都。西北路经过的南沙河（榆河）和北沙河（双塔河）各修建一座桥，即榆河桥（玉河桥）和双塔桥。元代自忽必烈建立大都起，至少有9位皇帝走过这条大道，路过这两座桥。特别是忽必烈执政时间最长，每年都要往来于这条古道。元朝灭亡后，永乐八年（1410）明成祖朱棣为巩固边防，保卫京师，亲率50万



双塔大桥碑亭（作者供图）

大军第一次御驾亲征，于德胜门誓师出发，经榆河（玉河）、双塔、居庸关、怀来等地，北征鞑靼，辗转千里，征伐数月，胜利班师回朝。此后又四次北征蒙古，均走的是这条古道。

榆河桥（玉河桥）建于元代。《昌平山水记》载“西山有泉，东流为南沙河”。其上源支流有五，河境内长十六千米，元代称榆河。在南玉河村域的南沙（榆）河上，元明时建有木制榆河桥。明初，由北京到关沟、宣化、张家口一线是防范北元骚扰京师的重要防线。洪武二十七年（1394），隆庆卫设立榆河驿、居庸驿、榆林驿、土木驿。并在榆河驿设立军屯，派兵屯田耕种，保证驻守在榆河

驿人员的粮食供应。榆河驿成为京北的市井繁荣之处。明正统十四年（1449）在这里建成一座石板桥，长二十六米、宽六米、高三米，七孔，称永通桥。后损毁，改木桥。据《康熙昌平州志》记载：“永通桥在州西南跨榆河桥，今虽存，而水不由故道”。

清康熙年间的重臣纳兰明珠，在榆河北数里处的皂甲屯建有庄园和家族墓地。他出资将永通桥的木桥改建为石桥，使之坚固耐用，并把永通桥改名为永福桥。该桥为条石砌筑而成，缝间注有白灰浆，条石纵横连锁，接缝处有用铁铅铸就的桥锭，结构严谨而坚固。桥身下是花岗岩五个方孔。桥身长 22 米、宽 5.75

米，桥墩南面有迎水角。桥面两侧有高 45 厘米的素面石护栏。两岸桥头砌有石驳岸。整座桥看上去纹饰雕刻古朴、简洁。康熙十二年（1673）《昌平州志》载“永福桥，在州西南三十五里榆河北”。《光绪顺天府志》载“永福桥，城西南三十五里，榆河村北”。《光绪昌平州志》载“永福桥，《旧志》在州西南三十五里榆河村北”。1990 年 10 月 20 日，海淀区政府对南沙河进行治理，因河床逐年淤高，使永福桥面比河床仅高 2.5 米，妨碍水流，遂于 1991 年拆除永福桥。为方便通行，在该桥下游 200 米的河道弯处，新建一座长 100 米、宽 6 米的钢筋混凝土大桥。

二、双塔桥

双塔村临近北沙河（亦称双塔河）南岸，是元帝每年来往上都必经之路。元帝一行由此渡过双塔河向北行 30 里即可达龙虎台行宫驻蹕。为保证这条“国道”的畅通，便于人员的往来，元代，在双塔村北的北沙河上建有一座名为“红桥”的桥。明正统十四年（1436），朝廷将该桥翻修，取名为永宁桥。《康熙昌平州志》记载：“永宁桥在州治西南十八里，跨双塔河上，今废”。“今废”的主要原因在于



在马房桥旧址附近新修建的上庄水库大桥（作者供图）

明初在昌平天寿山开始建皇陵后，这条古道逐步东移至清河、沙河、昌平一线。特别是明正統年間，先后在南沙河修建了安济桥，北沙河修建了朝宗桥。永宁桥逐渐废弃。清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桥为石墩木板桥。1993年，改建水泥多孔大桥，名为双塔桥。

双塔桥的战略意义十分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元致和元年（1328），元武宗次子图贴睦尔在大都即位，改元天历，是为元文宗。但同时，在上都的中书左丞相倒剌沙与梁王王禅、辽王脱脱等宗室、右丞相塔失帖木儿等大臣结成拥护泰定帝太子的一派，出兵讨伐大都，于是发生

历史上著名的两都之战。上都兵由梁王王禅、诸王失刺、也先帖木儿等分别率领，进兵居庸关、古北口和迁民镇（今山海关），湘宁王八剌失里、诸王忽刺台等率另一路军绕道山西进兵紫荆口，对大都形成两面夹击的进攻态势。九月初，大都拥立元文宗的丞相燕帖木儿亲率主力击退逼近榆林堡（居庸关外）的王禅军。不久，因上都诸王也先帖木儿所率的辽东军突破迁民镇关口西进，燕帖木儿率军又前往蓟州堵截，九月十六日率军到达三河县，得报王禅军已破居庸关，于是留下一部分士兵守蓟州，自己率主力迅速回师昌平县。二十日，在皇后店村与上都军遭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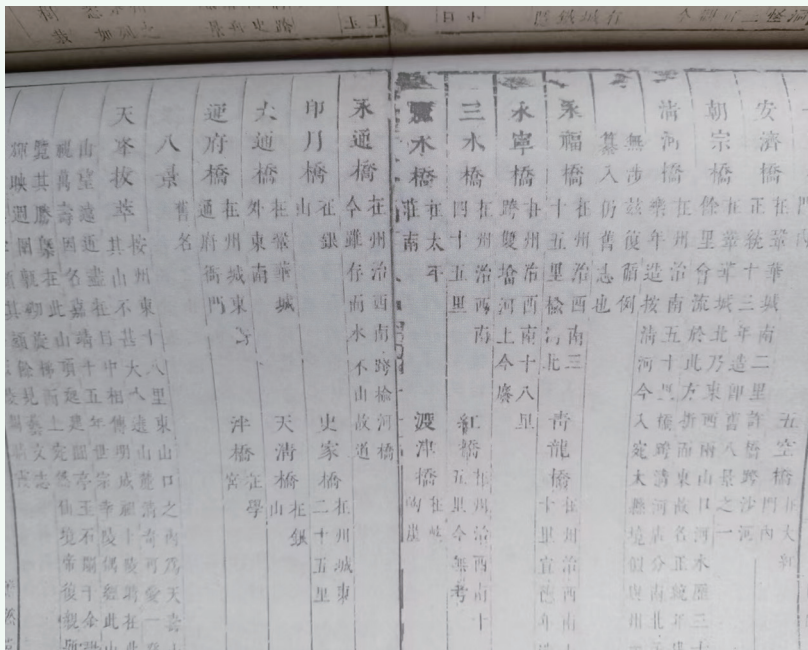
两军激战，上都军不敌，沿古道退却，燕帖木儿率军追到双塔村，两军隔双塔河上的红桥对峙。午夜，燕帖木儿命士兵乘夜鼓噪，钲鼓号角齐鸣，惊扰敌营。五天中与王禅军在双塔村北至白浮村一带进行了两次交战。二十五日，燕帖木儿发起进攻，杀敌数千，降者万余，王禅军败，逃入昌平县北山中。燕帖木儿遂率军收复居庸关，稳定了元廷内部统治。元文宗为表彰燕帖木儿的功劳，在双塔桥北，为燕帖木儿建生祠并立纪功碑。《析津志辑佚》桥梁目中写道：“双塔，即江桥，立燕帖木儿碑处”。

三、马坊桥

马坊桥，又名永通桥，原为

木桥，在上庄村南的南沙河上。桥北为明珠别墅（花园），其南门（即正门）外旧有大影壁一座，有路可达永通桥。桥北侧台地上有庵堂一处，有院两进，坐北朝南，一进院建有正殿五间，内供奉碧霞元君等七位娘娘，两侧各有配殿，面阔三楹，南侧为山门，面阔一间。西为跨院，有二层阁楼建筑一处，环以配房，为禅房院，两进院有月亮门相通。二十世纪70年代，部分遗址尚存。当地人称之为茶棚，庵堂在抗日战争时期毁于战乱。茶棚山门外左侧道旁，有古井一口，水质甘冽，为庵内用水处。井旁有小石桥，为明府花园至马坊桥必经之路。桥东南隅、南沙河北岸，有龙王庙，面阔一间，今已不存。康熙年间，木桥损坏严重，交通诸多不便，由明珠投资重建为石桥，并由明珠命名为永通桥。永通桥长度延长至40米，宽度由3米拓宽至4米，桥高3.5米。康熙十二年（1673）《昌平州志》载“永通桥，跨榆河桥”。《光绪顺天府志》载“永通桥，城西南跨榆河故道”。《光绪昌平州志》载“永通桥，《旧志》在州西榆河上，今水不由故道”。

永通桥在二十世纪70年代尚存残桥。1989年冬根治南沙



清《康熙昌平州志》记载（作者供图）

河时由于石桥低于河底，遂埋于地下。据当地老人讲，马坊桥为七孔石桥，石桥建造格局和形式与榆河桥同。

四、三水桥

上庄镇西辛力屯的村东是一亩泉之水，大浸、二浸之水以及来自上游八口村之水的汇合之处。这里有一座桥，俗称“三座桥”，实为三水桥。踏上桥东北可去双塔村，东可去白水洼村，南可去后章村，西南可去东贯市村，西北可去八口村、羊（阳）坊村，正西直走到西辛力屯。村民称这里是“六股道”。“六股道”被一亩泉水、八口村水和大浸、二浸水阻隔，早年村民利用木板架桥，简易通行。但

木桥易腐烂，一遇大水，往往被冲走。

康熙年间，明珠在上庄村北修建的家族墓地规模甚大，三面环水，其水源主要来自西辛力屯的一亩泉。为保证水源充足，明珠每年派人清理一亩泉至上庄墓地的河道，特别是出资修建三水石桥，解决了百姓出门通行的障碍。据《重修榆河乡东岳行宫碑记》载：“复念榆河马房皆为三刹及墓道通衢，而清河一亩泉诸水漂溢为患。向有木桥各一，日久就圯，行人病涉。复于两地各构石梁，以通行役。而沮洳卑湿之径，一归坦途”。康熙十二年（1673）《昌平州志》载：“三水桥在州治西南四十五

里。”该桥由六块阶条石铺就，长五米，宽四米，两孔平桥。这些条石在二十世纪70年代初还存在。70年代末，一亩泉干涸，八口村水湮废，大浸、二浸不旺，在平整土地时，用炸药爆破附近小东坡和大东坡，用此土填埋了三水石桥。

修建三水石桥的同时，明珠还出资整修大浸、二浸，以条石做基，修岸建岛，加盖凉亭，周围种莲。清初索额图也曾在太舟坞村北的别墅种莲。从地缘上看两地相距15千米，形成南北之势。索额图是康熙朝的“辅弼重臣”，明珠是康熙朝的宰辅，当时有“要做官，向索三；要讲情，问老明”的民谣。索、明二人皆为圣祖玄烨的左膀右臂。巧合的是，1984年夏、太舟坞村北和西辛力屯村东的两个水塘忽然荷花盛开，引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北京晚报》对此做过相关报道，并配以照片。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原来莲子是长寿的植物种子之一。虽距今百年以上，碰上适宜生长的温度莲子还是会生根开花。

五、常乐桥

南沙河上游主干源于寨口，次干源于黑龙潭。两汉在段家庄东汇合，成半弧形由南向北，折东注入上庄水库。常乐村位

于上庄水库西部的拐弯处，三面邻水。历史上的常乐村有数座桥。村东的石桥南北走向，长近2米、宽1米，一孔平桥，1960年拆除。村南的石桥东西走向，长3米、宽2米，一孔平桥，可过大车。村西南倒流河有石桥长1.5米、宽1米，由此桥可去苏家坨村。村北由西北至东南去沙涧村有座石桥长2米、宽1.5米。村西北小庙有石桥，南北走向，长10米、宽1.5米。

常乐村最大的也是最有名的桥是村北大桥，俗称小马坊桥。这座桥为花岗岩七孔石桥，长15米、宽3米。旧时是京西北地区去京城的主要道路之一。怀来、南口、阳坊一带山区的果子下来，多用骆驼队通过此桥运往北京城。该桥虽不出名，但却经历了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次日清晨6时，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身着便装，出神武门，坐上马车，在王公大臣、侍卫扈从千余人的簇拥下，经景山西街出地安门，8时出西直门，11时到颐和园。打过尖，出园，过青龙桥，走红山口、望儿山、西北旺、常乐村、前章村，19时抵

达西贯市村住宿，第二天继续西行，往西安方向走。这条路较隐蔽，也较近，慈禧一行通过这条路安全抵达西安。

另外，在常乐村北边三里处的八家村的西南角还有一座古石桥，当地称“小桥”。桥呈东西走向，河水为南北流。桥长8米、宽4米，桥下有两方孔。从此桥往东可达八家村，往西可到前沙涧村。从小桥的造型和风化程度来看，建造年代应在元代或明代，可惜1975年平整土地时亦被拆除。

主要参考资料：

1. 《康熙昌平州志》，[清]吴都梁修、潘问奇等纂，康熙十二年（1673）出版。
2. 《光绪昌平州志》，清缪荃孙、刘蕙源等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3. 《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志》，海淀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4. 《昌平县地名志》，昌平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5. 《北京西郊历史文化考》，徐征、冯黛虹著，开明出版社，2015年版。
6. 《古今辛店新今古》，本书编委会，2020年9月。

命案回眸

钱军熙

1985年7月的一天，海淀分局某派出所领导接到乡武装部副部长老韩的电话，聊了几句工作后，对方说：“你还记得我们村的崔二吗？他死了。”所领导曾当过该村户籍外勤民警，反问道：“怎么回事儿？”老韩回答说：“他在乡里石灰厂上班，身体棒着呢。前天突然死了，当天上午便被家里人拉到八宝山火葬场烧了。”“还有什么情况？”老韩说：“听说是酒精中毒死的，是村医务室开的死亡证明。”撂下电话，所领导反复思考着这件事，心里不禁起疑。

中午，管片户籍外勤民警小马回来了，所领导把崔二突然死亡的消息告诉他，要他下午去找村干部了解一下情况，先不要接触死者亲属。急匆匆地吃完午饭，他便带着徒弟小吴骑车去村里调查。

小马两人走后，所领导依旧忐忑不安，左思右想崔二死得太蹊跷，颇有疑点。思虑着如果真是他杀，尸体是关键证据，而尸体已被火化，就丧失了定性的基本条件和证据，死因将无从查起，一烧成灰万事销。万一尸体还在殡仪馆没烧掉，控制住尸体就是查清疑点的关键，应当采取果断措施。也考虑到如果不是刑事案件怎么办？踟蹰



1983年换装前的人民警察（林琳供图）

良久，所领导终于下定决心去八宝山殡仪馆看看尸体，查！如果有可疑处绝不放过。

所领导随即给老韩去电话，问他认识崔二吗？回答认识，便让他在乡里等候。放下电话，所领导撕下一张介绍信，开着派出所的警用三轮摩托车，到乡里找到老韩，简洁的说：“跟我走，去八宝山。”

两人到达八宝山殡仪馆时已经接近下午四时，业务室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名工作人员。两人表明身份，简要地说明来意，要求看看崔二的尸体。接待人问：“尸体是哪天运来的？”告知三天前。他随口说：“大热天的，早就烧了。”

听到这话，所领导的心一下凉透了：这事儿没法办了。又不甘心地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请求说：“您帮忙，再给查一下”。接待人十分认真地查阅登记本，所领导和老韩不错眼珠地盯着他查账。几分钟后，他抬起头来说：“查到了，还没烧”。所领导长舒了一口气，赶紧说：“您带我们去看看尸体”。

去停尸房的路上，两人问工作人员这具尸体为什么还没烧？他说：“火化炉正在大规模维修，只剩一台从日本进口的炉子能用。这几天，火化的活儿还挺多，得先紧着要骨灰的人家烧。这家死者亲属登记时说不要骨灰，所以就把这具尸体火化的事往后放了放。”所领导暗自庆幸：太巧了。

拉开标着崔二姓名的冷藏柜，所领导指着尸体问老韩：“这是不是崔二？”老韩肯定的回答：“没错，就是他。”所领导用手指轻轻地按了按死者青紫色的脸和口唇，感觉冰凉冰凉的。翻开死者眼皮仔细观察，看见死者眼结膜有针头状出血点，初步判断怀疑是机械性窒息死亡。让接待人关上冷藏柜，严肃地对他说：“这具尸体必须保留，没有公安局的通知绝对不能烧。”接待人痛快地答应：“我们等你的话儿。”他转过头对停尸房看护工人说：“听见没有，这具尸体不准烧”。工人满口应承着说：“好的，明天不烧了。”

两人出了八宝山殡仪馆直奔分局。所领导向常务副局长汇报了崔二猝死的几个疑点，如尸体异常特征、家属不要骨灰等等，请示是否请市局法医进行死因鉴定？局领导高度重视此事，当即同意请法医检验解剖尸体，查明真相。并让派出所与治安科商量下步具体工作安排。所领导到治安科汇报了相关情况，商定明日检验解剖，治安



今日西苑医院（林琳供图）

科负责联系市局法医，派出所负责将崔二尸体从八宝山殡仪馆运到西苑医院。

民警找村书记了解到：大前天早上，死者的嫂子绰号“小矧子”找到村书记，说崔二死了，可能是头天晚上喝酒喝多了，犯急病死的。请村里开个死亡证明，再帮忙派辆车拉到八宝山火化。恰巧村医不在，村书记就做主开了个因酒精中毒死亡的证明，盖上村公章，又派了辆卡车将死者运到八宝山。小矧子还对村书记讲，早晨六点多钟，她端着一筐箩玉米粒，领着大儿子，到村北崔二家叫他吃早饭。推了推院门没推开，便在门外喊：“他叔爸（当地人称孩子的叔叔）开门，该吃饭了。”喊了几声，没有动静。便对儿子说：“你叔爸还没醒儿”“翻墙进去给你开门”。儿子将院门门栓打开，进屋叫崔二起床，她在院里用带来的玉米喂鸡。不到一分钟，儿子慌慌张张地跑到院里说：“妈，你快去看看我叔爸。”她进屋一看，崔二已死在床上。她马上到村办小工厂找丈夫报信，接着夫妻俩向其他亲戚报丧。

傍晚，所领导与管片民警碰完各自的工作情况，民警又到村里，请村书记明天一早派辆车去八宝山，将崔二尸体运到西苑医院，要求他和司机对此事必须绝对保密。村书记心里打鼓，坚决要求一同跟车去。

次日上午，所领导到分局开会。小马、小吴与村书记到八宝山殡仪馆，经辨认无误，办妥尸体移交手续，崔二被送他来的同一个司机同一辆车再运到西苑医院。市局法医中心几名法医和分局治安科的人已经等候在此。检验尸表之后，法医严肃地说：“这绝对不是酒精中毒死亡，符合机械性窒息死亡的体表特征。”伴随着解剖刀的划动和法医关于死因判断的对话，村书记的额头不断地冒出大量的冷汗。

法医将尸体提取物带回去作进一步化验分析，以确定崔二的具体死因和死亡时间，三天后出具正式鉴定结论。但是崔二死于他杀已是确无疑的事了。

回所后，所领导与民警商量了一下尸检情况，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了地，思考着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觉得在正式立案之前不能干等着，必须马上做先期调查，从外围做起，注意保密，尽量不惊动死者亲属。当晚，几人进村找村医务室医生和村书记分别取证并要求保密。

调查人员从村医处了解到崔二在乡石灰厂上班，平时身体挺棒，没有什么疾病。小矜子在村里干活儿，身体也挺好，只是前一段她说夜里老失眠，找村医开了几次安眠药。

让村医将近几个月开药的单据全拿出来，民警一本本仔细翻查。在六月和七月的单据里，发现小矜子先后数次开安定药的记载，合计拿取安定药60片。跟村医说定，民警将这两月的单据带回派出所暂时保管。

之后接连两天，派出所民警到村里找村干部、村民调查，主要是那些参与料理后事的村民。

派出所汇总了一下几日调查情况，初步捋出大概：崔二，男，40岁，未婚，生前在乡石灰厂工作，身体好，能吃苦，不善言语，与同事交往一般，相互之间没有大的矛盾。兄弟二人，在村里一直与兄嫂共同生活，工资全部由其嫂掌管，单独居住在村边另一处院子。兄崔大在村办工厂工作，平时为人老实厚道。嫂子小矜子在村里务农，能说会道。村里人谣传兄嫂的孩子，是其嫂与村民绰号“小瘸子”的人通奸所生。小瘸子是村里电工，一条腿有毛病，已婚。崔二因此与小瘸子素有矛盾，曾扬言要杀了对方。还了解到，死者丧事由其嫂一手操办，送死者去八宝山火化的路上，小矜子在车上跟崔大说，崔二没有子女，要骨灰没用。崔大当即同意了。到了八宝山，他们办完火化手续，放下崔二尸体便返回村。

过了几天，分局刑警三人来到派出所，通报说“尸体检验鉴定已经出来了，崔二的死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是被扼杀的，不是酒精中毒死亡。法医从死者血液和胃容器中检验出安定药物成分。”派出所汇报了这几日调查情况，重点讲小矜子和小瘸子具有涉嫌杀害崔二的嫌疑及几点理由。双方商量决定继续进村调查，在派出所前期调查的基础上，重点复核几项重要的证人证言。

这天夜里，刑警进村将小矜子和小瘸子带走讯问。二人很快便供认了合谋投毒杀人，说是小瘸子提供毒鼠强（俗称耗子药），由小矜子将毒药包入饺子给崔二吃，崔二吃后死在自己房屋内。

小矜子和小瘸子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分局预审初期，两人一口咬定使用耗子药毒死崔二，然而法医出具的鉴定报告里没有提到毒鼠强药物成分。分局预审员将审讯情况通报市局法医，再

次对尸体提取物进行药物检验,依然没有检出毒鼠强成分,药物只有安定成分。预审员确认是两名犯罪嫌疑人说谎,加大审讯力度,终于突破他(她)的心理防线,迫使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追溯源头,都是“借种”引的祸。

小矬子婚后几年不孕,检查得知是男方原因,闹着离婚,丈夫无奈,提出让她与小叔子崔二同房。几年后还是因男方问题不孕,小矬子与丈夫和崔二商量后向小瘸子“借种”。生育后,崔家兄弟要求小矬子与小瘸子彻底断绝关系,小矬子口头答应,暗地里依旧与小瘸子保持来往。崔二发现后非常生气,屡次与小瘸子发生冲突。

1985年6月上旬的一天夜里,崔二偷偷将小瘸子放在水泵房值班室的被褥全部扔进水渠。次日,小瘸子将小矬子约到颐和园后山见面,黑着脸说:“崔二跟我没完没了,还说有他没我,要杀我,我必须灭了他,要不,我也活不了。你找机会把这包耗子药放到他的饭里。”说着,递给小矬子一包毒鼠强。对方不接,说我不敢。小瘸子威胁说:“你不杀他,我就把孩子领走。”孩子是最大的软肋,小矬子屈从了,接过毒鼠强说:“我准备好了就告诉你。”

回家后,小矬子反复思量,觉得与崔二一起生活多年,他对自己很好,多少有些感情,亲手投毒有点儿下不去手。再说自己投毒,万一事情败露,小瘸子不承认给自己耗子药,那样的话儿,这事儿全得一人背。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得让小瘸子亲自动手为妙。接下来,小矬子假称失眠,数次找村医要安定药,将药片积攒起来。

7月16日上午,小矬子告诉小瘸子:“今天晚上动手,包饺子时加进耗子药,专门包给崔二吃。”又说担心毒不死崔二,要小瘸子在夜里12时去找她,一同到崔二住处看看他死了没有。

小矬子将40余粒安定药片擀成粉末,掺到一碗馅里,单独包了一小盖帘饺子。晚饭时先煮这些饺子,两个孩子嚷嚷要吃,小矬子阻拦住,说:“你叔爸上一天班累了,先吃。”打开一瓶二锅头,崔二喝了一杯酒,吃完饺子,待了一小会儿,说:“我困了,回去睡觉。”

小瘸子获悉今夜动手的消息,心中高兴极了,又担心小矬子与崔二两人联手下套算计他,反手把他干掉。便准备了一根一头带着大疙瘩的木棒,预防事态突变时防身用。深夜,小瘸子手拿木棒,到小矬子家院门外拍了三下巴掌。假寐的小矬子悄悄地翻身起床,出门两人碰头,小矬子撒谎说:“崔二吃了一大碗放了耗子药的饺子。”小瘸子说:“咱们去看看他死了没有。”

刚到崔二院门外便听见呼噜儿呼噜儿的鼾声。两人相互对视一下,踩着院墙边的砖垛翻墙进入院内,推开房门,只见崔二正在酣睡,没死。两人悄声商量后决定掐死崔二。小瘸子让小矬子压住崔二的双腿,自己上床骑在崔二的腹部,双手用力掐崔二的颈部。崔二挣扎中头从床头铁框中伸出,嘴角流出血来,过了几分钟便没了生机。

小瘸子下地抽了颗烟,静了静心。小矬子用洗脸毛巾将崔二嘴角擦干净,又用拖布将流淌到地面的血迹擦干净。两人合力把死者摆放成正常睡觉的姿势。商量好在天亮后,由小矬子向村里报告死讯,然后拉到八宝山火化,骨灰一扔,谁也查不出来了。又约定两人暂时相互不联系。

从八宝山殡仪馆回村后,小矬子将崔二的住房全面打扫一遍,身前衣物被褥全部烧毁。又将装安定药的瓶子连同剩余药片及毒鼠强扔到京密引水渠里。

数月后,刑场响起两声枪声。

2026 年海淀区年鉴工作会顺利召开

本刊编辑部

为进一步提升海淀区年鉴编纂质量，精准留存区域社会发展的年度记忆，2026年3月19日至20日，区史志办组织召开2026年度海淀区年鉴工作会。特邀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原副主任（一级巡视员）张恒彬和区史志办三级调研员、《北京海淀年鉴》执行主编钟冷围绕年鉴编纂核心要点开展专题培训与实操研讨，为海淀区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会议由史志办副主任赵习杰主持。全区各单位年鉴编纂人员150余人参加。

会上张恒彬以“把握年度特点准确记述时代变化”为主题作了专题培训，他从突出年度特点、践行使命任务、坚守基本规范、条目实例四大维度系统阐释年鉴编纂的核心逻辑，强调编纂人员要立足区域发展阶段，精准提炼年度标志性特征，发挥年鉴“存史、资政、育人”的核心功能，通过结合典型案例拆解实操方法，为参会人员提供可借鉴的编纂范本。

钟冷以给年鉴找“茬”——兼以《北京海淀年鉴(2025)》编辑稿为例从年鉴编纂法规文件、记述内容、表述规范、年度亮点挖掘等方面指导参会人员掌握“找茬式”的编纂方法，针对性解决编纂中的疏漏与不足，切实提升年鉴稿件的专



会议现场（作者供图）


业性与严谨度。

此次培训既强化了“突出年度特点”的编纂理念，又夯实了质量把控的实操能力，为年鉴编纂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指引、专业的方法支撑和严格的规范遵循。

下一步，史志办将以此次培训为抓手，持续强化全过程指导，严格审读、统一进度，保质按期完成《北京海淀年鉴(2026)》撰稿工作，以高质量史志成果服务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留存海淀发展轨迹、服务区域治理提供坚实的史料支撑。

（林琳）

海淀区三轮修志工作系列会议接续召开 经济部类培训会精准破题

 本刊编辑部

4月9日，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关于加强地方志工作的要求，精准破解经济部类资料收集难题，提升编纂质量，区史志办组织召开海淀区三轮修志经济部类交流培训会。会议聚焦资料征集这一基础性难题，邀请地方志专家围绕“应收尽收、实事求是、质量第一”原则和“广、全、深、多、特”实操要求进行专题辅导，40余家承编单位主笔参训。此次培训是继三轮修志工作动员会、首次业务培训会之后，又一次精准发力的专题推进会议。

作为全国70家、北京市唯一一家第三轮地方志书编修试点，海淀区将第三轮修志列为重大政治任务和重点文化工程，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史志办组织实施”的工作格局。区史志办紧扣“存史、资政、育人”核心职能，扎实推进修志试点工作，在组织机制、篇目设计、队伍建设、过程管控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阶段性成果。

此前，2025年12月24日，海淀区第三轮修志工作动员会以视频形式召开。时任区委副书

记、代区长许心超，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副主任顾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明确，海淀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把政治关、史实关，突出区域特色，凝聚全区合力，全力打造精品佳志。2026年1月22日至23日，区史志办接续举办第三轮修志业务培训会。市区修志专家围绕志书体例规范、篇目设计、资料鉴别、志稿撰写等内容系统授课，并组织学员赴双清别墅、香山革命纪念馆开展红色研学，将党性教育与修志使命深度融合，为后续编纂工作统一了标准、夯实了队伍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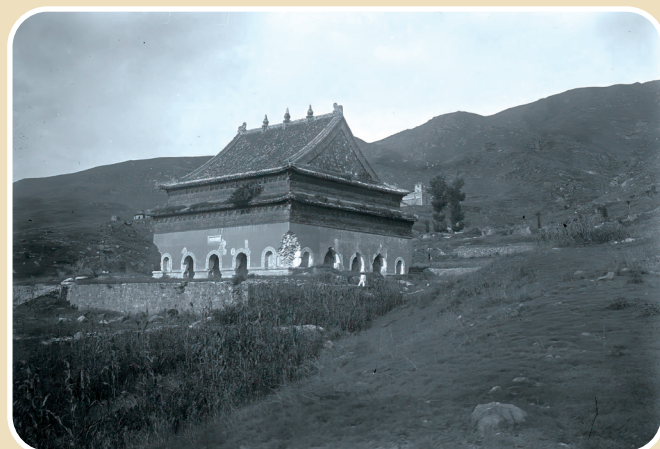
从高位动员到业务赋能，再到经济部类精准破题，三次会议接续发力、层层递进。下一步，区史志办将继续召开各部类交流培训会，并以此为抓手，着力打造统一资料标准、保障志书质量的“筑基工程”，同时构筑破解征集难题、彰显试点价值的“赋能举措”，将三轮修志各项工作引向深入、落到实处。

（曹沛函）

海淀故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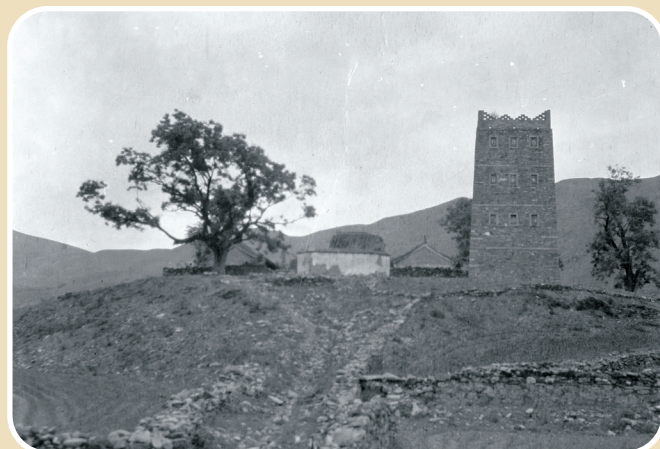
1908 年左右的宝谛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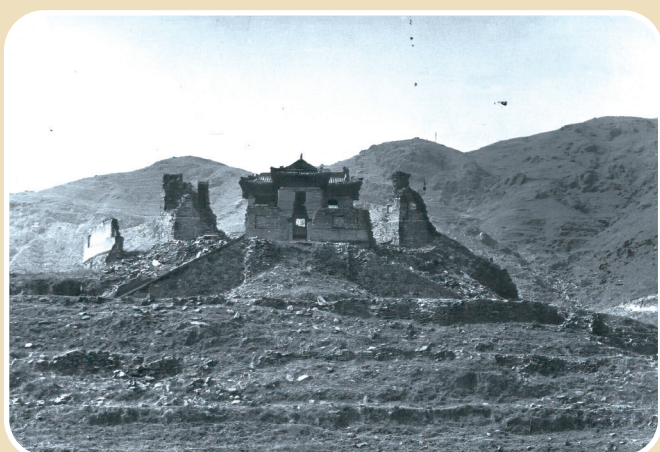
1908 年左右的旭华之阁



1908 年左右的昭庙



1919 年左右的殃楼



1930 年左右的圆昭庙



1930 年左右的未知寺庙

封面：“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牌坊



金凤花（宁葆新 供图）

海淀史志

编辑：《海淀史志》编辑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1 号

邮编：100195

电话：010-88487042